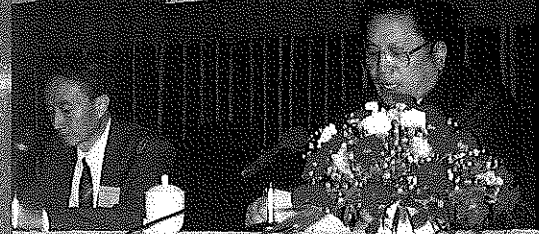


當代港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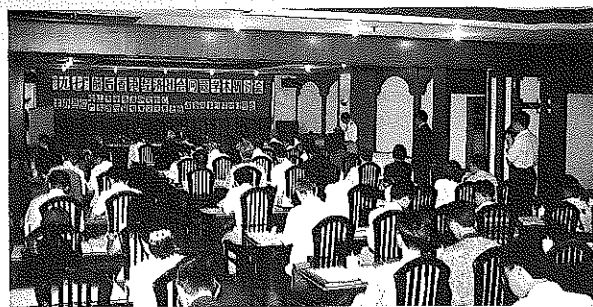
第 **2** 期
1996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港澳研
广东国际暨港澳



Studies on Hong Kong & Macao

「九七」前后香港经济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图片



大会会场。



研讨会赞助者、香港高李叶律师行高主赐律师讲话。



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先生到会讲话。



中山大学副校长李翀教授在会上致词。



香港地区事务顾问曹绍伟先生讲话。



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学仁发言。



中山大学教授林江博士主持论文报告会。



香港中港经贸商会会长、港事顾问李秀恒先生接受记者采访。

当代港澳
1996年第2期
(总第7期)

目 录

本刊得到
曹绍伟先生资助

主 编：
许锡挥
郑佩玉
副 主 编：
孟庆顺
肖贤彬
周运源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
电 话：
(020)84186300-6799
传 真：
(020) 84180749
邮政编码：
510275
出版许可证：
GD—1152
刊 期：
逢 6 月 15 日
12 月 15 日出版
本期出版日期：
1996 年 12 月 15 日
定 价：
¥ 3.00 元

2/文摘页

“九
七”
前后
香港
经济
社会
问题
学术
研讨
会文
选登

- | | |
|--------------------------|--------------|
| 4/ 粤港两地的产业优化与经济整合 | (香港) 李秀恒 |
| 8/ 香港服务贸易中心的形成与展望 | 郑佩玉 张 冰 |
| 12/ 香港“九七”回归与长期保持繁荣稳定 | 周维平 |
| 15/ 香港回归初期工业走向的几个问题 | 雷 强 |
| 19/ 香港服务贸易中心地位的强化与服务业的发展 | 林 江 |
| 24/ 从变数看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前景 | 张仲深 |
| 29/ “九七”前后香港经济过渡与展望 | (香港) 罗文华 刘伟业 |

百家
论坛

- | | |
|-----------------------------|-----|
| 33/ 面向 21 世纪的华南经济圈交通运输网 (下) | 郑天祥 |
|-----------------------------|-----|

经
济

- | | |
|----------------------|----------|
| 37/ 香港与中国内地经济合作回顾及展望 | 张 莞 |
| 42/ 《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延伸至澳门 | (澳门) 李金平 |

法
律

- | | |
|------------------|-----|
| 44/ 香港人士的国籍与护照问题 | 张丽英 |
|------------------|-----|

社
会

- | | |
|-------------------------|-----|
| 49/ 香港的中国内地非法移民与非法入境者问题 | 李若建 |
|-------------------------|-----|

教
育

- | | |
|---|-----|
| 53/ 从香港城市大学的教师培训课程看教育现代化的
重要课题——提高大学教师素质 | 王家瑾 |
|---|-----|

文
化

- | | |
|------------------------------------|-----|
| 57/ “港式中文”初探 | 张振江 |
| 61/ 后殖民处境与香港身分辨析
——香港文化研究书刊述评之二 | 艾晓明 |

消
息

- | |
|--------------------|
| 23/ 张浚生受聘为中山大学兼职教授 |
|--------------------|

本刊声明

- 本刊所发表署名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
- 本刊所刊登的图文均保留版权，请勿擅自转用。

文 摘 页

李秀恒：粤港两地的产业优化与经济整合

香港制造业已大量北移广东，形成了“前店后厂”的产业组合。但由于这些北移制造业的技术层次低，广东目前亦面临工业技术升级的问题。基于粤港两地的比较优势，未来粤港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是：广东在香港强大第三产业优势的支持下，逐步形成粤港制造业融合发展，以国际市场为依托，以国内劳力及资源为后盾，发展以新技术、新设计为主导的日用消费品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体系。

郑佩玉 张冰：香港服务贸易中心的形成与展望

第三次经济结构转型，使香港发展成为高度发展的服务型经济。在服务业持续高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迅速提高的推动下，香港形成了门类齐全的服务贸易体系，国际服务贸易中心地位已经确定。今后，随着服务业的进一步高级化，香港在亚太地区的服务贸易中心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周维平：香港“九七”回归与长期保持繁荣稳定

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意义深远，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有四个关键：一是切实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经济领域的高度自治权；二是正确处理中央各部门、各省、区、市与香港的关系；三是把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四是保持和发挥香港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区域化优势。

雷强：香港回归初期工业走向的几个问题

本文探讨了香港回归初期的工业发展中的几个有争论的问题，认为要从香港经济转型的范围来看香港产业升级转型。香港客观上存在“境内工业”与“境外工业”，它们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在回归初期，“境外工业”还要有个较大的发展。97 后香港工业发展路向应该是：“几个结合”和特区政府积极扶持的路向。

林江：香港服务贸易中心地位的强化与服务业的发展

近年香港外贸结构不断变化，其中转运相对增长最为显著，且较集中于中国内地、美国、日本、台湾等几个最大贸易伙伴。离岸贸易快速增长的原因是港商不断把货物供应来源和出口市场扩展至较远地区，无论从实际需要还是地理角度看，这些货物均没必要经香港转口。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将进一步强化香港贸易服务中心的角色。

张仲深：从变数看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前景

香港在战后特定条件下迅速崛起为繁荣发达、网络结构多元化的现代国际贸易中心。作用于香港贸易模式的变数因子极为复杂，时刻处于动态之中。文章分析了变数的交叉效应，着重阐明 HK 模式成功之道在经济方面的变数及其在“一国两制”条件下的变动趋势，提出若干对策思路，进而得出“九七”后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前景光明并将再创新世纪辉煌的结论。

罗文华 刘伟业：“九七”前后香港经济过渡与展望

香港进入过渡期后，产生了许多影响其政治、经济、社会的新情况，但由于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香

港与内地间经济合作的加强及香港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强大潜力,使“九七”后香港经济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不过,在可见的将来香港也面临颇多问题与挑战。

郑天祥:面向 21 世纪的华南经济圈交通运输网(下)

(文摘见上期)

张莞:香港与中国内地经济合作回顾及展望

本文从贸易往来、投资关系方面回顾了香港与内地经贸关系的发展,将香港与内地经贸关系划分为加工贸易合作和全面合作两个阶段,分析了香港与中国内地在产业合作、投资等方面的新动向,并展望了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的发展。

李金平:《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延伸至澳门

本文介绍了澳门的物种资源及保护、澳门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一些情况,及若干项大型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张丽英:香港人士的国籍与护照问题

香港人的国籍与护照问题是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稳步实行“一国两制”的重要政策的内容之一,本文依据《基本法》等法规文件,阐述了香港人国籍与护照问题的由来及中国政府对有关问题的立场。

李若建:香港的中国内地非法移民与非法入境者问题

论文描述了从 50 年代开始的从中国内地到香港的非法移民与非法入境者问题,着重介绍了困难时期与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两个非法移民高峰,分析了几类特殊的非法入境者。通过香港的事例,指出用行政与法律手段来控制人口的非法流动,其效果是有限的。解决人口非法流动,最根本的道路是缩小地区差距。

王家瑾:从香港城市大学的教师培训课程看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提高大学教师素质

介绍香港城市大学旨在提高教师素质与教学质量的培训“短课程”,并剖析其特色:①十分注重传授新的教学观念与思想;②十分注重培训目标定位于提高教师课堂操作能力;③十分注重培训过程中的实践环节;④十分注重授课教师自身素质与课堂示范作用。文中还简述了借鉴香港教育经验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张振江:“港式中文”初探

本文讨论“港式中文”的几个问题。指出:(1)它以国语或香港话为基础语言;(2)其形式特征主要体现为杂用英文成分;(3)其语词特征主要体现为以香港话语词补足国语、以英语语词替代相应的中文形式;(4)其语法特征主要集中于词的用法方面。

艾晓明:后殖民处境与香港身分辨析

本文介绍了《今天》(香港文化专辑)和周蕾《写在家国之外》两本书。《今天》从不同角度探讨香港文化特质,其中也表达出一种维护香港文化的多元性的呼吁和要求。周书用香港文化近年的一些问题,反思怀旧、革命、后殖民、群体等等观念,从思考香港的电影、流行音乐科技、流行音乐歌词、诗歌引出意识形态上的各类矛盾冲突和香港文化的世界性。书中的研究角度及讨论方法,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

粤港两地的产业优化与经济整合

李秀恒

自大陆实施开放改革以来,粤港两地由于地理位置相连,语言文化相通,相互间的经贸合作日趋紧密。香港先进的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信息、技术、管理及运输服务业体系弥补了广东省第三产业方面的不足,而广东省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及廉价土地,则成为本港制造业稳固的后方基地。经过十六年来的相互促进和融通,粤港两地经济已渐形成一个稳健牢固的经济整合体,并推动两地产业结构不断地调整和优化。

一、香港产业结构的转型

自战后以来,随着西方工业国经济向第三产业转移,香港制造业因而得到生存空间并迅速发展起来。然而,随着经济高速发展,香港的工资与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七十年代以来,港产品出口规模每扩大一倍,工业用地价格就相应攀升三倍。同时,自中国难民潮结束后,香港的人口增长也显著放缓,劳动力的增幅大不如前。在这两方面因素下,导致香港的出口加工业生产成本开始不断上升,港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则不断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制造业无可避免地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转变。与台湾、韩国、新加坡的发展模式不同,香港制造业采取的策略,并非转向发展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是把那些缺乏竞争力的生产程序送往广东的珠江三角洲,而将一些较复杂的生产工序留在香港。事实上,广东省拥有丰富而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对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平均雇员人数不超过五十人的香港厂家来说,无疑是最佳的设厂地点。目前,港商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三万多家企业中,包括港商经营的三资企业及来料加工业所聘用的制造业工人,数目已超过三百万,还高于香港从事制造业工人的数目。目前香港制造业中约80%—90%的厂家,已把生产工序转移至广东进行加工装配。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七九以来,这些港资来料加工企业共为广东引入二百七十万台(套)先进生产设备,先后缴付给广东一百零九亿美元的工缴费,为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以及解决广东的就业、创汇等问题,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际上,目前由广东输入香港的货品,已经大部份来自港商在广东设立的三资企业,以及为港商进行来料加工的集体或乡镇企业,这些半制成品在香港经过更深层次的加工及包装,再出口欧美市场,从而形成粤港两地产业新型“前店后厂”关系。即香港主要负责对外市场联络、设计及深层次的加工和包装,而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则主要负责简单性、增值少、规模大的加工工序,藉此将港产品出口生产成本降至最低。

产业结构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将发生相应变化。因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技术,不仅表现在人均国民收入所达到的水平,同样也反映在产业结构的变迁上。反过来,产业结构演进也将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发展。粤港两地工业自改革以来出现的结构性互动性变化,进一步表明粤港两地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而这种结构性变化在两地的经济发展中,都表现出一种“高附加价值化”的趋势。

产业结构理论还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往往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规律性变化相适应。粤港两地工业结构正是循这种规律顺利转换的。故要加快粤港经济增长的速度,必须促进两地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而政府如何确定两地未来产业结构的前景目标,并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是关系粤港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核心问题。

二、“前店后厂”的功能转变与产业优化

粤港两地由于经济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近十几年来一直保持着令人满意的发展,表明由广东与香港各自优势结合而形成的这种新型结构性出口加工体系,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前店后厂”结构性产业体系的进一步优化,更对粤港两地加工贸易业的前景产生实质性影响。事实上,近几年来,这种“前店后厂”式的来料加工体系仍在不断地扩充和发展之中,从下述表中可

以见到,从1989年至1995年以来,港商在内地及广东出口加工业的出口货值及其每年增幅,一直在不断递增之中。而港商来料加工业占全国对香港与外发加工有关出口之比值(即表内a)以及占全国总出口之比重(即表内b),近几年来也保持稳定增长,显示港商在国内的来料加工出口产业,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香港从中国大陆及广东与来料加工有关的进口情况变化表

年份\货品	由中国大陆进口		其中:由广东进口	
	货品价值 (亿美元)	增幅	货品价值 (亿美元)	增幅
1989年	145.6		136	
	a (100)		(93.4%)	
	b (27.7%)		(28.3%)	
1990年	186.3		176	
	a (100)	27.9%	(94.4%)	29.3%
	b (30%)		(28.3%)	
1991年	254		24.011	
	a (100)	36.3%	(94.5%)	36.5%
	b (35.3%)		(33.4%)	
1992年	325.6		303.5	
	a (100)	28.2%	(93.2%)	26.3%
	b (38%)		(35.4%)	
1993年	378.5		355.3	
	a (100)	26.2%	93.2%	16.4%
	b (41%)		38%	
1994年	424.2		411.7	
	a (100)	13.6%	(93.8%)	13.8%
	b (43%)		(41.1%)	
1995年	458.6		442.6	
	a (100)	13.6%	(92.7%)	12.9%
	b (45%)		(43.2%)	

注:(a)占全国对香港与外发加工有关出口之比重

(b)占全国总出口之比重

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工序的北移,制造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下降。特别是自1984年中国开始进行全面的经济及企业改革以后,本港对广东的投资大幅度增加,令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的下降更为显著。由1985年至1994,其比重已由21.9%下降至9.3%。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港就业人口的比重,更由1980年的41.7%,急剧下降至1994年的19.8%。随着制造业北移,中港间贸易、香港转口贸易以及为这些产品出口的服务行业

也急速发展。而这些服务大部份需要香港提供,使本港的服务业得以迅速成长,也相应带给广东先进的商业服务技能及管理经验。据南洋商业银行一份有关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显示,香港为珠江三角洲来料加工业所提供的转口服务(其中包括银行结汇、仓储、运输、金融保险、通讯以及中介人等)其利润之增值率达25%。由此可见,香港经济在与广东经济整合的过程中,配合制造业北移而带来的第三产业兴旺,明显促进了香港产业结构的优化。

进入九十年后,香港制造业北移已由广东珠江三角洲扩展到整个华南地区,甚至中国的内陆省份,并已经与广东的出口加工业融为一体。与此同时,香港制造业原来留在香港的少量加工装配工序功能也发生变化。它一方面继续承担营销、设计及质检的角色,以适应中港贸易出口加工业发展之需;另一方面迅速与第三产业融合,成为港商北移工业及国内出口加工业新的综合贸易支援中心。据香港贸易发展局最新对本港两千家与制造业有关的公司所做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在港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中,60%以上是大陆经贸出口有关的各类服务,以及相应的设计、研究等业务,只有不到40%仍进行相应的制造和加工装配。此充分表明,以往人们常谈及的“前店后厂”中的“厂”,已不再是单纯的港商在广东的加工装配生产工序,而已是整个华南以至中国大陆的出口加工体系;而“前店后厂”中的“店”,也不再是以往单纯的营销和设计工序,而已是配合大陆出口加工体系发展之新的支援服务中心。这种“前店后厂”模式的功能变化,是香港第二产业北移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生动体现,充分显示粤港两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从而促使香港与广东在新的发展阶段中,正迈向更高层次的经济整合。

三、粤港产业优化与经济整合的方向

产业优化理论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是通过产业结构间的调整,使各产业实现相互协调发展,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不是指产业结构水平的绝对高低,而是在追求国民经济效益最优的目标下,根据本地区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经济发展、科技水平、人才素质、市场环境等特点,通过产业结构间的合理调整,使之达到与上述条件相适应的各产业协调发展的最佳状况。

近十年来,广东省的制造业发展成效未尽人意。由于过去香港迁移至大陆的加工业一般技术水平较低,但过去几年广东省却一度集中资源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未积极提高这些劳动密集工业的生产力,令广东货品在国内市场以至国际市场上近几年的竞争力均不断下降。事实上,随着中国沿海及其他内陆地区的不断开放,这些地区也致力发展同类低水平的出口加工工业,使广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地位每况愈下。据中国经济研究咨询公司近期对北京消费品市场调查显示,广东产品原占有的市场优势,已被浙江省产品所取代,而广东货品在京所占的市场比重更呈不断下降趋势。此外随着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加上主要海外市场对廉价消费品采取的贸易壁垒政策,以及来自东盟各国及东欧国家出口产品的激烈竞争,粤港两地的确面临如何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增强出口竞争力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广东省政府提出于九十年代加强基础建设的投资,并优先发展重工业、化学、机械及其他高科技工业,以追求深加工的发展。并模仿上海的发展模式,希望逐渐加强石油化工、运输工具、通讯器材、建筑材料等工业,逐渐改变广东八十年代以来以日用品、家庭电器、食品和纺织等轻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

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工业发展战略未必符合广东的客观环境,也未能充分利用粤港两地的经济优势。广东省天然资源比内陆省份贫乏,科技水平也比其他省份相对落后,再加上广东缺乏大型骨干企业的统筹经验和重化工业的规模效应,令广东在工业结构的转型上艰难重重。此外,广东也缺

乏在资金筹集、体制改革、人才训练、工业政策等方面的综合协调。当然,香港可以在资金筹集方面提供一定的协助。以香港完善的国际化资本市场,相信也可为广东的重工业化提供部分资金。然而,香港一向未有发展重工业及高科技方面的经验。香港的产业结构向来是以轻工业及服务业为支柱,并向服务业倾斜的。而重工业与原材料所占比重一向很低。事实上,香港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商业资讯、市场拓展、商品设计等“软技术”方面,如果广东省走重化工业发展道路的话,香港对两地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有心无力的。笔者认为,粤港经济发展不应走上海以钢铁、石化、汽车生产为主的重工业道路,而应该集中发展以技术与设计为导向的技术型劳动密集工业,例如电脑、电子、影音器材等,以及运用新材料、新科技的日用消费品加工业。这样做,一来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国内其他省份的竞争较少,二来也可以更有效利用本港现有资金、市场、信息及设计上的相对优势,配合广东省现有的劳力、科研方面优势。目前广东省已有高等院校45间,研究机构600多个,自然科学技术人员达十万人,明显优胜于香港。九七后,香港可以从广东省引进多方面的技术人才,配合香港灵敏的信息及广阔的市场网络,为粤港的高新科技消费品工业,提供资金、设计、信息及市场的有效支持。

近年来,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广东应将其发展策略倚重于第三产业,使广东发展成庞大的贸易服务区,为中国其他省市提供交通、通讯、金融及其他各种商业服务。若依从这个发展方向,广东省则应集中发展机场及港口建设、公路网络、通讯设施、各种金融及商品流通市场,以至各种服务行业(如会计、保险、法律、信息等方面)。这意味着广东将为中国其他地方提供象目前香港为广东所提供的服务。这种发展策略的目标自然是为获取较高回报率,也可充分利用香港方面的经验。对香港商人而言,相信亦会乐于参与这方面的发展,因为这样无疑也可为早已膨胀及日趋竞争激烈的香港服务业提供更多的生意往来。但笔者认为,长远而言,这种发展策

略的结果是粤港经济结构进一步趋同。而且需要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未来中国究竟是否需要一个由广东加上香港这么庞大的第三产业经济区域来提供商业服务?更具体一点说,就是中国是否需要香港、广州、珠海、深圳等城市同时成为国际性的金融服务中心?很明显,单靠第三产业是不足以养活广东省七千万人口的。而以内地与香港现实情况来看,笔者预期,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只能容纳发展两个主要金融服务中心,即北方的上海及南方的香港,一面倒地服务业倾斜之发展策略,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当然笔者也同意,基于国内第三产业相对滞后,未来这方面可以有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对广东而言,重点仍应放在制造业的进一步优化方向上。

事实上,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而言,广东在制造业发展方面仍拥有一定优势。首先,广东拥有庞大的廉价动力市场,省内劳力不足可从外省大量输入。以中国农村拥有的庞大的剩余劳力,广东不会象台湾、韩国那样容易受到劳动力不足、劳动成本上升的制约。其次,广东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其产品可随意向各省市场推销。现时估计大陆的人均生产总值已达一千美元,未来如能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幅度,仅沿海等较富裕的地区就可为广东产品提供良好的销售保证。此外,通过外资工业的转移,实际上广东可以依靠港台商家的出口订单,建立起自己强大的出口加工工业体系,而香港、台湾实际也成为广东出口加工业的海外市场拓展者。而港台已形成的消费市场,则可逐步成为广东较高档消费产品的出口地,并逐步辐射到其他东南亚国家以至欧美市场。笔者认为,未来粤港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是广东能否加快现有消费品加工业的结构性转型,并在香港强大第三产业优势的支持下,逐步形成粤港制造业融合发展,以国际市场为依托,以国内劳力及资源为后盾,以新技术、新设计为主导的日用消费品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体系。笔者相信,这才是未来粤港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责任编辑:黎熙元]

香港服务贸易中心的形成与展望

郑佩玉 张 冰

随着第三次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入发展, 香港经济已蜕变为高度发展的服务型经济。在服务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 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功能逐步走向多元化, 并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服务贸易体系。至此, 服务贸易已成长为香港经济新的增长点, 香港被公认为亚太地区的主要服务中心。展望 21 世纪, 服务贸易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将日显重要, 而面临的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 巩固、提高香港服务贸易中心的地位必须依靠服务功能和服务工具的创新, 不断提高服务素质和努力开拓国际市场。

一、国际服务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

服务业高级化、国际化, 是带动香港服务贸易发展的前提条件。80 年代中开始的经济结构转型, 使香港逐步演变成为全球第二大高度发展的服务型经济, 仅次于美国 (见《1995 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按经济活动划分的本地生产总值统计, 1986—1994 年间, 服务业生产总值从 2048.8 亿港元增长到 7909.1 亿港元, 年均增长 18.4%。在 GDP 中的比重从 69.2% 提高到 83%。在服务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 香港服务贸易持续高速发展, 据港府统计, 1986—1995 年间, 服务贸易总额从 1160.9 亿港元, 增加至 4568.8 亿港元, 增长 2.9 倍, 年均增长 16.4%。服务输出比服务输入增长更快, 规模更大。在此期间, 服务输入从 442.7 亿港元增加到 1646.8 亿港元, 年均增长 15.7%; 而服务输出从 718.2 亿港元增长至 2910.3 亿港元, 年均增长 16.8%。

服务贸易在香港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94 年服务输出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的 24%, 1995 年又提高了 2 个百分点, 达 26.2%。同时, 服务贸易的发展为香港平衡国际收支, 增加外汇储备起着重大的作用。由于香港地狭人多, 各种商品入大于出, 每

年都有巨大的有形贸易逆差。但在香港对外贸易平衡表上, 每年最终都有上百亿港元的贸易顺差。事实上服务贸易每年为香港创造多少收入, 由于统计上的原因 (有些收入无法统计), 至今尚未有准确的数据。有些专家认为, 现有统计数字只是实际情况的 70%, 即香港每年的服务贸易收入应是现在的 1.4 倍左右, 即近年每年约有 1600 亿港元的顺差。据港府统计, 香港服务贸易顺差年年增长, 1986 年为 275.4 亿港元, 1995 年已增加到 1273.7 亿港元, 增长了 3.6 倍, 年均增长 18.6%。

表 1 香港服务贸易情况 (按当时市价计算)

单位: 百万港元

年份	1986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服务贸易总值	116086	230013	261901	303594	343998	386382	455688
比上年增长 (%)	17.3	15.4	13.9	15.9	13.3	11.4	17.9
服务出口总值	71855	142321	161087	189352	217447	243907	291030
服务出口比上年增长 (%)	11.8	11.9	13.2	17.5	14.8	12.2	19.3
服务出口占贸易比重 (%)	25.9	14.5	13.7	13.4	17.2	20.8	21.7
服务输入总值	44271	87692	100814	114242	126551	142475	164657
服务输入比上年增长 (%)	16.7	21.5	15.0	13.3	10.8	12.6	15.8
服务输入占贸易比重 (%)	16.0	10.5	9.9	9.1	10.5	11.4	11.0

资料来源: 《年本地生产总值估计 1961—1995》。

而香港对外贸易中有形贸易逆差逐年上升, 已由 1986 年的 9.7 亿港元上升到 1994 年的 844.14 亿港元, 同时无形贸易的顺差不断扩大, 足以弥补前者的逆差而有余。只是 1995 年, 由于本地投资和生产需求扩大, 进口留用货物比上年大幅增长; 转运贸易高速增长而引起转口贸易增长速度下降以及贸易比价下降等原因, 使贸易逆差比上年大幅增加

了672亿港元,虽然无形贸易创下1270亿港元的顺差,但仍未能完全抵销前者的逆差。

但无论如何,香港服务贸易在香港国际收支中都具有无可争辩的重要地位,没有服务贸易的巨大收益,香港对外贸易只会长年维持庞大的逆差,如此港币汇率会失去保障,联系汇率制也会受到影响,香港经济很难健康发展,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也是难以维持的。

二、服务贸易与其它几个中心的关系

根据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划分,香港服务贸易归纳为七大功能:运输(包括海陆空运输的货运和客运以及航运管理服务)、旅游(包括商业及私人旅游)、保险(包括直接投保和分保)、金融(包括银行、财产资产交易及经纪服务)、有关贸易的服务(包括离岸贸易、购物服务及其它与贸易有关的服务)及其他商业服务(包括通讯、法律、建筑、工业、广告、市场调查、管理顾问、电脑、资讯、会计、房地产、建筑设计、新闻传播、电影制作及发行、酒店管理服务等)。

香港服务贸易功能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资讯中心和旅游中心的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没有这几个中心的发展,香港服务贸易就难以扩大和发展,没有服务贸易的发展,这几个中心地位的巩固提高也受到制约。

1. 服务贸易与国际交通运输中心

运输和旅游业是香港服务贸易体系的龙头,长期以来,保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1986—1994年间,运输服务输出从279.5亿港元增长到917.7亿港元,运输服务输入从148.6亿港元增长到379.8亿港元,年均实质增长率分别为9.2%和8.4%。由于服务输出比输入增长更快,运输贸易顺差不断增长,同期从130.9亿港元增长至537.6亿港元,占1994年服务贸易顺差的53.9%,成为服务贸易贡献最大的行业。

香港服务贸易的发展得益于发达的交通运输业。香港运输服务贸易以航运和空运为主。香港是

世界主要海运中心,海运服务占运输服务贸易的首位。由于对外贸易以双位数增长,航运事业的发展迅速。1995年内河船运与远洋船舶卸货物超过1.69亿公吨,其中远洋运输达1.29亿公吨,比1994年增长14%。香港是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之一,1985年处理货柜量单位2280953个,1995年已达1260万个,年均增长20.9%,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目前,香港和中国的货柜处理量是亚洲对美国、欧洲的货柜输出量的40%。至于铁路和公路运输是进出内地商品的重要运输方式,1995年货物运输量达1552万公吨,比1994年增长6%。

香港又是亚太航运管理中心,长期以来凭借其专业水平与工作效率,为国际客户提供货运代理、码头营运、船东、船只管理、融资、保险、经纪、集装、存仓等方面的优质服务,每年服务收入达数十亿港元。

香港机场是世界第4大繁忙的国际机场,在客运人数方面近几年均保持约6%的增长率,货物空运量的增长十分强劲,1995年空运货物达145万公吨,总值5638亿港元,比1994年增长3%。

由此可见,服务贸易与香港国际交通运输中心的地位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对运输服务贸易的影响尤为突出。而随着运输服务贸易的发展,香港国际交通运输中心的地位将不断巩固和提高。

2. 服务贸易与国际旅游中心

香港是一个国际旅游中心,拥有一个别具特色、不断完善的旅游服务体系。70年代末以来,香港成为进出中国的主要通道。近几年会议、展览服务迅速发展,使香港成为亚太区第二个受欢迎的会议中心,仅次于新加坡。

长期以来,香港旅游服务持续增长,是服务贸易的主要支柱。1986—1994年,旅游贸易总额从347.3亿港元增加至1311.5亿港元,增长了3.8倍,年均实质增长8.8%。旅游服务在服务贸易中居首位,1994年占服务贸易总额的33.9%。

从服务输出来看,旅游业则在运输业之后,居第二位。1994年,旅游服务输出值为642.6亿港元,而输入则为668.9亿港元,居服务输入贸易的首位。国际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运输贸易以及酒店管理等有关其他商业服务贸易的发展。1995年访港旅客首

次超过 1000 万, 达 1020 万人。与此同时, 访港旅客在港开支也持续增长, 1985 年为 184.4 亿港元, 1995 年已超过 720 亿港元, 增长了 2.9 倍, 约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6.5%。

可见, 服务贸易与国际旅游中心功能两者相辅相承, 服务贸易的发展, 促进国际旅游中心地位的巩固提高, 而国际旅游中心功能的发挥又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3. 服务贸易与国际贸易中心

服务贸易与有形贸易关系最为密切, 各类服务贸易为香港有形贸易提供了各种服务, 有形贸易的发展为服务贸易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尤以运输服务和贸易有关的服务为甚。目前, 航运收入约有 90% 来自货运。1994 年, 空运货物分别占香港进口货值的 22%、出口货物的 33% 和转口货值的 15%。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亦随着香港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增加。这项服务在服务贸易中仅次于旅游和运输业排第三位。1986 年有关贸易的服务贸易总额为 179.5 亿港元, 1994 年增至 611.5 亿港元, 实质年均增长 5.6%, 占服务贸易总额的 15.8%。

80 年代中以来, 香港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1995 年已提高到第 8 位。国际贸易中心功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88 年转口贸易超过港产品出口后, 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持续提高, 占出口贸易的比重从当年的 57% 提升到 1995 年的 82.9%。与此相反, 港产品出口比重从 43% 下降至 17.1%, 转口贸易功能居出口贸易的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 在此期间, 离岸贸易迅速兴起。离岸贸易包括转运贸易和直接付运两种贸易形式, 目前, 转运贸易及直接付运的贸易都不反映在港府贸易统计中。香港贸易发展局发表的《香港贸易及贸易支援服务》的调查报告显示, 1994 年香港公司从事的离岸贸易总值达 6550 亿港元, 比 1991 年的 2700 亿港元增长了 1.4 倍, 年均增长率高达 34.4%。同期, 离岸贸易相当于转口贸易的比重也从 50% 上升为 69.1%, 比 1991 年上升了近 20 个百分点; 离岸贸易相当于 GDP 的比重也从 40.4% 提升至 64.4%。可见, 离岸贸易在香港经济中的重要性已大大提高, 并已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一个主要功能, 从而有利于这一中心地位的提高。

在离岸贸易中, 尤以转运贸易增长最为迅速, 这是 90 年代以来香港对外贸易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表 2 说明近年来转运货物的发展情况及其对海运服务的影响。

表 2 海运进出口及转运货物情况

单位: 百万公吨

年份	海运出口货物		离港转运货物		转运占离港货物比重 (%)	海运进口货物		抵港转运货物		转运占抵港货物比重 (%)
	数量	比上年增长 %	数量	比上年增长 %		数量	比上年增长 %	数量	比上年增长 %	
1994	21	14	13	41	39.4	63	8	14	40	18.2
1995	23	9	17	30	42.5	71	13	16	14	18.4

此外, 香港出口信用保险也是在有形贸易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1994 财政年度, 信保局受保出口总值达 166.7 亿港元, 比 1993 年增加了 7%。承保本地出口及转口货物的综合货运保单, 占受保出口总值的 88%。出口信用保险业的发展推动了有形贸易的发展, 它保障了出口商的利益, 使他们避免了重大的财产损失。同时, 出口保险单又可作为融资的抵押品, 方便了出口商的融资活动, 并使他们不会因为未能及时收回货款而影响出口业务活动。

4. 服务贸易与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是亚太地区金融中心, 大部分交易均属国际性质。1995 年底, 银行的境外交易额达 12760 亿美元, 居世界第五位, 在亚洲仅次于日本。1994 年美国政府在国民待遇研究中, 把香港评定为亚洲银行业务经营最开放、透明度最高和最公平的市场。香港证券市场的市值计算居全球第 8 位, 在亚洲仅次于东京。在风险管理和效率方面称誉全球。同时香港又是亚太地区最有效率的外汇市场之一, 外汇市场成交量居世界第五位, 目前超过 35 家国际基金公司在香港设立亚太区总部, 是亚洲主要基金管理中心。80 年代中以来, 香港金融保险业迅速发展成为香港第二大行业, 仅次于进出口贸易。

以上表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直接、间接地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为服务贸易提供的贷款和垫款不断增加。以航运业为例, 1994 年金融机构对航运业融资达 138.3 亿港元, 1995 年前九个月提高到 143.3 亿港元。在金融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 金融、保险业成为服务贸易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80 年代初, 金融、保险服务贸易分别只有 10 亿港元左右, 现在已形成一定规

模, 1994年已分别增长至221.6亿港元和82.9亿港元, 尤其是金融服务出口已达162.1亿港元, 是1980年的近29倍。目前保险出口服务已从出口贸易保险扩展至银行出口融资业务保险, 金融服务出口和保险服务输出业务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商。

5. 服务贸易与国际信息中心

信息是现代商业社会的神经中枢, 香港信息产业极为发达, 是亚太地区信息中心。香港直通国际电话服务遍及2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东南亚电话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香港原大东电报局通过卫星与美国加州戴亚洛和奥毕特两大资料中心联网, 可获得全世界机存文献的80%的资料数据和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光纤、电缆、微波通信也极为先进。香港拥有世界密度最高、最复杂的城市光缆网络。最近香港已加入Internet万维网资讯中心, 世界各地4000万客户可通过此网络获得香港的各种资讯。香港先进的现代化信息工具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为香港国际商业中心地位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80年代中以来, “其他商业服务”贸易有了新的的发展。其特点是: (1) 服务项目日渐增多, 资讯、电脑、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已建立起来; (2) 各类服务项目发展迅速, 一般都有近1倍至4倍的增长 (3) “其他商业服务”贸易是长期存在逆差的服务类别。这表明很有必要大力推动这类服务项目出口的发展, 以增强商业服务输出的能力。

1980年“其他商业服务”贸易只有45亿港元。以后随着香港对外经济活动的加强和各类专业服务的的发展, 1994年已扩大到338.8亿港元, 占当年服务贸易总额的8.8%, 其中资讯、电脑、法律、会计、建筑和建筑设计等“其他服务”贸易发展最为迅速, 1986—1992年间, 从19.7亿港元增加到103.8亿港元, 增长了4.3倍, 输入额从22.1亿港元增至82.6亿港元, 增长了3.7倍。同期, 新闻传播、广告及市场研究、酒店管理、电影节目的制作及发行等亦有近倍乃至2倍的增长。商业服务贸易的发展为香港国际商业服务中心的形成和提高,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 香港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服务贸易体系, 并具有一定的发展规模。1994年是香港服务贸易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服务输出首次超过港产品出口, 并被列为全球第10大商业服务出口区。至此, 香港服务贸易中心的地位已经确立。这标志着香港已从一个以有形贸易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国际贸易中心, 演变为现代国际贸易中心。服务贸易和转口贸易、离岸贸易以及港产品出口共同成为香港现代国际贸易中心的主要功能。服务贸易在服务于有形贸易、其他行业, 以及国际商业和生活需求的同时, 也完成了自己的出口。

归纳起来, 香港服务贸易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1) 是一个以运输、旅游贸易为龙头, 其他各项贸易蓬勃发展的服务贸易体系。(2) 大多数服务贸易均与有形贸易密切相联, 是一个以有形贸易持续发展为基础的服务贸易体系; (3) 长期以来, 运输、有关贸易的服务和金融服务贸易是创造贸易盈余的三大支柱, 其他服务贸易均存在贸易逆差。旅游业原是一个创造贸易盈余的重要行业, 但1993、1994两年已连续出现贸易逆差。

三、香港服务贸易中心展望

如前所述, 服务贸易是香港现代国际贸易中心的标志, 发展服务贸易又离不开发达的服务业。从目前来看, 香港已经是亚太乃至全球最重要的服务中心之一, 其收入在其社会经济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香港在第二产业外迁内地的情况下, 发展服务业的意义在于用大规模的服务输出来代替港产品输出的不足, 创造更大的收益。因此, 未来香港产业发展之路将会是沿着不断淘汰落后的产业, 探索新的服务项目, 提高已有的服务层次, 更加强化服务贸易服务经济的特色, 促进整体服务业不断升级的道路发展。主要表现在:

(1) 服务经济的色彩将更浓。传统的第二产业已基本完成向内地转移, 层次较低的第三产业逐渐迁入内地, 并利用内地更优良的条件开始转型和升级。有形贸易的增长将进一步转缓, 服务贸易增长将加快, 整个社会经济更具服务色彩。 (下转第18页)

香港“九七”回归与长期保持繁荣稳定

周维平

1997年7月1日,香港被英国侵占的历史就将宣告结束,中国人民遭受的历史耻辱将得以洗雪。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值得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热烈庆贺,也必将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欢迎和赞赏。把握“九七”回归的历史性机遇,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是香港同胞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一个十分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这不仅关系到香港经济本身的继续成长和600万香港同胞的福祉,而且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对于“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以及现代化建设规划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亚太地区以至世界金融、贸易的格局,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切实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经济领域的高度自治权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之一是: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各项规定,切实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经济领域的高度自治权。

基本法明确规定: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九七”以后,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财政收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不上缴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香港“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港币自由兑换。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保障资金的流动和进出自由。”“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保持自由港地位,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征收关税。”香港“为单独的关税地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协定,包括优惠贸易安排。”香港享有出口配额和自行签发产品的产地来源证待遇,“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鼓励

各项投资、技术进步并开发新兴产业。”此外,基本法对香港的土地契约、航运、民用航空等,亦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全面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上述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有利于保持香港原有的经济体制和机制,有利于继续保持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地区以及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信息中心中的地位。香港将仍然是多国、多方资本驰骋自如的理想场所。香港经济必将继续保持原有的生机和活力。

正确处理中央各部门、各省、区、市与特区的关系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之二是:正确处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央各部门、各省、区、市与特区的关系。

香港基本法第二章对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作出12条规定。其中大部分条款既体现了国家的主权原则,明确了中央人民政府管辖的具体范围与责任,又清楚地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一个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区域所享有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第二章第22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中央各部门、各省、区、市如需在香港“设立机构,须征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意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这些“机构及其人员均须遵守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须办理批准手续,其中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定居的人数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确定。”

基本法的上述规定实际上是正确处理“两制”关系的重要原则,是规范社会主义主体与资本主义香港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准绳,是确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地位的宪制性保障。

正是从上述原则规定出发,在“九七”以后,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关系,将实行“一国两币,两种货币制度,两个金融管理当局”的方针。内地与香港

的经贸关系将仍按对外经贸关系处理；双方经贸往来将遵循国际经贸活动的规则和惯例；双边贸易将视同进出口贸易，继续依照进出口贸易的制度和规则进行运作和管理；香港企业对内地的投资，将视同外商投资，实行与外商投资相同的政策。正确处理“两制”、两地的关系，有利于保持香港原来的经济体制和运作机制，更好地发挥香港对社会主义主体的补充作用，而且必将更好地促进香港经济自身的发展。

把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之三是：把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关系推向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把双方十多年来已经形成的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进入80年代以来，香港经济在内外因素的困扰下，仍然保持持续的增长。这固然反映了它的生机活力和很好的运作机制，而外围的有利因素，特别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支持。1978至1995年，香港对外贸易增长了23.24倍，同期内地与香港的双边贸易增长了90.02倍。双边贸易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1978年是9.27%，1995年上升为34.81%。现在，内地与香港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内地是香港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最大的转口市场，和居一、二位的香港产品出口市场。1979至1995年，香港在内地投资778亿美元，占内地外资的57.6%。34家香港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地开设分行和办事机构，1995年底，香港对内地贷款占其海外贷款的14%，香港成为内地融资的重要渠道，“红筹股”和“H股”先后在香港上市，改善了香港股市结构，扩大了香港股市规模。数以万计的港商投资“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如今这些企业遍布广东全省和全国各地，而内地在港开设的中资企业已达1800余家，投资总额超过250亿美元，成为香港仅次于英资的外来资本。

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中的以上成就，以及不胜枚举的其他成就，是在中英两国既合作又争拗的情况下，主要通过企业层面的微观活动而取得的。“九七”以后，在“一国两制”原则下，这种合作关系将不仅停留在微观层面上进行，而且必将通过宏观政策的协调，实现发展规划、产业转型、贸易拓展、

资金融通、基础建设等诸领域的配合和衔接。两地关系将按照互补互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这将大大有利于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促进作用。

有祖国作坚强后盾，有“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指引，有基本法的切实保障，依靠香港同胞和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九七”以后的香港必将长期保持繁荣和稳定。“东方之珠”定将更加璀璨！

保持和发挥香港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区域化优势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之四是：保持和发挥香港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区域化优势。

在内地改革开放中，香港与深圳、珠海经济特区，香港与珠江三角洲，香港与广东省，香港与华南地区，已经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融为一体、紧密的合作关系。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和华南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以广东和华南地区为主要腹地，香港经济在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形成和发展了它的区域化竞争优势，强化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信息中心的地位和影响。香港不仅成了中国走向世界的窗口和桥梁，成了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和基地；而且由于它与华南的结合，而大大加强了在亚太经济中的份量和实力。

可以预期，“九七”以后，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粤港澳区域经济，以及以香港为主要经济中心的华南经济区，必将成为亚太经济的重要经济增长点，成为东亚最具生机活力的一个经济增长区。香港参与国际竞争的区域化优势必将进一步强化。这对于香港长期保持繁荣稳定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广东要对香港长期保持繁荣稳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在内地与香港经济关系中，粤港经济关系处于突出的重要地位。粤港经济关系是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粤港经济合作，必须严格遵循“一国两制”的原则，切实执行香港基本法的各项规定，服从中央的统一部署，执行中央对港

的统一政策和方针。然而,粤港经济关系又是内地与香港经济关系中的一个相对特殊的组成部分,是“一般”中的“个别”,在“共性”中有“个性”,在“普遍性”中凸显着“特殊性”。

香港历史上隶属广东新安县(宝安县)。香港同胞中的绝大部分原籍是广东。广东话是香港最通用的方言。广东是全国唯一与香港陆地相连的省份。在本世纪20—30年代间,粤港澳三地早已结成了互通有无、互相依存的“天然”经济区域。那时,关于“省港澳”的习惯说法,以及人们用作广告宣传的“驰名省港澳”、“行销省港澳”等提法,形象地反映了三地经济关系的实际。许多著名的商号、厂家,往往把总部设在省会广州,把分号开设到香港、澳门。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在1949—1979的30年间,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广东与港澳的经济关系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但是,粤港之间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先行一步”,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粤港经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1979—1995年,广东实际利用港资399亿美元,占内地利用港资总额778亿美元的51.3%。投资领域从一般加工工业扩大到商贸、旅游、金融、房地产、基础设施、“三高”农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1990—1994年广东出口总额累计1167.07亿美元,其中对香港出口累计973.82亿美元,占83.44%。在广东已开业投产的3万多家“三资”企业和2万多家“三来一补”企业中,分别有八成和九成多由香港厂商创办。香港制造业七成以上工序迁入广东。广东成为港商投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这些企业经营情况的好坏,对香港整体经济特别是对其对外贸易具有重大的影响。

广东是香港同胞进入内地的重要通道。广东入境国际旅客1994年达到3426.78万人次,其中港澳同胞为3206.33万人次,占93.6%。粤港间的交通运输快捷方便。广九直通火车每天对开各4个车次,九龙至常平、佛山、肇庆也有固定车次连接。广州、汕头机场与香港启德机场每天都有飞机来往。文锦渡、皇岗和沙头角三个公路通道,每天平均行驶车辆超过2万辆次。在香港与深圳、东莞、广州间,直通巴士提供十分方便的服务。定期客轮服务通达广东21个市县。至1994年底广东连接香港的海陆空对外开放一类口岸已有49个,二类口岸154个,其

中装卸点96个,起运点58个。据报导,珠江三角洲已成为香港港口吞吐的主要支柱,目前所处理的集装箱约有六成来自或运往珠江三角洲。过去十年内,港珠来往货运量平均每年增加14%。

粤港之间的紧密联系,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水电供应的互通有无是一个突出方面。广东是香港的“单一供水来源”,1995年供应食用水6.9亿立方米,占全港淡水耗用量9.19亿立方米的75.1%。香港中华电力有限公司的供电系统与广东供电系统相连接,向广东输送电力。另与招商局集团签订合同向蛇口工业区和赤湾供应电力。1995年香港供应广东电力达5340太焦耳。在旅游、电讯、环保、防洪等方面的合作也日益密切。

近十多年是粤港之间各种活动空前发展的新时期,范围涉及体育、教育、医疗、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等许多领域。各种展销会、洽谈会、展览会、交流会、研讨会,以及各类比赛和联谊、培训活动,在粤港两地频繁举办。而粤港联手,有效地打击走私、偷渡、运毒、贩毒、偷运枪枝弹药、侵犯知识产权以及跨境刑事犯罪活动,对维持两地社会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雄辩地说明:“广东的发展与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两地的长期合作”(卢瑞华语),而广东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率先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是香港长期保持繁荣稳定十分重要的条件。

“九七”以后,粤港关系还是两种不同制度的兄弟省、区之间的关系,两种制度间的摩擦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始终遵守“互补互利,共同发展”、“平等协商,互谅互让”、“求同存异,互不干预”、“兼容并蓄,互相借鉴”、“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缩小差距,共同繁荣”的原则,广东必将对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粤港经济协作将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综合优势。在十分活跃的亚太经济地区中,粤港经济将会走向一体化,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①。

①引自《携手并进,共创繁荣——卢瑞华省长谈“九七”后的粤港经济》,载《南方日报》1996年6月29日第一版

[责任编辑:朱雪梅]

1995年11月,在香港召开了一个关于香港科技与工业的大型国际性研讨会,其中一个专门部份《迈向21世纪香港工业发展前景》,是研讨香港回归以后,在进入21世纪初期工业发展前景的。97香港回归初期,工业的走向是怎样的?前景又如何?这个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论者中有人着重讲2000年,包括97之后两年半时间作为准备,即讲回归初期,有人则着重讲前景、路向。其实讲初期是讲现实的出发点,讲前景、路向是讲指引和方向。应该是两者结合,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探索发展方向,作为工业发展的指引。否则若不重视或脱离现实出发点,得出的发展路向是行不通的;反之,不重视探索路向,看到其发展的本质所在,这个发展是盲目的、危险的。都不可取。

80年代末,香港工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是需要深入探讨的。

一、从香港经济转型来看香港工业转型

从8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就出现转型,从产业部门来说,是从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转变,香港从一个国际工商业城市、大都会向以服务业为主的大商埠转变。这个转变是由于服务业不断扩大及制造业相对萎缩所致。因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地价及工资的上升,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低档次、低素质、低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所占优势减缩几尽,制造业工序开始逐渐继而大量地转移至内地。这个转变开始是比较缓慢的,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便加快。估计到临近97和回归初期,能够内迁的都基本上内迁了。这从港府

公布的数据可以大致看出。

香港在就业人数方面,从事第三级服务行业总人数占香港在业工人总数的百分比持续上升,1980年占48%;1985年占54%;1995年占72%;从事制造业总人数占在业工人总数的百分比持续下降,1980年占42%;1985年占36%;1995年占18%。

香港本地生产总值方面,从事第三级服务行业生产总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持续上升,1980年约占67%;1985年占70%;1994年占83%。

从事制造业生产总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持续下降,1980年占24%;1985年占22%;1994年占9%。

雷强

①

时至今日,香港从事制造业的人数:93年为50.8万人(88年达80多万人);94年降至43.8万人;95年又降至38.6万人。看样子,还会降下去,有人甚至估计到2000年会降到20多万人;制造业总产值占本地生产总值已低于10%以下,95年仅达9.4%,如在短期内没有大量科技投入及科技人员加入,还将继续降下去。制造业在香港经济中,将不起支柱产业的作用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来计算制造业在香港就业人口中和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应占的百分比份额,已经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只希望制造业就业人口下降不要太快,因为香港还有三四十万制造业工人,下降太快,社会承受不起,导致出现过社会问题。在厂房价格和工资不断上升的条件下,香港邻近地区,珠江三角洲和东南亚地区,竞争剧烈,大规模进行低档低值的产品生产。今天在香港“造厂”已无大可能,而港深、港珠(珠江三角洲)、港澳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发展。

香港回归初期工业走向的几个问题

完善和逐步衔接,一般工业完全有条件迁移到深圳、珠江三角洲、广东和内地来,它们成为香港工业的基地。因此,香港发展工业的空间愈来愈小。但是,香港不能没有工业,它的第三级产业服务业需要一定的工业来支持,否则会脆弱不堪,难以承担国际大都会的重负。但无论如何,香港工业不再象六、七十年代时的风光,她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香港经济结构转型范围内)得到发展。这个“范围”,由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到了今天,形成了上述的香港经济结构的格局。有论者认为要改变香港制造业的“虚弱”状态,“要让它吃点‘补药’走平衡发展的道路。发达的服务业和发达的制造业是彼此依存,相互促进的,不可失之偏颇。”“一个成熟的经济体系,工业在其生产总值中应占有适当比重。资料显示,主要经济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韩国的工业比重大致在三至五成。香港也不应例外。香港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即使‘九七’后,在‘一国两制’前提下,香港也将独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用跨越界线和分工来取代特区经济自身内部的分工。”^②但是,香港是一个海岛型城市,她的发展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加上她与新、韩的起飞与成长不同,有其特殊道路。她有辽阔而有实力的腹地珠江三角洲、广东、内地。她与珠江三角洲经济上联系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发展到逐步融为一体的密切关系。如果香港的境外工业算是香港工业一个部分的话,为什么香港服务业的基础不算境外工业、不算珠江三角洲、广东的工业和经济呢?

是的,内地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经济体制不同,它们内部的经济的发展,确是不能互相取代,只能协调。但是,也要看到港澳与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了一个区域经济,在经济生活上它们之间的分工、互补与混合、融合成长已是客观地自发地不可阻挡地形成了。这里是不是有将政治上、经济体制上的“一国两制”和区域经济上的经济分工协作混同起来了。如果说要从香港经济转型出发来看香港工业的转型,就要从香港经济今天结构现状和形成的历史轨迹来看香港工业的转型。

本来,香港工业大规模内迁之后,留下来的工业就有利于工业技术转型。但由于工业内迁带动了香港第三产业的发展,加上香港境内工业依赖迁往内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更大发展而松了一口气,减轻了转型的压力。于是香港出现了两种不协调的情况:经济结构转型加快,而产业结构转型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却放慢。这种情况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二、香港的“境内工业”与“境外工业”

这个提法是有争议的。有论者认为离开香港的工业就是往外地投资的关系,是外地工业。不属于香港的工业范畴了。但有论者则认为从六、七十年代以来香港一直有海外工业投资,但从80年代开始,当香港工业以“三来一补”、“三资企业”形式大量转移到内地来时,又复以各种半制成品及成品转回香港加工包装再出口。它的总部在香港,老板在香港,生产基地在内地。它的工厂仅在广东,91年估计就超过2万5千多家,是香港工厂数4.6万多家的一半以上。从1986年至1996年,广东批准设立的“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中属港商投资的,前者有44100多家,属后者有21900家,合共66000多家。为港资工厂服务的工人超过300万,是香港企业工人40余万的七、八倍。从88年以来这种境外工业的工厂数、工人数和工业总产值都在迅速增加,而且比香港境内工业增加快。

可见,客观上是存在一个港资投资培育起来的外地工业“香港的境外工业”,或是不叫这个词,改叫别的什么。香港境内工业与境外工业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在目前和97香港回归祖国初期,香港境外工业还要有个较大发展,而且回过头来帮助、促进境内工业的发展。因为不仅留下来的香港工业需要升级转型,就是香港的境外工业,为适应国际上竞争的需要,也十分需要提高科技含量,也需要升级转型。

“境外工业大大促进香港工业的发展,使珠江三角洲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市场容量不断扩大,使香

港厂商着手改变原来‘成本重视型’投资策略，大力进行‘市场开发型’投资，为香港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珠江三角洲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到80年代末，各地方政府开始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有意识地出让部分国有企业的产权，以换取市场，获得技术，也给香港工业企业对内地的工业企业的收购、兼并提供了机遇。时至今日，港珠经济关系日益密切，香港工业已不能脱离珠江三角洲独立地发展，境外香港工业与内地工业结合和合作，使香港工业在投资的规模、领域、形式、区域和收益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与发展。香港工业的发展会形成首脑在香港，主力在内地之势。”③

香港投资广东工业与本地工业作对比

年份 项目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香港在广东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亿元)	20.71		570.15	794.78	1046.11	1824.56
香港工业总产值(亿港元)	1348.99	1456.25	1529.43	1534.59	160819	
香港制造业工厂数目(个)	49087	46276	41937	39238	34068	31114
香港投资广东企业数目(个)						

注：根据历年《广东统计年鉴》、《香港1992》—《香港1996》及广东省对外经贸委数字推算出。

因此，研究香港工业这两部分的关系和发展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有趣的是，随着香港工业的内迁和对内地工业企业的收购、兼并，香港的外资工业、特别是中资企业，有的也有香港工业的做法，有一段时间还成为小趋势。“如香港上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大部分生产线陆续撤回上海后，投资办了26家企业，准备将前景好的几家加以投资，帮助他们加快发展，力争成为上海同行业企业的头几名，帮助他们打入国际市场占一席之地，并考虑将经营好的企业发展为二级集团，使其自成系统，自我发展。可见，中资工业内迁对香港工业和内地工业合作发展起‘假洋鬼子’的积极作用。”④粤海投资也有一定数量在内地投资工业。

这里之所以说有趣，是有两个不同的命题，中资、中资工业投资内地工业，算不算“香港的境外

工业”？引伸出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评价中资、中资工业投资内地的趋势。它们有优势，有利可图，是能够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趋势与中资的基本任务开拓国际市场，是否相符？

三、2000年香港工业发展路向

关于这个问题，有论者认为“高增值是目的，高科技是手段，香港未来工业发展路向的选择是：高增值与高科技相结合，通过发展科技实现高增值。”⑤而“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是香港工业发展的根本出路。”“通过香港中资企业的示范作用，引导大财团投资高科技产业是发展工业的可行途径。”⑥毫无例外的，认为香港需要发展工业的众论者，都要求香港政府加大力度支持香港制造业的发展，以补长期落后于亚洲三小龙之势。在具体的路向上，有论者提出今后香港工业的发展主要依赖国内市场，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来代替劳动密集型产业，用自创品牌生产来代替OEM生产，组织大企业集团加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量等等。这些都是对的。但还应该结合香港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况，从全面、现实角度来考虑2000年香港工业发展路向。这个路向将是：依靠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相结合、境内香港工业与境外香港工业相结合共同发展、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相结合、广大中小型企业与少数企业集团相结合、OEM生产与自创品牌生产相结合、承判制与大型独家经营相结合，政府积极扶持转型的出口加工业。总而言之，是“几个结合”和政府积极扶持的路向。⑦但上述几个“结合”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变动的，它们是有侧重点的，这个侧重点在于结合的后者。初期，应该有个趋势，将来有个主导。从趋势来讲是几个结合的后者（指“国内市场”、“境外香港工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集团”、“自创品牌生产”、“大型独家经营”。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与“自创品牌生产”）它的形成要有一个过程，不会在短期内顺利实现，要在一个较长时期才能艰巨地逐步实现。这就要看香港和内地的共同努力和特区政府的政策了，要看市场检验和结果了。而且97之后，特区政府还

需要有个探索工业发展的试验期。

根据香港的具体情况,当作一种产业来说,香港是极难成长、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国际上高科技几乎都是从国防工业、从军用转为民用开发出来的。民间无法承担高科技产业的昂贵费用。香港回归初期新型工业的内涵应包括以下四大方面:

(a) 用实用的高新技术来改造和武装已在国际上名列前茅的传统产业、产品;

(b) 寻找、开发适合香港的新的新兴产业和新兴产品;

(c) 发挥香港多功能国际经济中心的“中介”作用;联结海内外,积极发展“联系工业”;

(d) 利用香港优势,依靠国内科技力量,努力发掘一些高新技术;

上述b、c、d在回归初期,都不会是大量存在的,

较大量的还是在a。可见,是要在一定范围内(香港经济结构转型范围内)来考虑工业转型的。

在大致确定工业发展路向之后,下一步就可以来研究确立香港的新兴工业,特别是联系珠江三角洲、广东省、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的确立来进行。

注:

①《香港1996》P41—42。

②《紫荆》杂志1996年8月号P18。

③《学术研究》杂志1996年4月刊P72。

④同上P74。

⑤《港澳经济月刊》(广东港澳经济研究会编辑并出版)1996年2月号P2。

⑥《中国与亚太区域科技创新与工业发展迈向廿一世纪国际研讨会》论文集P39—45。

⑦同注③P74。

[责任编辑:陈丽君]

(上接第11页)

(2) 香港要保持服务业在亚太地区继续领先,一方面要促进服务业的升级,致力发展需要较高技术、专业知识、技能和创意的服务业,最大限度地发挥香港拥有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走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前面;另一方面要设法提高服务业特别是低增值服务业的生产力,如通过先进科技和管理来提高效率。

(3) 由于技术进步,香港一些高增值、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对迁入内地的工业,也已注意到利用内地的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加上香港发达的市场信息及市场营销,尽快使其升级。由此对香港的服务需求将会不断增长,为服务业建立更为稳固的基础。

(4) 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增长期,全球商业贸易加速发展,国际资金流动加快,这必将大大促进世界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从而为香港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极大的机遇,香港服务业优势的发挥将使服务输出的规模不断扩大。

维持和提高香港服务贸易中心地位,是内地和香港的共同利益所在,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都

有好处。香港服务贸易中心的形成,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不断演进,也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中国未来的经济腾飞,必将为香港服务贸易向更高层次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香港面对现实,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抓住机遇,发挥所长,就一定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巩固和提高服务贸易中心地位;而香港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心功能将进一步向服务贸易的方向发展。

资料来源:

1. 一九九六年半年经济报告 香港布政司署 1996年8月
2. 一九九五年经济概况 香港布政司署 1996年3月
3. 本地生产总值估计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九三年 香港政府统计处 1994年3月
4. 本地生产总值估计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九五年 香港政府统计处 1996年3月
5. 一九九六至九七财政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附件:支援及推广服务行业 经济司、工商司 1996年3月
6. 《香港贸易及贸易支援服务》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部 1996年4月出版

[责任编辑:周运源]

香港服务贸易中心地位的强化与服务业的发展

林 江

随着“九七”的临近，人们越来越关注香港经济结构的变化与香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系问题。而在香港经济结构中，服务业的地位无疑举足轻重。笔者认为今后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动力将主要来自服务贸易，而香港服务贸易中心地位的强化则是香港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转口贸易与离岸贸易

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十六年以来，香港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部分劳动密集型的工序均迁移至华南地区，从而使香港转口增长的步伐较港产品出口更为迅速。这主要是由于大量货物输入香港，并转口往华南地区进行加工，然后将制成品输回香港，再转口至海外市场。与此同时，香港厂商除了在内地设厂生产外，也在亚洲其它国家进行生产，从而充分利用这些国家的低廉生产成本和不断完善的投资环境。亚洲多个发展中国家，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现已成为香港厂商的重要生产基地，制造出在价格上具竞争力的产品销往发达国家。随着亚太区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日益增加，香港作为亚太区内贸易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近年来，随着香港外贸结构的不断变化，转口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1988和1991年，转口占香港出口总值的56%和70%，到了1994及1995年，这个比重分别上升至81%和83%。尽管香港厂商在华南地区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转口贸易也持续增长，但有证据显示，近年香港的转运及直接付运

(统称离岸贸易)的增幅要比转口大得多。而现行香港的贸易统计数字，并不能全面反映香港厂商的业务增长状况。

转运贸易是指以联运提单方式付运货物，其付货点及提货点均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转运贸易与转口贸易的差别，在于毋须向香港海关申报其货值，货物也不需要香港加工或重新包装，只是经短暂停留之后，再转运往目的地。至于直接付运，则是直接由生产地付运到客户那里而毋须经过香港转运。

正是由于转运贸易毋须在香港清关，而直接付运又不进入香港境内，有关数字并不记录于香港转口贸易统计资料之中，故转运贸易和直接付运可统称为离岸贸易。

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估计，香港厂商上述以转运及直接付运形式进行的无记录出口贸易，于1994年的总值达6550亿港元，相当于同年香港转口贸易总值的70%。相比之下，于1988及1991年时，香港的离岸贸易对转口贸易的比重为50%，充分反映离岸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大大增加。而近年香港厂商业务发展蓬勃，实得益于离岸贸易的迅速增长和转口贸易的不断上升。

二、转运贸易增长显著

在离岸贸易中，又以转运贸易的增长较为显著。据港府的统计数字，1994年全年香港通过海运向全球各地出口(含转口及港产品出口)的货物，按重量计算比1993年增长了14%，但同期通过海路转运的货物竟激增41%；1995年上半年海运出口比上

年同期增长15%，而同期海运离港转运货物大幅度增长39%。以重量计算，转运货物占海运离港货物总量的43%。

按地理方向划分，香港转运贸易较集中于亚太区几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中国内地、美国、日本、台湾、新加坡等地。以1995年上半年为例，香港海运离港转运货物总重量为830万公吨，其中200万公吨转往中国内地（占总量的24%），100万公吨转往美国（占总量的12%），40万吨分别转往日本、德国和台湾（均占总量的5%），30万公吨转往英国（占总量的3%）；同期海运抵港的转运货物总量为790万公吨，其中270万公吨来自中国内地（占总量的35%），130万公吨来自美国（占总量的16%），100万公吨来自台湾（占总量的12%），60万公吨来自日本（占总量的7%）；30万公吨来自新加坡（占总量的4%），其余210万公吨则来自其他国家。

中国内地已成为香港转运贸易的最大贸易伙伴。无论从香港转运货物的来源地还是从其转往的市场看，中国内地均位居榜首。自1990年以来，内地货物经香港转运的增幅不断扩大。1990年仅较1989年增长了3%，但1994年首9个月就比1993年同期增长了42.7%，且转运总量几乎与1993年的全年水平相当；在各地经香港对内地的转运方面，从1990年至1994年首9个月，每年的增幅在32%（1990年）和76%（1991年）之间，呈现负增长的仅为1990年一年，其余每年都有较大增幅。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首9个月就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1.6%，且总量超过了1993年全年的水平。毫无疑问，转运贸易作为离岸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香港这个国际贸易中心的一项重要服务功能。

三、贸易发展局的研究报告

香港贸易发展局1996年4月发表了一份题为《香港贸易及贸易支援服务》的研究报告。在选写该份报告过程中，贸易发展局对香港的2510家公司进行了访问或问卷调查，并采用了采访公司付运不同产地货物的模式来评估香港离岸贸易的总值，从而

得出上文的1994年离岸贸易总值达6550亿港元，约占转口贸易的70%的估算结果。有关数据请参阅下表。

香港离岸贸易估计（单位：亿港元）

	受访公司（家）	1994年香港整体贸易
港产品出口	150（16%）	2220（19%）
转口	760（84%）	9480（81%）
总出口	910（100%）	11700（100%）
离岸贸易	400	6550

资料来源：《香港贸易及贸易支援服务》，香港贸易发展局
研究部1996年4月出版。

在厂商的生产及货运安排方面，该份研究报告得出以下结论：

（1）在这些受访公司所销售的中国产品中，绝大部分经香港转口往海外市场，不过转口所占的比重已由3年前的81%下降至75%。与此同时，转运和直接付运所占的比重则分别由11%和8%上升至13%和12%。

（2）按产品种类看，以电器、纺织品、服装、旅行用品及手袋、鞋履最普遍采用直接付运方式出口，其中大部分直接付运的货品均在广东以外省市制造。

（3）随着业务的迅速增长以及逐渐多元化，有37%的受访公司所销售的产品来自多个第三国家（地区），包括亚洲区内的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印度，以及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方国家。从事这些业务的公司只充当纯粹的贸易商或代理商角色。

（4）在第三国家（地区）产品出口方面，香港厂商的业务增长可观，直接付运的相对比重增幅由3年前的36%上升到43%，而转运的比重则维持在约12%的水平。同期间，虽然转口所占的比重由52%下跌至46%，但经香港转口的第三国家产品不断出现实质增长，反映出在第三国家制造的产品多直接由生产地运往海外市场。

贸易发展局的研究报告印证了本文的一个结

论,那就是随着香港制造业的北移和向东南亚国家转移、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原本在香港完成的一些后期加工处理和包装工序转移到内地或东南亚国家完成,使得内地及第三国家产品可以不经香港直接付运到目的地或运到香港后直接装船运走而毋须在香港清关。这样一来,部分转口贸易就转变为转运贸易和直接付运贸易(即离岸贸易)。从近年的统计数字及调查所得来看,香港离岸贸易的增长势头十分强劲,长此下去,预期香港在本世纪末将会发展成为离岸贸易中心。

四、离岸贸易快速增长的多种因素

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是受多种因素的推动所致。随着港商不断把货物供应来源和出口市场扩展至较远地区,无论从实际需要还是地理角度看,这些货物均无必要经香港转口。即使是在内地生产的货物,也日益趋向采用转运或直接付运的形式供货,其中部分原因是随着内地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现在已毋须将产品先运回香港作最后加工然后才出口。另外部分原因是近年来内地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远洋航运能力持续提高,相关的贸易服务项目日益丰富。而服务业的扩大对外开放又使得原先需在香港完成的各种辅助服务,包括安排国际认可的文件、货物保险、质检、集装、安排海外班船营运、发出提单等均可在内地完成,从而使部分转口变为转运。当然,从事转口及离岸贸易的盈利不俗,也是离岸贸易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据贸易发展局的估算,在新的营运环境下,经营中国内地及第三国家产品出口的港商,现时可分别赚取16.1%和12.6%的平均毛利,相比之下,与经营港产品出口的平均毛利16.5%不遑多让。

当然,说香港逐渐发展成离岸贸易中心,与转口贸易仍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的说法并不矛盾。统计数字显示,1990至1995年间,香港的转口贸易以年平均21%的幅度增长,可见踏入九十年代以来

香港的转口功能仍然得到了强化。因此,未来几年预计离岸贸易将会与转口贸易共同增长,但离岸贸易的增长速度可能会较转口贸易的增长速度来得快。

五、服务贸易中心地位的强化

值得指出的是,香港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将会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服务贸易中心的角色,而其中,贸易支援服务的作用将日益显著。

香港的服务贸易包括运输(含海、陆、空运)、旅游(含商业及私人旅游)、保险(含直接投保与分保)、金融(含银行、财务资产交易及经纪服务)、贸易支援服务(含离岸贸易、购物服务及其它贸易有关的服务)及其它商业服务(含通讯、法律、建筑、工业、广告、市场调查、会计、房地产、酒店等服务)。

根据港府统计处的数字,香港的服务出口以快速的步伐增长,1985年至1995年的10年间年平均增幅为17%,在1995年,服务出口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26%,而在10年前则为22%;服务业的出口总值也从1985年的610亿港元上升至2910亿港元。

在服务贸易中,又以服务出口的表现最为突出。1984年,香港服务出口占本港生产总值的41%,1994年,服务出口总值首次超过本地生产总值。而各类服务业在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则由1984年的67.3%上升至1994年的83%。

在服务贸易之中,与离岸贸易有直接关系的是贸易支援服务,其内容包括运输和仓储,具体在转运贸易方面,其所需的服务则涉及航运服务、港口服务、导航服务以及拖船服务等。至于直接付运方面,由于所涉货物并不流经香港境内,故毋须在香港提供这些服务。然而,转运和直接付运仍可为在内地或第三国家(地区)设点的运输及仓储公司带来利益,贸易支援服务当然离不开贸易融资和保险。香港拥有发达的、高效率的银行体系以及提供完善的银行服务。一般厂家均愿意在香港安排贸易融资。

与此同时,香港保险业的运作也十分灵活且颇具竞争力,可为香港厂家提供全面服务,它不仅可为港产品出口和转口提供保险服务,而且可把服务对象扩大至转运和直接付运;贸易支援服务也与香港在内地的生产和市场推广活动有关。这些服务涉及产品测试、检验、广告、市场研究及顾问服务等方面,这些是属于知识和人力密集型的服务。这类服务通常是由暂时派驻内地的香港专业人士及技术人员提供。由于香港在内地有大量的投资,同时又是内地多种业务的服务中心,故在提供上述贸易支援服务方面极具优势。

贸易支援服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对建立区域性的贸易指挥总部提出要求。香港拥有地理位置优越、税率低和税制简单、法律制度健全、基础设施先进等优势,是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性指挥总部的理想地点,而通过香港从事贸易活动也十分方便。港府工业署1995年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香港共有972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从事贸易分销活动,业务范围包括批发、零售、进口和出口。随着亚太区特别是中国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继续开放市场,香港作为亚太区贸易中心的地位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而市场对香港提供的贸易支援服务的需求将不断增加,而这些服务在香港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将日益重要。虽然这种增长态势并不会因为付运方式的转变而受到太大影响,但是离岸贸易重要性日趋显著将会为贸易支援服务的增长带来正面的作用。据港府统计处的数字,1994年,与离岸货物买卖有关的服务收益达520亿港元,占香港内部生产总值的5%,而同期海上货物运输和货运总值分别为370亿港元(占3.6%)和56亿港元(0.6%)。显然,香港的贸易支援服务的出口总值十分可观。

六、香港是贸易商在亚太区内设立指挥部的理想地点

上述香港贸易发展局所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香港大部分厂商将会继续在本地提供或使用贸易支

援服务。而受访公司一致认为香港是他们指挥总部的理想所在地,有逾92%的受访公司表示会保留在香港的指挥总部。

毋庸置疑,由离岸贸易所带动的贸易支援服务的快速增长将会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服务贸易中心的地位。历史经验证明,香港服务贸易的长足发展为改善香港的国际收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香港本销市场狭小,故每年均有颇大的有形贸易赤字,但在香港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每年都会有逾百亿港元的盈余,事实上,从1983年到1994年间,香港从未出现过贸易赤字,这是拜服务贸易的巨额盈余加以平衡所赐。换言之,没有服务贸易的巨额盈余,香港对外贸易就最终难以摆脱庞大赤字的命运,这样,港元汇率将面临庞大的下调压力,联系汇率制也会受到挑战,要确保香港经济的稳健增长和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也是一句空话。

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香港贸易收支自1993年以来首次出现赤字,这说明香港有必要进一步推动服务业的升级换代,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服务贸易中心。

贸易发展局的研究报告指出,随着离岸贸易日益增长,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将由转口港演变为指挥部中心,负责管理中国内地与世界各地之间直接和间接贸易,以及提供全面的贸易支援服务。笔者认为,香港作为转口港的角色,未必会因离岸贸易的增长而即时有所改变,因为离岸贸易与转口贸易不一定是零和游戏,两者可能会随着亚太区特别是中国内地经济的日益蓬勃而共生共荣。笔者倒是赞同该研究报告关于香港作为亚太区运输中心的一个结论:鉴于香港主要为华南地区提供服务,故来自新兴工业国如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转运中心以及以转运中国北部的货物往美国及加拿大为主要业务的日本的神户和韩国的釜山的港口的竞争压力并不大。然而,若台湾的高雄港成功发展为一个离岸货运中心,则可能会对香港构成竞争威胁。不过,一旦海峡两岸实现通航,亚太区内贸易必定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带来的正面效用应可抵销来自高雄的威胁。

七、香港服务业的增长动力来自服务贸易

香港服务贸易中心地位的不断巩固以及贸易支援服务的迅猛发展将为服务业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动力。事实上,自八十年代以来,香港服务业的增长完全是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的结果,而服务贸易也支撑着制造业的发展。

1983至1993年的10年间,香港服务业的雇员占本地就业人口的比例从55%增加至77.5%。制造业工人所占的比例则由41%下跌至19.7%。在本地生产总值之中,服务业所作的贡献由62.3%上升至78.1%,制造业所作的贡献则由23%下跌至11.2%。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在公元2003年香港的就业人口将全部集中于服务业。与此同时,以香港本土为生产地的狭义制造业将不断萎缩,而以内地及海外作为生产地的广义制造业则未必会萎缩,因为香港厂商只是把大部份生产工序转移至内地及海外,大多数厂商仍然会选择香港作为获得各类贸易支援服务的基地。香港的制造业将会以广义的形式(即超越地理界限)表现出来。

今后香港服务业的增长动力将仍然来自服务贸易。我们知道,服务贸易是给商品的生产或其他服

务提供的一种服务,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的主要分别是前者并非直接由消费者消费,而商品贸易则是为最终消费服务。据统计,在1983年至1993年间,香港的服务贸易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32.5%大幅增加至46%。

香港服务贸易的迅速增长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香港厂商的生产工序已迁移至华南或其他地区;二是随着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区内贸易与投资活动日趋一体化。这样一来,随着对经香港出口、进口或转口的货物的需求的增加,对包括贸易支援服务在内的服务贸易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从而将推动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服务贸易也有助于推动制造业的升级。因为服务贸易可将先进科学技术引进于制造行业之中,使制造业得以降低生产成本,发展新的产品和更具效率的分销方法。提供大部分服务的人员是会计师、银行家、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使用这些服务的则是制造业厂家。服务贸易将推动着生产和消费的充分增长。

既然服务贸易在提高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香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港府财政司在今年三月所作的九六至九七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提到要采取若干措施鼓励服务业,特别是贸易支援服务的发展应是具战略意义之举。

[责任编辑:陈丽君]

张浚生先生受聘 为中山大学兼职教授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先生,被聘任为中山大学兼职教授,聘任仪式于1996年11月16日在梁铨璐堂举行,广东省高教厅厅长兼中山大学党委书记许学强教授向张先生颁发了证书(图片见封三)。

张浚生先生195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曾在该校任教25年。受聘仪式上,张先生发表了即席演讲,对中山大学的聘任表示感谢,并表示将与中山大学的同事们共同推动港澳研究工作。

仪式后,张浚生还参观了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

从变数看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前景

张仲深

香港回归祖国的期限日益临近,香港经济发展的动向倍受关注。“九七”后香港国际贸易中心能否继续保持不变,这直接影响到香港未来继续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的形象,故此全球为之瞩目。本文仅从变数因子的交叉效应的角度作些探讨。

一、贸易自由化是香港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战后不到半个世纪,香港已从传统的单一转口贸易港演进为现代国际贸易中心,昔日小渔村变成当今繁荣发达的多元化现代国际大都会。回眸一瞥,温故知新。香港从开埠之始就被定位为自由港。长期发挥了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的作用。五十年代初因朝鲜战争和联合国对华“禁运”,香港转口贸易一落千丈。香港被形容为一座“正在消失的城市”。然而香港并没有走向末日,而是运用HK模式的结构转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崛起为一个新兴工业地区。以轻纺产品为主的出口加工业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为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张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59年贸易结构从转口为主转变为以港产品出口为主,表明香港经济已成功转轨。六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七十年代之后向多元化发展。随着工业与外贸的持续高涨,为之提供服务的金融、保险、航运、通讯、商业、仓储、房地产、旅游以及港口、码头和各项基本设施蓬勃兴起,形成网络系统。以金融、贸易为核心的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积聚和辐射力不仅涵盖亚太地区,而且遍及全世界。香港在国际分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确立了国

际轻工制造业、金融、贸易、航运、旅游和信息中心的地位。

进入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香港经济再次转型提供契机。转型期间香港工业与服务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贸易结构重新变成以转口为主,约九成劳密型产业内迁,华南地区迅速崛起为香港最大的外发加工基地。投资带动贸易和“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有力地刺激了香港贸易(有形与无形)的全面高涨,使其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不断提升。

二、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现状与香港繁荣

香港通过对外贸易的大进大出,利用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而登上世界舞台。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保障了资本、货物、劳务、人员在全世界大流动、大循环,带来了香港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香港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五大中心之一。

(1) 贸易中心。1995年外贸总值达3741亿美元,是世界第八大贸易实体。人均贸易值为5.33万美元,名列世界前茅。对外贸易网络遍布全球220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相对集中和稳定的十大市场。没有外交关系或无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地区)都可通过香港进行间接贸易,香港起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中介作用。香港贸易发展局在34个国家(地区)设立了50多个办事处,有972间境外跨国公司在香港设亚太区总部。70年代以来,成衣、手表、玩具、塑料制品等10种港产品出口名列世界第一,历久不

衰。现在香港仍然是全球最大的钟表、玩具的出口地，成衣也依然名列前茅。从1947—1993年，香港外贸增长了764倍，年均递增15.5%。现在，香港的外贸依存度已达256%，如把服务出口及进口计算在内，则高达297%。香港经济的开放度、外向度、自由度和外贸依存度之高是世界无与伦比的。这反映了香港参与国际分工及与世界经济相互渗透的深度与广度，也证明了香港在世界贸易中作出的贡献。

香港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它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香港是关贸总协定的一个缔约方，1995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它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成员之一，足证香港已在国际经济贸易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

(2) 金融中心。香港通常被视为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最大的前百名银行中有85间在港营业。认可机构有380间，向客户提供贷款和垫款资产总额达37378.6亿港元，为蓬勃增长的贸易、工业等行业提供雄厚的融资服务。香港是世界第五大外汇市场、第八大股票市场（亚洲排第二位）、最大黄金市场之一，也是亚太区最重要的银团贷款中心。还有，期货市场、保险市场、基金市场、债券市场和租赁市场的发展也异常蓬勃。庞大的金融体系吸引了数额达天文数字的国际资本投入运作，交投活跃。

(3) 航运中心。香港是全球第一大货柜港，维多利亚港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1995年处理的标准货柜单位1250万个，为全球之冠。进出港口的船舶约214000航次，装卸的货物共重1.69亿公吨，运载的旅客为2100万人次。港口设施先进，管理科学，服务素质和效率之高不仅在远东首屈一指，在全世界也位居前列。

香港也是亚太区乃至国际航空中心。启德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最高效的航空港之一。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两班飞机起落（设计夜间禁止起落时间），客运量居世界第四位，货运量位列世界第二。

(4) 旅游中心。香港是东西方文化荟萃之地，也是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既是世界贸易中心，又是

“购物天堂”和“美食世界”。不仅全球的商贾云集香港，而且千百万游客亦慕名而来。1995年抵港的各国旅客1020万名，旅客消费720亿港元，其中购物一项就超过50%。

(5) 信息中心。香港建立了天体一体化的信息系统。卫星、电缆、光纤、微波、移动电话等先进技术普遍应用。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和利用能力以及现代信息技术要素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香港是全球电话普及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平均每百人拥有68台电话或53条电话线。传呼机人均使用率居世界首位。图文传真线路普及率居全球第二位，引进了Internet万维网资讯中心。香港是全球的印刷和出版中心。有90多家国际新闻机构在香港设立亚太区总部、分社或办事处。

上述五大经济中心实际上就是香港现代国际贸易中心的多元网络结构，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是相辅相成的，彼此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香港经济是以现代工业为基础、以贸易为主导、持续高速腾飞起来的。HK模式是香港融入世界经济，达至当今繁荣稳定的原动力。

三、HK模式的变数因子分析

HK模式是多元互动高殖变数的动态函数。作用于HK模式的变数因子极其错综复杂，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内外交叉，正负并存，互相作用，并依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而转化，通过内因而起决定作用。这里仅就HK模式成功之道在经济方面的六大变数作些探讨。

(1) 私有制的游戏规则。香港经济是在特殊条件下的当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是其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资本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庞大的金融体系给持续高速扩张的对外贸易提供了融资保证。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是香港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质的联系。发财致富是任何一项经济活动的驱动力。价值规律以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这一铁的法则最有效地

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刺激了科技进步,优化了社会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企业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香港没有“大锅饭”和“铁饭碗”,也没有“保险箱”。全社会遵循的是私有制游戏规则及其价值观、信念和原则,按国际惯例办事。港人“在商言商”。十一万间进出口贸易机构和五十多万从业人员日夜拼搏,货如轮转。几乎全港企业都直接或间接卷入其中,通过高参与、高投入的高效运作达到高增值的目的。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和弊病香港都存在。如残酷的剥削,激烈的竞争,失业、通货膨胀等等,不胜枚举。因此,时刻都有倒闭、破产、失败的事情发生,同时也有开业、发财、成功的现象涌现。香港外贸就是在私有制的游戏规则中不断前进的。

(2) 高自由度竞争力。香港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个自由港城市,是港府的政策保障了贸易自由、企业经营自由、资金进出自由、港币兑换自由、汇兑自由、信息自由、黄金买卖自由、外国人出入境手续简便。没有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进口商品除烟酒等极少数品种要课税外,其余一律免税,还实行低税制。总之,保障了资本、货物、人员和劳务在全球流动的自由。高自由度赋予香港对外贸易以巨大的综合优势,包括贸易资源、市场、渠道、网络、信息等等,故其活力过人。同时,港府实行积极不干预主义,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上既不干预企业的业务活动,也绝不给以任何津贴,而是放手让市场力量去发挥它的调节作用,港府不当“婆婆”和“救火队”;另方面在宏观层面上着力营造优良的商业环境,千方百计吸引全球商贾放心到香港来投资和赚钱。对那些责无旁贷的或对文明社会的运作关系重大的事务,视乎具体情况而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做到“你投资、我欢迎;你发财,我征税;你亏本,我不管;你违法,我检控”,从而发挥了“有形之手”的应有作用,保证了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有序、高效运作。“金融滚滚汇香岛,世贸源源振宇寰”就是它的生动写照。

(3) 网络结构多元化。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出现了从单一国家经济走向网络结构多元化经济的趋势。HK模式从单一转口贸易演进为网络结构多元化而成,从垂直的力度解放为向立体几何的辐射扩张,因此在瞬息万变的商品市场中,一再取得竞争优势。香港具有相对集中和稳定的十大市场和十大出口产品的优势。服务贸易蓬勃增长,保证了商品贸易的高赤字得以解决,使贸易中心更具竞争优势。

(4) 信息变数多元化和高频敏性、全球性。世界已进入了新世纪的信息高速公路化的年代。经济活动的方式日益信息化。信息即财富。信息即导向。HK模式分秒之间都处于信息化动势之中。香港现代化信息系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使香港外贸地位不断攀升,令美元黄金滚滚而来。没有它,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就会因方向不明而失去生机与活力。正是因为有了它,港商才变成了“知风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灵活因应,出奇制胜。否则,“知风鸟”就将变成“木鸡”,一片繁荣兴旺的世界贸易中心必将黯然失色。

(5) 商品市场国际化。这是HK模式的主要空间,香港的一切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都与这个变数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由港吸引了各国商品前来竞销,时尚精品,应有尽有,价廉物美,领导潮流。香港是闻名的“购物天堂”,千百万国际游客是购买力极高的“上帝”。消费品市场的顾客来自五大洲。港产品的90%是出口外销的。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快速变化以及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保证了市场购销两旺的发展势头。只要商品市场国际化模式不受破坏, HK模式的活力就是无穷的。

(6) 战后席卷全球的科技革命、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亚太区经济崛起,内地改革开放的推动及两岸经贸合作交流的扩大等等,对HK模式都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HK模式的变数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即使是正面变数,其发展方向也可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走势。在对诸多复杂变数因子进行探讨时,绝不应忽视负面变数及非经济变数因子的交叉作用。

(1) 国际风云变幻莫测, 不稳定因素和局部军事冲突的危险性依然存在, 将给国际经贸环境蒙上阴影。

(2)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突发事件必然会波及香港, 如石油危机、经济衰退、股市风暴、金融危机、汇率波动, 等等。中美贸易争端必然对 HK 模式造成负面影响。贸易保护主义也会给香港出口设置障碍。

(3) 内地实行宏观调控和适度从紧的财金政策、高通货膨胀率及两种制度、两种不同的体制、法制、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所引发的矛盾, 也有可能产生负效应。

竞争日趋激烈, 韩国、新加坡、台湾、东盟国家与内地是强大的竞争压力。香港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面临东京、新加坡、高雄的挑战。

(4) 香港的优势可能转化。迹象已表明香港整体经济发展速度已放缓, 外贸大幅度增长的势头已减弱, 工业技术升级步履维艰, 机场、码头、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这将使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受损。

(5) “九七”前后, 香港社会各派政治力量急剧分化与重组, 不同背景的各大财团之间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 各阶层人士社会心态的调适, 港府政治架构运作及积极不干预政策的调整, 在港国际资本去留的取向, 等等, 对香港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6) 落实《基本法》过程中还会陆续暴露各种矛盾。矛盾运动可能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 矛盾性质也可能转化。香港是个非常敏感的地区, 矛盾如处理不当, 对经济将造成冲击。

由此可见, HK 模式的变数十分复杂, 隐忧是客观存在。很值得理性地进行全面深入的观察, 认真对待。

四、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前景光明

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发展和变化中, 没有运动就没有世界。HK 模式时刻都处于变数动态之中。特别是“九七”香港回归, 是历史性变革,

风险总是不能绝对排除的。更何况“一国两制”是个创举, 在实践过程中将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九七”后香港国际贸易中心是在全新的“一国两制”框架下运作, 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 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将被取代。在过渡时期, 香港某些外资银行、公司或地区总部迁走时, 去处包括了新加坡、曼谷、台北、吉隆坡、雅加达和马尼拉。他们把这些大城市看作是“下一个香港”。新加坡最具挑战性。但是, 如果从全面来衡量, 香港被取代的可能性甚微。因为各自的情况不同, 它们是分属于不同类型与性质的国际大都会, 各有优势与特色。香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内地根本无可取代。竞争的前景最大的可能是鼎足而立, 而不是谁取代谁。香港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大哥大”。

第二, 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将会削弱。这是从内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转化来观察其走向的。事物异化也是客观规律, 这种可能性也存在。香港移民潮的起伏, 人才外流和资金外流, 证明了有些人早作了两手准备, 分散风险。这是持怀疑观望态度的表现。要打消顾虑, 加强他们的信心, 需要时间和用事实来说话。

第三, 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将继续保持不变。因为《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对此已有明确定论。“九七”香港回归后, 有中央政府的支持, 港人的努力, 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一定可以保持的, 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这是持乐观态度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笔者抱同感。我认为, 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前景光明。HK 模式将在复杂的变数因子动势之中跨越“九七”并向 21 世纪迈进。依据是:

(1) 《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两大文献为“一国两制”模式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石并作出了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基本法》第 5、6 条, 从时空上对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作出界定, 确认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地位。《基本法》第 109、110、112、114、115、116 条, 从财政金融、贸易和

工商业等方面认同了原有配套的自由经济政策的合法性、连贯性、权威性，集中突出了保持香港以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为核心的多元化现代自由港城市的国际地位，这是坚定不移的政策导向，从而确保了HK模式跨世纪的最大优势——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国际化。

(2) 世界经济进入稳定增长年代，国际贸易进一步扩大，亚太区经济蓬勃增长、世界贸易自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化的趋势加强，为香港经贸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3) 中国改革开放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内地经济蓬勃增长，与香港经贸关系日趋密切，是香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日益完善以及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到下世纪中国将成为一个经济巨人。香港因此而坐大，就是势所必然。

(4) 在“一国两制”模式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资本主义制度保留五十年不变。那么，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体系及自由经济理论与政策体系就仍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只要香港特殊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HK模式成功之道的六大变数因子发挥的积极效应方向不改，香港外贸就必然长盛不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信息中心的地位就不但不会动摇，而且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起来。

鉴于前面提到变数的复杂性，我们必须持审慎的科学态度，防止绝对化和感情用事。为了趋利避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证HK模式处于最佳变数动势之中，以达到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之目的。现提出四点对策建议供思考：

(1) 决策者要有超前的意识和过人的胆略，用战略眼光来观察研究香港的未来发展问题。要高瞻远瞩。应着眼于21世纪，从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化大趋势来审视香港，从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全

面支持特区政府着力创造出“一国两制”香港21世纪的经济奇迹。

(2) 香港属于中国，香港又面向世界。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国际化是香港最大优势和竞争活力所在。“两化”犹如在轨道上高速运行中的列车之轮，缺一不可，也不能受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实践“一国两制”全过程中要保证“两化”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优化，不能恶化。没有“两化”就没有香港的今天，失去“两化”也就没有香港的前途。必须不断强化“两化”，吸引更多国际资本登陆香港。

(3) 坚定不移全面正确把《基本法》落实到一切工作环节中去，排除各种各样可能的干扰，要防止任何主观急躁情绪和脱离实际的空想和做法。李瑞环说：“内地人不要试图按自己的标准去改造港人，港人也不要希冀按自己的标准去改造内地人。”真是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值得举一反三。

(4) 加强学习，提高干部素质，特别是外派干部素质，正确处理中央、内地各省、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关系，做到令行禁止，同心协力，共创香港更美好的明天。

香港回归之日，就是谱写香港历史新篇章之时。任重而道远。成就只说明过去，未来全靠开拓创新。港人是创造香港历史的主人。毫无疑问，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600多万港人以高度自治的主人翁精神和聪明才干定能继往开来，胜利迎来“九七”并豪情满怀再创新世纪辉煌。

主要参考文献：

- (1)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 (3) 《香港1996》

[责任编辑：朱雪梅]

一、1984年以来香港经济发展

自1984年中英两国签订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以来,香港能否平稳过渡,以及香港在九七年以后各方面的发展会变得怎样,这些问题一直是过去十多年无论在香港、北京及内地其他地方、以至世界各地的政界及商界均十分关注的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自踏入过渡期后,确有不少大事对香港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各方面均造成较大影响,包括:

——1983年下半年中英双方在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时一度陷入僵局,加上其他原因,结果导致港元大幅贬值,港府在急忙中推出港元“联系汇率”制度,其后该汇率制度多次受到投机炒卖的冲击,对香港经济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1983至1986年间香港多家中小型银行曾出现问题,部分银行先后被港府接管、部份则被其他财团收购合并;

——1987年10月香港股市大泻,恒生指数由最高接近4000点跌穿2000点水平,跌幅达50%;

——1989年北京的“六四风波”,一度使香港股市及楼市下挫,中资银行被挤提,移民潮亦一度涌现;

——1991年7月发生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事件,其后不久间接使香港部份银行因谣言而被挤提;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后引发港商及外国投资者大规模到内地投资,直接及间接使香港经济受惠;

——1992年下半年港英政府抛出关于香港政制发展的“政改方案”,引致中英关系恶化,对香港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均产生较大冲击;

——1994年港股因被过分推高而下挫,恒生指数从1994年初的1.25万点下跌至1995年初的7000点水平,跌幅逾四成;

——香港楼市亦从1994年首季的最高峰逐步回落,至1995年第四季,住宅楼价下跌约25%,写

字楼则跌约35%。

尽管如此,但总体看,由于内地经济迅速发展,香港与内地间的经济合作亦大为加强,加上其他内外因素的配合,因而香港经济在踏入过渡期后仍能继续稳步发展,其中本地生产总值在1985至1995年间平均实质年增幅为6.0%;95年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已达23000美元,高于部份西欧发达国家水平;对外贸易则从1984年的4462亿港元(折合572亿美元)大幅增至1995年的28399亿港元(折合3641亿美元),成为全球第八大贸易地区;恒生指数则从1984年底的1800点升至96年中的1.1万点,升

幅达八倍多,平均年增幅愈两成,等等。这些均充分反映出香港经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发展潜力相当深厚。

二、香港经济可望平稳过渡

香港经济能否平稳过渡“九七”,一般把焦点放

「九七」前后香港经济过渡与展望

(香港) 罗文华 刘伟业

在几个方面,包括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联系汇率以及整体香港经济发展,等等。根据目前各种情况推断,以上几方面在未来两年大致可保持平稳发展。

1. 房地产市场

香港房地产市场在1994年首季达致历史最高峰,其后由于价格被过分推高,银行收紧按揭要求,港府亦实施一连串打击炒卖楼宇的措施,房地产市场在1994年第二季开始逐步下调,到1995年末季才见底,其中住宅楼价跌幅约25%,写字楼则跌约三成多。

由于楼价在1994及1995年作出调整,期内各业雇员工资则基本随通胀增长,市民的负担能力已较前明显改善;此外去年及今年住宅落成量较前大幅减少;另外目前利率水平未算偏高,到九七年底止港息上升的幅度相信不会太大,加上香港经济基本将可保持稳定增长,估计未来两年房地产价格再度下跌的机会相对较小,相反还将会有温和上升。事实上,从今年开始,整体房地产价格已作出反弹。

2. 股票市场

1993年中恒生指数大致在七千点水平,其后有外资基金入市大举推高港股,恒生指数在1994年初一度升上1.25万点水平。之后港股反复下挫,到1995年初一度跌穿7000点水平,比最高峰时下跌愈四成。其后恒生指数逐步回升,至今年中约为1.1万点,虽然仍未追上历史最高峰,但市盈率(P/E Ratio)大概在12至13倍之间,属历史正常水平,未算偏高或偏低。从现时情况看,港股下跌的幅度将有限,上升的机会则较大,年内有机会重上1.2万点,明年则可望进一步攀升。

3. 港元“联系汇率”

自1983年10月设立港元联系汇率以来,这制度一开始便受到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其后总算站稳脚跟;1987年底美国因贸易赤字庞大而迫使亚洲四小龙的货币升值,这给投机者一个良机再度大肆炒卖港元,结果无功而回;1989年的“六四风波”使港元再度受压,结果香港亦能成功化解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联系汇率是港府在较匆忙的情

况下设立的,当时市场一般认为这只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并不认为是港府长期的金融政策,加上香港社会内部包括部份金融界,基于各种原因亦反对这一汇率制度,这些均给投机者一个严重的错误讯息,间接鼓励了投机者炒卖港元。至今联系汇率已实施了13年,其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总体来看是正面远大于负面。前几年金融管理局已明确宣布该局的首要金融政策是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其余目标均是次要的。近年投机者对金融管理局维护联系汇率的决心已不敢作大胆挑战。另方面,现时外汇基金及土地基金的实力已较前大为增强,加上投机者亦知道九七年前后中国政府及驻港中资机构一定会大力维护联系汇率,如无特别不利因素,联系汇率应能平稳过渡。

4. 整体香港经济发展

去年香港经济实质增幅只有4.6%,今年增幅估计大致与去年相若,但今年情况与去年不同,去年香港经济是逐季下降,到今年上半年已基本见底,之后将逐步回升。据今年中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估计,明年该组织成员的整体经济及国际贸易的表现将比今年进一步上升。中国经济则可望继续稳步发展,明年外贸的表现预计会有所改善。至于香港内部,由于多项大型基建仍在进行(包括新机场及有关核心工程等),九号货柜码头相信不久亦可动工,随着股市及楼市的好转,私人消费明年的表现将较今年有所改善,使整体内部需求维持一定增长。预计明年香港经济增长率将较今年稍高。

香港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是稳定香港经济的一个重要力量。至去年底止,香港外汇基金总资产已达4607亿港元(折合591亿美元),比1986年的886亿港元(折合114亿美元)高出四倍多;由中方管理的土地基金(指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港府卖地所得减去土地开发成本后,与未来特区政府均分的基金)至1995年3月底止累计共849亿港元(折合109亿美元),据港府预测到1998年3月底止将达1429亿港元(折合183亿美元);加上未拨入外汇基金的港府财政盈余,到九七年七月,这几方面的资产合计约达800多亿美元,这是未来特区政

府稳定香港市场的庞大力量。此外,至今年六月底止,中国外汇储备已累积至 866 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位。这些均有助于稳定香港的金融市场。

有香港及内地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我们有信心香港将可克服种种困难过渡“九七”,并在九七年以后继续保持长期的稳定繁荣。

三、“九七”之后香港经济前景仍佳

过去十多年香港先后发生了多次重大的政治及经济事件,港人、港商以及外商均有足够时间根据这些情况对香港将来的发展作出充分的评估,从而相应作出各种部署。至今为止,各方对香港前景基本仍是乐观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虽然过去十年约有 50 万港人移民外地,但当中不少主要是希望取得外国居留权作为“太平门”。由于外地经济发展始终不及香港,做生意及找工作的机会亦较香港逊色,近年不少移民已回流香港。另方面,香港自置居所的住户占全港住户总数的比例从 1984 年的 31.2% 显著升至 1994 年的 45.0%^①,事实上,今年上半年香港住宅楼价比 1985 年初升近六倍^②,平均年增幅约 18%,远高于同期通胀水平,反映出大部份港人对九七年后的香港仍保持较大信心;

——过去十多年在香港经营的企业大多均能继续赚取可观利润,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现时他们仍相当重视香港市场;与此同时,近年他们把业务扩展到中国内地,至今港商到内地的实际投资已超过 700 亿美元,至于到外地其他地方投资则相对不多,占比例不大;

——外商在港投资不断增加。1984 年底香港有 2005 家外资公司,至 1995 年底增为 4317 家,增幅超过一倍。其中日资和美资至 1994 年底止在港投资累计分别为 1511 亿港元(折合 194 亿美元)及 877 亿港元(折合 112 亿美元),中资则为 1341 亿港元(折合 172 亿美元),另外英资在港投资累计仍达

2061 亿港元(折合 264 亿美元),至于其他外资在港投资亦共 1513 亿港元(折合 194 亿美元)^③。这些实际投资正是外商对香港前景投下信心的一票;

——数月前“世界经济论坛”及“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国际研究所”分别发表报告,显示在全球竞争力龙虎榜中,香港分别被评为全球第二位和第三位。去年六月《财富》杂志以“香港之死”为题表示对香港前景无信心,但其观点并未得到国际投资者及国际权威机构的认同;

——外商(包括港商)到中国的实际投资额在 1979 至 1991 年间合计 233.5 亿美元,在 1992 至 1995 年间则大幅增达 1099.9 亿美元,合计 1333.4 亿美元,显示外商对中国经济前景抱有较大信心。如外商及港商对到大陆投资有信心,他们应更有信心在香港进行投资。

尽管过去几十年香港经历了种种波折,但经过多番努力,香港目前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已占有相当地位,例如香港现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银行业是持有最多境外资产的市场之一,香港是世界第四大黄金市场、亦为第五大外汇市场,香港股市规模在亚太区仅次于东京排第二位。香港同时是世界第八大贸易地区,并连续数年成为全球处理货柜最多的港口,香港机场是全球第四个最多旅客进出的机场,处理货物量则在全球排第二位。香港面积仅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过 620 万,竟能取得这样卓越的成就,实令人感到惊奇。

香港经济能达到今天的成就,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各方面:地理位置优越、长期政局稳定、港府一贯实施不干预政策、香港企业家冲劲十足、资讯发达、税制简单、税率低、无外汇管制、港币币值相对稳定、金融业有效率、基建交通通讯设施完善、法制健全、普遍使用英语、可吸引世界各地专业人才来港工作、人力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保证,等等。

此外,过去十多年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使香港经济的潜能得以进一步发挥。首先内地可透过香港把产品打入世界市场,其次内地可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行集资以配合国内各项建设,同时内地与香港经济相互配合和分工可使两地的比较

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此外香港更可作为外商到内地投资的踏脚石。过去十多年香港与内地经贸合作迅速发展使双方经济均得到庞大利益。可以说,过去十年内地、尤其是南方的经济发展,香港起了重要作用;反过来,如没有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过去十多年香港经济也难以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

过往带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的各项因素如能在九七年后继续得以保存,同时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发展,加上未来一段长时期亚太区将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这些均是推动香港继续在九七年以后进一步发展的有利因素。

四、有待实践及探索的问题

总体看,香港平稳过渡“九七”以及九七年以后香港经济的发展前景应是十分乐观的。不过,在可见的将来香港仍需面对颇多问题与挑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的政策虽然得到港人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同时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已把上述精神较具体地规定下来,但“一国两制”的构思始终在历史上从未真正实施过。“一国两制”的意思是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制度无论在政府的运作、法律制度、管治方式、社会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生活方式、处事方法、以至新闻自由,等等,都有颇大差异。将来两地如何在和谐合作的气氛下相互协调并共同发展,仍有待在理论方面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付诸实践。

2. 至今内地与香港无论在相互投资、贸易、资本和两地居民往来等多方面的关系已非常密切,将来香港与内地(包括与内地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尤其是《基本法》内没有明确提及的部份将如何处理?例如近年香港人口迅速增加,其中一个因素是内地居民移居到港大增,这与香港正进行的经济转型如何配合?另外香港与内地邻近地区、特别是广东省的基建,包括铁路、港口、机场、桥梁

等设施,怎样相互协调或统筹?若两地出现利益冲突时应透过什么方式解决?类似问题似乎至今仍未有一个较清晰及明确的解决方法。

3. 现时港英政府的立法局定将在九七年七月解散,由临时立法会取代;未来特区行政长官及首届特区政府将相继产生,他们如何应付政权交接后出现的各项问题,如何带领香港继续向前发展,国际投资者对他们的信心又如何,等等,这些均值得密切注视。

五、结 论

还不到一年香港将回归祖国。现时港商在大陆的实际投资累计已超过700亿美元,其他外商到内地投资不少亦经香港进行,另外香港还在多方面对内地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去年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达1.11万亿港元(折合1425亿美元),约相当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两成,因此香港如能平稳过渡以及在九七年后继续保持稳定繁荣,不单对香港同胞有重大意义,还将影响祖国对澳门和台湾的统一大业,而且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包括“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发展目标等也产生较大影响。

虽然未来一段时期香港将无可避免要面对颇多困难和挑战,但由于香港经济基础至今仍相当健全;港人、港商以及外商均以实际行动表示对香港前景抱有信心;同时香港及内地均希望香港能继续保持繁荣稳定,这对双方均有利无害;加上亚太区经济前景展望仍佳,香港定将受惠。在这些有利因素支持下,有理由相信,过去香港能一一克服各种困难而达致今天的成就,九七年以后亦一样可以继承过往的精神,把香港建设得更好。

注释:

①见《香港社会及经济趋势》1995版,港府统计处。

②见 *JLW Property Index*, HK, Jones Lang Wootton。

③见 *External Investments in Hong Kong's Non-manufacturing Sectors*, 1993 & 1994, 港府统计处。

[责任编辑:朱雪梅]

面向 21 世纪的华南经济圈交通运输网 (下)

郑天祥

三、21 世纪华南经济圈交通运输发展前景

(一) 华南经济圈各地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1. 广东省交通运输发展规划设想

据广东各种运输方式进出港澳客货运量预测, 2000 年货运总计 9360.8 万吨, 客运总计 15125.3 万人次, 其中水上货运 1920.5 万吨, 客运 1088.5 万人次; 公路货运 4207.6 万吨, 客运 3282.6 万人次; 铁路货运 232.7 万吨 (香港预测为 427 万吨), 客运 10754.2 万人次。2010 年货运总计 27971.7 万吨、客运总计 47971.6 万人次, 其中水上货运 12948 万吨, 客运 4199.5 万人次; 公路货运 14779 万吨、客运 5998.8; 铁路货运 244.7 万吨 (香港预测为 917 万吨), 客运 37773.3 万人次。

(1) 港口 沿海老港改造、配套、扩建: 如广州、湛江、汕头、汕尾、蛇口、赤湾港, 重点建设广州、深圳、珠海三个沿海主枢纽港和肇庆内河主枢纽港。广州港 2000 年前建设 3.5—5 万吨级泊位 9 个, 新增能力 615 万吨; 2010 年前建设 7 个万吨级泊位, 新增能力 1200 万吨, 总吞吐能力达到 0.9—1 亿吨。深圳港 2000 年前建 20 个深水泊位, 新增能力 3450 万吨, 2010 年前再建万吨级以上泊位 31 个, 新增吞吐能力 8300 万吨, 总吞吐能力达到近 1.5 亿吨。珠海港 2000 年前建设 10 万吨级煤炭中转码头、10 万吨级矿石码头和 5 万吨级油码头, 新增吞吐能力 5295 万吨, 2010 年前建万吨级以上泊位 16 个, 新增吞吐能力 900 万吨, 总吞吐能力达到近亿吨。建设汕头广澳、南澳、潮州三百门、茂名水东、惠州、阳江、台山等沿海港口, 加速建设直达港澳、江海直达、联运和为枢纽港集疏运需要的佛山、江门、新会、三埠、中山、顺德、肇庆、清远等内河港。2000 年广东港口总吞吐量将达到 4.2 亿吨, 2010 年达到 7.2 亿吨。

航道建设重点整治崖门、虎跳门水道, 实现

3000 吨海轮进入西江肇庆。

(2) 航空运输 广州计划在市区与花都市交界处建大型国际机场, 有 3 条 4000 米跑道, 年客运量最终达到 8000 万人次。在揭阳炮台建国际机场与台湾直航, 在肇庆建旅游机场, 吞吐能力为 400 万人次。还有江门、茂名、罗定、阳江、韶关、汕尾机场, 届时全省将有 16 个机场。

(3) 陆路 预计 2010 年前广东将投资 192.33 亿元, 建设铁路 2203 公里, 形成连接省内东西两翼、贯穿南北的铁路骨架以及具有三纵两横及通往港澳及各邻省的铁路网。其中最为重要的省际通道是广珠澳、梅 (州) 龙 (岩)、罗 (定) 玉 (林)、肇 (庆) 梧 (州)、龙 (川) 柳 (州)、河 (唇) 北 (海) 及湛江至海口的铁路包括过海轮渡。预计 2000 年广东铁路货运量将达到 1.6 亿吨。与港澳衔接的规划有广珠铁路及深圳西部通道等。

公路规划到本世纪末建成以广州为枢纽、联结东西两翼、直通粤北山区的高速公路和汽车专用路的主骨架, 实现广州与各市通高速公路或汽车专用路, 市到各县通一级或超二级公路。全部乡镇通硬底化等级路, 所有管理区都通公路。2000 年前新增里程 21715 公里, 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有 42.9 公里, 2010 年前再建 30615 公里, 总里程达到 10.75 万公里, 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 60 公里, 以高速公路、汽车专用路为主。

2. 福建省交通运输发展规划设想

(1) 港口方面重点开发湄洲港, 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配合修建向赣龙铁路、漳泉铁路, 使湄洲港腹地扩大到浙赣、京广、湘黔沿线, 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面向台湾及国际的综合性大海港。港域 80 多平方公里, 可利用岸线 30 公里, 其中适宜建深水码头的岸线 7 公里多, 水深 12—20 米, 可建深水泊位几十个, 5 万吨级船舶可自由进出, 10 万吨级船舶乘潮进出。厦门港近期规划吞吐能力达到 1500 万吨, 75 个标准集装箱, 在海沧建新港区, 规划吞吐量 4000 万吨。形成以厦门、湄洲、福州、三都澳等

为龙头的港口群。

(2) 航空方面: 计划开辟湄洲、漳州机场, 南平、永安、三明亦有建机场的设想,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扩建, 客运能力达到 895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首期工程 1997 年竣工, 年客运量可达 650 万人次, 货运量 20 万吨, 可起降波音 747 和 757 大型飞机。

(3) 陆路方面: 计划修建沿海铁路、向(塘)赣(州)龙(岩)铁路、漳(平)泉(州)铁路、剑(斗)天(湖山)煤矿铁路、福(州)宁(德)玉(山)的浙闽铁路和龙(岩)至梅(州)的闽广铁路等五条出省铁路通道和“二纵三横”的高等级公路为纽带, 其中泉(州)厦(门)高速公路全长 81 公里, 投资 27.8 亿元, 为世界银行贷款, 计划 1997 年底通车。

3. 广西交通运输发展规划设想

据《北海经济协作区开发区研究报告》, 南昆铁路及北海至河唇的铁路 1997 年底前通车, 到本世纪末以前, 北部湾港口群的吞吐能力要达到 2000 万吨以上, 北海市区和铁山港可建万吨级以上泊位 200 多个, 10~20 万吨泊位 20 余个, 年吞吐能力可达 1 亿吨以上。

机场建设方面, 已规划在柳州、梧州建机场及南宁机场扩建。桂林两江新机场正在施工。

4. 海南交通运输发展规划设想

规划近期建成 8 个万吨级、7 个 5000 吨级和 13 个 3000 吨级泊位码头, 港口吞吐能力增加到 2000 万吨左右, 其中 2 万吨级泊位 2 个, 1 个 3000 吨级泊位, 吞吐能力 220 万吨。加上海口吞吐能力超过 1600 万吨。建立专业运输船队, 2000 年发展到 10 万吨位、上万客位。

规划设想在通什、洋浦、清澜建地方机场使海南东、南、西、北、中都有机场。海口美兰新机场建成后可接受当今世界最大型的客机。

规划 2000 年公路通车里程达 1.3 万余公里, 其中一、二级公路占 10% 左右, 三级公路占 12%。铁路货运量 800 万吨, 客运量 150 万人次。

规划建设该岛铁路及过海至湛江的铁路与大陆铁路联网。

5. 香港交通运输规划设想

(1) 港口规划: 原定在 1994 年投产的青衣岛东南填海区建 9 号集装箱码头, 已推迟到今年动工, 由

现时到 2011 年规划每年提高集装箱处理量 1000 万个标准箱, 即 2001 年达到 1800 万个标准箱, 2006 年达到 2200 万箱、2011 年达到 3000 万箱, 为此, 在大屿山东北部兴建一个全新的港口, 有 17 个集装箱停泊处, 港口总吞吐量达到 2.84 亿吨, 包括 1.8 亿吨进口货及 1.05 亿吨出口货。超过 90% 的货物将以远洋货轮运送。2006 年到港远洋轮将达到 33000 艘。

港府预测内河货运量 2000 年达到 4920 万吨, 2011 年达 8480 万吨(可能偏小)。为此在屯门西部建立新的内河码头与装卸区, 这是十分明智的, 可避开通过繁忙的蓝巴勒海峡和青马大桥, 缩短运距。

(2) 航空规划 赤鱓角新机场比原计划推迟一年于 1998 年中启用, 客运量达 3500 万人次, 货运量 150 万吨, 2004 年客运量和货运量分别增至 8000 万人次和 900 万吨, 成为世界最大的机场之一。

(3) 通向内地的陆路交通规划

计划新建一条与广东省衔接的第二条铁路通道, 分二期进行, 首期在 2001 年完成“西部走廊”, 拟从罗湖或落马洲与广东铁路接轨, 与天水围元朗铁路接通后经锦田至葵涌码头及深水埗, 除满足日益增长的过境客货运输外, 还担负天水围等新市镇与市区往返交通任务。预计 2001 年每日集装箱处理量为 1450 个标准箱, 到 2006 年将上升为 2500 个标准箱, 2010 年铁路货运量为 917 万吨。

第二阶段为长远方案, 动工时间未确定, 至少在 2011 年以后, 由二条线路组成: 其一是由天水围经屯门至大屿山阴澳; 其二是由西部铁路出线, 通往大屿山阴澳; 这二条线在屯门至阴澳的海底隧道口会合, 至阴澳以后与机场铁路衔接, 并修建至大屿山东北部新港区, 再以海底隧道到港岛的青州填海区接通上环地铁。

公路方面拟在 1998 年完成 3 号干线高速公路, 这是贯通全港西部南北方向和连接广东省的主要通道, 由 4 部分组成: 双程 3 车道的西区海底隧道; 双程 4 车道的西九龙高速公路; 双程 3 车道的连接葵涌至汀九的青衣段公路; 双程 3 车道的郊野公园段。还计划扩展东部沙头角口岸, 开辟旅客和商人的出入境通道。

6. 澳门交通运输规划设想

机场规划 2000 年达到 386 万人次客运量、20.1 万吨货运量, 2005 年达到 539.9 万人次客运量、

25.2万吨货运量,2009年达到677.5万人次客运量、29.7万吨货运量。

港口规划建设万吨级泊位,尚在进行可行性研究,是在九澳港开挖、在九澳港东部海上建人工码头,或与珠海合建高栏港、东澳港,进行方案比较供决策选择。

陆路方面提出修建澳门至香港大屿山的港澳大桥,有二个方案:一是从澳门半岛东北建人工岛至大屿山,一是从路经三角岛、牛头岛至大屿山,亦在作方案比较。

铁路方面拟将广珠铁路引至澳门,但终点站在拱北还是在路环还有争议。

7. 台湾交通运输规划设想

台湾经建六年计划总投资3200亿美元(8兆2千亿新台币),其中交通运输投资25692亿新台币,占31.33%,居首位。公路投资11500亿新台币,占44.76%;铁路投资4800亿新台币,占18.68%;都会捷运6400亿新台币(未含台中都会区),占24.91%;海运投资475亿新台币扩建三大港,占1.85%;空运投资1350亿新台币,建中正、高雄国际机场,占5.25%,计划在1997年完成(高速铁路在2000年完工)。“六年计划”完成后,国际港口的总容量将由1989年的2.96亿吨增加到(1997年)的4.82亿吨。

(二) 华南经济圈交通运输合作与协调发展

1. 合作与协调发展原则

(1) 同步或超前社会、经济发展,建立现代化、国际化交通运输网络,为迎接我国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和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创造物质条件。并使港澳继续保持和扮演货柜中心、空运中心的重要角色。

交通运输网络只有同步或超前社会、经济发展,才能适应需要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由于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预测手段尚不够先进、科学,往往欠准确,或由于着眼当前利益,往往造成交通运输滞后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大型交通运输项目、投资大、周期长,资金筹措和来源往往受当时经济状况影响,因此对交通运输要有长远的、宏观的发展规划、分阶段实施的细则和多渠道的筹资来源。

(2) 充分发挥港澳自由港和中介作用,促使华南经济圈的逐步融合,逐步缩小其经济水平的差距和促进交通运输的联网,尤其是促进两岸的直通,境

外直航。它将对两岸的经济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从以上各地的规划来看,尤其要加速闽、桂、琼及澳门的交通运输的发展,才能使华南经济圈人流、物流畅通。在充分发挥港澳自由港作用、中介作用的同时建立各地现代化、国际化交通运输网络。

(3) 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华南经济圈交通运输规划投资、建设、协调管理的机制和机构。交通运输网络是一种区域性的大型设施,必须协调发展才能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效益不高以及保证海、空安全等,因此要求要有区域观点,而实际情形是各自为政,只能从学术上、民间上加强沟通来影响决策者。逐步做到官方决策者的互访和协调,以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1994年12月2日,正式成立内地与香港的大型基建协调委员会使华南经济圈交通协调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 华南经济圈交通运输具体项目协调发展意见

(1) 粤港澳铁路衔接:香港西部铁路要在20年完成,而京九、广梅汕铁路今年将全部投入营运,时间上滞后五年,使铁路运力不平衡进一步加剧,期望港府能提前实施西部铁路计划。

深港关于西部铁路的接驳点上存在分歧,港府以落马洲作为接驳点,不愿接受深圳提出的从蛇口出线至香港尖鼻咀、流浮山、上白坭、下白坭一带,认为这一带山岭重叠、目前只修有公路支线,米埔一带是沼泽地带,被列为自然保护区,要多修十多公里的接驳线。深圳方面不愿接受落马洲——皇岗为接驳点,因为:其要多修建十多公里的接驳线与罗湖或南头接驳;其二,上述接驳线穿越市中心区,将严重干扰市区安宁,阻碍城市发展。

笔者认为,近期在落马洲、皇岗接驳是权宜之计,西部走廊将来九成运力用于客运,则深圳方面用地铁接驳就不会造成对市区的干扰,即在皇岗与落马洲之间,兴建一段长3.5公里的地铁支线,接驳深圳地铁与落马洲铁路干线,但从长远的货运接驳则宜从深圳西部平南铁路延伸至香港境内。

粤澳铁路衔接主要是广珠铁路延伸至澳门的走向与车站设置协调。

(2) 粤港澳公路衔接:粤港为解决口岸日益拥挤公路口岸,深圳方面除提出西部通道、还考虑在莲塘新开设一个口岸,吸引香港至惠州、惠东方向车辆,以缓解文锦渡口岸对市区的干扰;而香港方

面则提出扩大沙头角口岸以适应盐田港的开发。笔者认为这二个计划并不矛盾,都应对对方的计划作出回应和配合。

珠海方面提出的伶仃洋大桥,从金鼎经淇澳岛、伶仃岛到香港烂角咀,该方案经过屯门公路瓶颈,香港方面提出修正,即从伶仃岛经龙鼓洲至赤𫚭角,可利用机场铁路、公路至市区,但桥长增加7公里。

澳门方面提出修建港澳大桥的二个方案,可充分发挥虎门大桥和港澳大桥各自功能,避开内伶仃岛猕猴自然保护区。

笔者提出修建珠港澳大桥,由三方共同投资建设、共同使用管理,比上述由两方修建的方案都要优越,而且大桥通过珠、澳繁华地区及香港未来机场、港口建设地区,客源有保证、效益高、回收快。对上述各个方案应作充分的论证。

(3) 粤港澳台航空运输协调

粤港澳将有22个机场,有些机场相隔不到20公里,首先应建立一套完善的空中管理系统和飞行导航系统,以协调飞行空域。粤港澳最终客运总规模达3亿人次可能偏大。

其次,广州至香港距离不到150公里,有3个世界级机场建设规划,从香港与广州的国际地位、城市规模、覆盖地区来看建设8000万人次吞吐量的国际机场是十分必要的,处在港穗之间的深圳市是否有必要建设8000万人次吞吐规模的机场就值得商榷了。1994年全国的空运客量只有4027万人次。

此外,珠海与澳门两个机场偏于一隅,相隔不到24公里,覆盖地区人口不过一百多万,香港新机场建成以后,这两个机场的效益令人担忧。建议澳门机场与珠海机场分别以国际、国内航线为主,开辟海上、陆上直通免检过境快艇或巴士联运。两岸应尽快实现直通,现时140—150万经港澳中转的台湾旅客可以直接往返大陆。

(4) 粤港澳海运协调发展

香港集装箱运输成本越来越高,如码头装卸费每标准箱为1200—1800港元,较新加坡高1/3—1/2,较高雄港高一倍,是内地港口的5—7倍,加上香港9号、10号、11号码头一再推迟建设,香港航运界纷纷在盐田、高栏港及南沙、三山港投资建码头,开辟国际航线,这是必然趋势,仓储方面亦可逐步转移到珠三角。

粤港澳港口群各自规划建设,往往重复计算腹

地运量,使港口发展规划偏大,如香港港口原规划2010年达到4.48亿吨,3000万个标准箱现已修正为3.84亿吨。

1994年以来,由于台湾进口大陆物品激增,直接带动两岸海运量的增长,据高雄港统计,1994年元月至12月26日,由大陆运载散装货至高雄港装卸的不定期航线船舶总计22艘,较去年增长一倍,而澳港今年由大陆运载赴台船只多达145艘次,总计85万吨,其中输往澳港的装载以花岗石最多,其次是木材,运往高雄的货载则以矿砂、煤居多,但需经第三地才能原船航行两岸,迫切需要直航。

台湾当局曾先后将布袋港、安平港、台中港拟作两岸通航口岸,“六年经建计划”已将台中港作为两岸直航口岸列入计划进行相应扩建。目前已对两岸直航模式包括定点直航、单方通航、“先空后路”、“先货后客”、“双门(金门、厦门)对开”、“双马(马尾、马祖)先行”等进行研究,包括通航设施、直航挂旗、证件互认、法律适应与纠纷处理等等。

台湾于1994年底正式推出“发展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将在十年内成为亚太海运及其它4个营运中心,不过只有实现直航才可能实现这个计划。

(5) 粤港澳内河运输合作

近年来由于重视公路的发展,内河水运发展缓慢,尤其是内河客运逐年下降,不过粤港集装箱运输却例外,1994年粤港内河集装箱运量达932721箱,比1993年净增320495箱。香港屯门内河码头1997年建成以后粤港内河运输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七十年代以来华南经济圈交通运输网络发展迅速,尤其是1987年两岸关系解冻,引发两岸交通运输的需求,但受制于政治障碍未能直通,展望21世纪,我国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后,必然促进两岸的直航,预计香港可继续保持世界第一货柜港的宝座,高雄可保持世界第三货柜港的地位,还有广州、深圳、珠海、基隆等几个亿吨大港,不仅是亚太的航运中心,在世界航运上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机场方面全区将有50个机场,其中香港、广州、台北是三个世界级机场,是世界上机场密度、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配合这个需要,建设沿海高速公路和铁路,将沿海的港口、机场、城乡用高速公路与铁路联系起来,成为世界的经济增长极,为祖国的和平统一、繁荣昌盛奠定物质基础。

[责任编辑:周运源]

一、香港与内地经贸关系回顾

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的发展以1979年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两地的经济往来主要局限于贸易领域,内容单一,而且受到中国与世界政治社会形势动荡的影响,很不稳定。双方虽然具有发展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但远未充分挖掘。从1979年以来,内地逐步推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拓展对外经济联系和国际经济合作,使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84年中英签订《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更促使两地经济联系迈向蓬勃发展。

(一) 日益密切的贸易往来

中国在打开国门之后,为尽快促进工业化与现代化,一方面需引进大批机械设备、原材料和日用消费品,另一方面也需要出口大批商品以换取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金。而闻名于世的转口贸易大港香港则担负了沟通中国与国际市场的桥梁作用。十几年来,香港与内地的双边贸易额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从1984年起中国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另外,中国还是香港转口贸易的最大市场、港产

品出口的最大市场、香港进口商品的最大来源地。以1994年为例,香港总出口11700亿港元,其中出口内地的约占1/3;总进口12500亿港元,其中从内地进口的产品约占四成。同时在中国的对外贸易总值中,有近1/3是向香港出口或转口的。

与此同时,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有所变化。70年代以前,香港从内地进口的一半以上是农副土特产品,从70年代下半期开始,随着内地生产的增长,内地对香港石油产品、轻工产品和纺织品出口所占比重逐年上升。1994年内地向香港输出工业制成品3137.7亿港元,机械及运输设备1149.5亿港元,分别占输出总值的66.64%和24.41%。

而双边贸易额的不断攀升与外发加工业务紧密相连。外发加工即是香港厂商将原材料和半成品输

往内地,经加工后再以合约安排将产成品输回香港。据统计,1994年香港输往内地的出口总值中的47.7%,从内地进口货品中的75.9%都与香港外发内地加工业有关。

(二) 不断深化的投资关系

香港作为一个处于迅速成长中的经济中心,其对内集聚与对外扩散功能最集中地体现在投资方面。香港在内地的大规模投资,既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香港与内地自身经济运行规律的必然选择。就前者而言,香港对内地的投资是世界经济分工格局的一部分。目前,亚太区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可构架出三个阶梯。香港与内地分处于经济水平相异的梯级,存在着相互间的产业传递。就后者而言,一方面香港在逐渐丧失土地、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的同时,产业升级后继乏力,唯有另寻出路。另一方面,在内地,资金问题成为工业化的障碍,只有借助于融通外部资金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积累起巨额启动资金。

现时,香港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已累积至超过500亿美元,是中国最大的外来投资者。香港投资呈现几大特点:

(1) 在地区分布上,呈现“距离衰减律”。距离香港越近的地区,获得的投资越多。随着距离的不断扩大,投资额逐渐降低。广东省沿海地区由于接近香港,交通便利,便于生产要素的流动、语言文化等人文环境与香港相近,所获资金最多。广东省每年吸收的港资都占全国的40%以上。

(2) 投资规模大、速度快。在经济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由于经济水平差异及资金分布不平衡,存在着梯度落差。资金在追求最大边际生产率的利益驱动下,落差的幅度越大,流动的规模越大、速度越快。从1984年至1994年香港在内地投资额的年均增长率高达39%。

(3) 投资方式从单一走向多元化。按投资方式粗略来分,可分为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其中,直接投资占主要地位。但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金融

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回顾及展望

张 堯

体制的不断健全,间接投资的金融逐年上升。通过银行贷款、发行证券等手段筹集资金,促使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范围多样化。

(三) 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的两个阶段

第一,加工贸易合作阶段。从70年代后期起,由于香港工资、地价的大幅上涨,外部竞争的日益加剧,香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减少。而此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多种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吸引外资,为香港通过与内地开展生产合作摆脱困境提供了一个广阔天地。在这一阶段主要有两种合作方式。初期以“三来一补”为主。这是由两地当时的经济结构状况决定的。香港的以加工型为主、生产技术水平不高的制造业生产模式,与内地尤其是华南沿海地区缺乏资金、人才、市场信息的现状相对应,使“三来一补”成为最佳合作方式。内地只负责产品加工。产品设计、市场推广、技术开发等产前产后服务则留在香港。这种以垂直分工为主导的合作就是所谓的“前店后厂”模式。

但是,“三来一补”毕竟是一种最简单的合作方式,无法满足内地从国外引进资源,投身国际经济循环中去的愿望。另外,“三来一补”企业大多是低层次的加工业,耗能大、用工多、污染大、收益低,因此,“三资企业”的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趋向。港商把整条生产线或全部工序迁往内地,将内地丰富的劳动力、土地资源、较雄厚的技术开放潜力与香港充裕的资金、广泛的对外联系、发达的第三产业相结合,充分发挥双方比较优势,逐步向水平分工转变。据香港工业事务暨研究科第四次调查结果表明,截至1994年6月底,港商直接在内地投资的项目有12万个,占中国全部外来投资的62.5%,实际投资额已累积达3719亿港元,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装配业务,而且八成以上分布在广东。这种把相对落后的产业转移到下一梯度的“产业外溢效应”,为香港腾出时空、资金、人才、资源发展高一层次的产业创造了客观条件。促进香港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转变。

第二,全面合作阶段。从八十年代后期起内地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也向多元化发展,合作领域从以制造业为主扩展到多个行业。

——金融业。在银行业方面,香港银行界为内地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贷款,贷款额从1983年的935亿元增加到1995年4月的2563亿元。两地银行还互设分支机构。香港金融机构在大陆开设的分支机构共有51家,而中国的四大专业银行也都已在港设立了分行。在证券业方面,香港设立了多种基金专门投资于B股和内地企业。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内17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港上市。

——旅游业。内地到港旅客的不断增加,以及经香港进入中国的国际商务旅客的上升,使香港旅游业在“内地因素”的促进下得以发展。特别是将粤港澳三地组成一个旅游区域,积极招徕国际游客,加速了香港与内地双向旅游的发展。

——商业零售业。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着香港的投资。百佳、先施、永安、华润等集团已纷纷在内地开设分支机构。“八佰伴”更拟将总部迁往上海。但是,零售业尚未完全放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港资的进入。

——房地产业。两地较大的价格落差使港商纷纷参与内地的房地产开发。不仅推动了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形成,而且掀起了房地产投资与炒卖的热潮。从另一侧面看,这推动了国内房地产过热局面的形成,在宏观调控措施下受到沉重打击,积压了几百亿元的资金。

——交通运输业。目前两地之间已形成海运、内河、航空、铁路、公路多通道、多层次的立体式运输网络,为两地经济增长与合作提供了硬件基础。为满足两地日益频繁的经济往来的需要,双方都在对大型运输设施进行规划与建设,如内地方面的京九铁路、环珠江三角洲高速公路网、伶仃洋大桥、深港西部通道……香港方面的大屿山新机场、三号干线、西北铁路……为此,专门成立了“香港与内地大型基建协调委员会”,以加强双方的沟通与合作。

二、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的新动向

(一) 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形成,珠江三角洲一靠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二靠距离港澳最近的地缘、人缘优势,成为香港与内地产业转移与合作的发源地。十五年来,珠三角引进外资中,港资占75%以上,出口商品的80%通过香港转口海外市场,在境

外投资所办企业80%也设在香港。香港与珠三角已形成互补互利、紧密相连、高度依存的共生共荣关系。1994年底,广东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以把握九七、九九我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的机遇,促进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经济区的形成,实现“一国两制”下的经济一体化。

目前大珠三角经济区已初具雏形,新的都市带正在形成。这一巨型城市网络将以香港、广州为两大增长中心,以珠海、深圳、澳门等大中城市为节点,以佛山、东莞、江门、中山等中小城市为依托。其主要经济指标如下:

地 区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万人)	GDP (亿美元)	出口额 (亿美元)
广东珠江三角洲经济区	41596	2386.91	342.94	356.97
香 港	1084	614.91	1307.69	1504.65
澳 门	19.34	41.0532	64.80	19.80
合 计	42699.34	3042.8731	1715.43	1881.42

注:以1994年数据计算,人民币8.7元=1美元,港币7.8元=1美元,澳门元8元=1美元。

资料来源:《广东年鉴1995年》、《香港1995》、《澳门1994年年鉴》。

预计到2000年,整个都市带城市化将高达63%,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2500亿美元。届时,其经济实力将可以美国东北部海岸的都市带、日本京阪神城市带相较。

珠港澳经济一体化不仅对保持三地经济繁荣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于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具有重大意义。珠港澳这个由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地区组成的经济合作区域与以往世界上出现的各种经济合作组织有显著的不同,它是自发形成的,各方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与自由度,各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机会的获得不仅对区内平等,对区外也平等。因此其经济具有外向性与扩张性。如果以珠港澳为核心,不断扩大合作范围,以波浪状向外推进,逐步扩展到广东全省、整个华南经济圈以及东南亚各国,可在亚太地区首先形成一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我国以及亚太其他各国和地区实现经济合作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二) 香港第三产业迁入内地

九十年代的香港已转变为服务型的经济结构,但是昂贵的土地成本成为制约所有产业成长的主要

矛盾,香港又一次面临产业外溢与扩散,但与以前相比有显著不同:

(1) 以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为主。这种转移在交通通讯信息业日益发达的今日成为现实,如,包括“和记传讯”、“ABC佳讯”在内的几乎所有传呼公司均有意将传呼中心内迁,在内地招收传呼员。部分银行也计划将劳动密集型的支援部门迁往内地。汇丰银行已投资2亿港元在广州购买写字楼,准备迁入后勤支援基地。

(2) 采用内部分工协作方式。决策机关和重要部门仍留在香港,而将一部分机构、人员、生产办公场所迁入内地或在内地开设分支机构。香港将成为“服务业的服务中心”。

(3) 主体为大财团及跨国公司。它们将改变长期观望态度,逐步进入内地。花旗银行、渣打银行已将中国总部迁往上海。壳牌集团也已宣布将于1997年把总部从香港迁往北京。

(4) 转移采取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策略,而不会出现制造业内迁时一拥而至的局面。这是由于大财团及跨国公司的经营策略以稳健见长。且临近“九七”,在政权移交前后是否出现一些动荡,还要观望。

(5) 转移的主要地点将选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只有大城市才具备完善的城市配套设施、便利的交通通讯网络、容量较大的当地市场以及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劳动力。这些正是第三产业发展的要素。

(三) 香港在内地地区投资增多

八十年代香港对大陆的投资大部分集中于广东省。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这种状况被打破,港资纷纷北上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这是由于国内为了缩小沿海和内陆的经济差距,实现共同繁荣,对内陆地区采取了倾斜政策,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格局发生转变。而且内陆省份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裕、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扎实的技术基础,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香港的大财团、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着眼于长期利益,为了降低成本、配合产品生命周期以及提高市场占有率,意识到中国内陆对其发展的重要意义。香港贸发局自八十年代初在北京设立第一个办事处以来,到现在为止已在内地开办了九个办

事处,积极为港商在内地投资牵线搭桥。香港工商界也频频到内地考察,次数之密、人数之多、层次之高,均为近年所罕见。几大投资热点分别是:

(1) 京九铁路沿线。京九铁路横跨九省市,总长 2536 公里,现已全线铺通,将于 1996 年底全面通车。它通车后所产生的效益将覆盖 50 万平方公里、2 亿相关人口、工业产值占全国 15% 的广大地区。人们普遍预测京九铁路沿线地区将很快发展成一条新的经济增长带。现已有港商将珠三角地区的纺织、服装等企业搬至沿线地区,特别是江西、安徽、河北、湖北等资源丰富但过去外商投资较少的省份。另外,港商还利用当地资源兴办建材、食品等加工企业、开发农副产品项目,以及投资电力、公路等基建项目。

(2) 西北部地区。虽然大西北仍存在交通不便、管理观念落后、基础设施欠完善等问题,但其巨大的资源潜力和市场能力强烈吸引着外资。并且,投资大西北也可作为建立与中亚各国经济交流的桥梁。以石油、矿产储量丰富,羊毛、棉花产量居全国第一的新疆为例,港资的流入速度正在加快。自从港商唐翔千投资成立新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以来,如今已有大批香港商人在新疆投资设厂,有些还经营房地产。

(3) 西南地区。西南五省区只有广西拥有出海口,经济长期陷于贫困。如今大西南的经济大动脉南昆铁路(南宁—昆明)将于今年底通车,一批建设项目正在紧张施工。待这一出口大通道网络建成后,西南地区的货物可直接出口到东南亚,比经广东出口缩短几百公里,大大降低运输成本。香港通过在西南地区的投资,不仅可分享与东南亚之间交通运输的便利,还可以开拓与越南、缅甸等国家的经贸交流。

三、香港与中国内地经济关系展望

(一) 两地经济合作对香港经济结构的不利影响

香港与内地两个不同的经济系统在逐步靠拢与整合过程中,摩擦与碰撞的出现无法避免。而它所造成的后果在香港社会已渐渐显露。

(1) 制造业内迁后遗症。香港制造业内迁使本地制造业相对萎缩,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

由 1984 年的 24.3% 下降到 11% 左右,使香港拓展第三产业的主要物质基础只能依靠内地,极易受到中国与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另一致命后果是拖慢了香港产业升级的步伐。由于港商可通过将生产转入内地,继续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因此普遍缺乏对技术升级的内在需求,与“亚洲四小龙”中的其他三小龙在技术水平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2) 第二次经济转型的后果。以服务业内迁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经济转型给香港带来了失业危机。在制造业转移时期流失的工人大多被第三产业吸收,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大。但在这一次经济转型中,由于一些近年来创造大量就业职位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或部门被迁往内地,流失的文职人员因为技术水平和能力不符合需求难以被其他行业所吸收,以至造成中长期失业。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1995 年全年失业率高达 3.5%,为十年来最高点。

(3) 内地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对香港的影响。中国内地仍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经济体制尚未理顺,造成一定的混乱,如,经济政策多变、寻租行为大量存在、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活动……随着两地经济关系的不断密切,这种尚不完善的运行机制逐渐渗透到香港,给香港增加了不稳定因素。除此之外,中资企业在港的经营运作也多少带有计划经济的影子。在竞争中背离“平等竞争”原则,靠拉关系、靠特权打败对手,并将一些不规范的经营方式带到香港。

这些负面影响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应该减慢。恰恰相反,只有进一步加强联系,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两地经济关系的走向还要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约,这需从近期与远期两个角度来加以分析。

(二) 现在——“九七”前后的近期分析

在这一阶段,促进与阻碍这两股不同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从乐观的角度来看,起推动作用的因素有:

1. 世界经济前景光明。据联合国发表的 1995 年世界经济社会调查报告表明,占世界总产值 3/4 的发达国家已基本走出 90 年代初期的衰退。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已走出低谷,进入复苏。全球经济将呈加速发展态势。全球经济呈现一体化趋势。这为香

港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 “九七”为香港带来新的发展机会。香港回归祖国将使内地经济边界趋于淡化,便于香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双方可开展更广泛的多层次的协调与合作,尤其是政府层面的协商工作。而香港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作用将大大加强。

3. 多国资本及香港工商界对前途充满信心。尽管“九七”日益临近,在主权交接方面存在着不明朗因素,但外商普遍看好香港前景,并且希望借助香港无以替代的地理和其他优势,使之成为进军中国内地市场的基地。长期在香港享有特权的英资财团也不甘心放弃这块经营了一百多年的地盘,在公司迁册的同时仍继续开拓香港与中国内地业务。香港工商界更筹设了一个名为“香港明天会更好”的亿元基金会,向海外宣传香港的成就与形象。

4. 中国渐近推进经济自由化,在1996年将实行削减进口关税、调低出口退税率、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调整外贸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这为拓展香港与内地的投资和贸易提供了良机。

另一方面,阻碍两地经济加速融合的因素同样存在:

1. 今明两年国内经济形势依然较为严峻。1995年宏观调控措施初见成效,但是各项改革仍未到位,健全的经济体制尚未建立,靠行政手段抑制物价上涨的形势不能持久,国有企业效益差的局面没有改观。展望今明两年,宏观调控将继续进行,财政金融政策仍需适度从紧。

2. 香港经济出现滞胀。1995年的香港经济状况令人担忧。通胀率与失业率同时上升,内部消费明显减慢、有形贸易赤字大幅增加,楼市股市不振。假如滞胀局面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香港的投资前景将使外来投资者裹足不前。同时可能导致港人信心下降,劳资矛盾激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3. 香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将相对下降。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确立,不再以香港作为唯一的对外窗口。在外贸方面,由于内地加工工业日渐成熟、港口码头建设与环球航运业发展很快,内地产品可直接装运至世界各地,对香港的依存度下降;在投资方面,香港技术水平低、资本投资额小

的加工企业不再适应国内需要,港资占国内外商投资的比重会趋于下降。

综上所述,从近期来看,上述两方面因素的消长变化将决定两地经济整合的进展速度。总的说来,香港因素对内地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中国因素对香港未来则日趋重要。双方经济合作将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新的合作方式与合作领域的开拓将是一个较为缓慢的演进过程。

(三)“九七”后的远景分析

从长远考虑,香港与内地发展合作关系中最重要的是香港的定位问题。“九七”后,由于内地开放度加大,经济水平提高,两地经济活动将出现均质化。香港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等方面的相对优势会逐渐弱化。只有不断发挥香港的特长,强化其经济活动的异质性,建立相得益彰的分工格局,才能维持香港的繁荣。而香港的特色就在于,它是一个多元化的灵活善变的、承受力强的、富有生命力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实体。为此,中国必须长期保持香港这种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内地与香港各自独立发展,互不干涉。体现在:

(1) 保持香港自由贸易港地位。对同一国家内不同贸易政策与关税体系作好协调工作。

(2) 确保香港在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贸易协议中的独立成员地位。

(3) 保证香港货币制度与金融外汇体制不变。

(4) 保证香港居民进行国际商务旅游出入境自由。

(5) 未来特区政府只在宏观层面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鼓励引导企业投资,提供咨询、辅助服务,而不能插手企业具体业务。

(6) 香港与内地企业之间的经济合作属于跨地区的经济活动,应按国际惯例进行。

参考文献:

- ①《香港经济年鉴1995》。
- ②李秀恒:《“九七”后如何保持香港的优势》,《经济导报》总2436期。
- ③《港商在中国的投资状况》,《经济导报》总2418期。
- ④张颖:《加强中港金融联系,巩固金融中心地位》,《经济导报》总2435期。

[责任编辑:黎熙元]

《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延伸至澳门

(澳门) 李金平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一百八十三个国家的代表团及七十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一百零二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到会。会议期间,通过并签署了五个文件,《生物多样性公约》为其中之一。中国总理李鹏、葡国总理斯华高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出席了会议,并签了字。很明显,从那时开始,公约即对澳门产生效力。中葡联络小组也就环保国际公约延伸至澳门举行了会议并达成了共识。《生物多样性公约》在澳门实施,对澳门的生态和环保将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造福子孙后代。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证生物资源的永续利用,是一项全球性任务,也是全球性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强调要遵循生态开发的观点,把生产发展和自然保护密切结合起来,制定科学的区域开发计划。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的发展和促进经济的繁荣,因此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成为全球环境问题的热点。

地球上的物种是人类食物、药物和工农业生产原料的基本来源,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它们正在遭到过度的开发利用,而且它们所栖息的环境也在不断地恶化,使它们再也难恢复起来。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诸如森林大量砍伐、草地退化、湿地减少、沙漠化和盐渍化发展、水产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得不到遏止,在未来二十年中大量物种将消失。到2050年,地球上将有四分之一物种

陷入灭绝的境地,从而威胁到人类本身的生存和幸福。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所谓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构成的综合体,它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组成部分。

澳门地处热带北端,夏季高温潮湿,冬季温暖,生态条件十分优越,有利于植物生长和发育。它决定了澳门植物种类的丰富性,在澳门经鉴定的植物已超过了一千五百种。政府近十多年来致力绿化造林,使绿化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七十,森林植被覆盖良好。澳门近十年来,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上亦有一定进展。

澳门因离大陆近,开发较早。由于人们活动的影响,在澳门原始森林已根本不存在,目前林木以人工林为主,主体树种较简单。这对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动物种类的生长发育有一定的限制,种类和数量都有限。路环和凼仔林木繁茂,动植物种类较多。已知澳门尚有兽类十三种,两栖类七种,爬虫类二十一种,鸟类九十多种,鱼类约三百种,已鉴定的昆虫二百多种。

海岛市政厅近年收集四百多种种子标本,同其它国家和地区开展交流活动。通过这种方式,收藏有种子七百余种。政府近年还计划建植物园、动物园等设施。然而澳门地小人多,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威胁。澳门红树林的面积已大为缩小,栖息在红树林的鸟类等动物数量明显下降。由于环境

污染的影响,澳门周围的鱼类和鸟类也越来越少,养蚝业已绝迹。

在澳门,有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的中华白海豚,二类保护动物的食雀鹰,三类保护动物的穿山甲等珍稀动物,它们的生存空间和食物供应情况都十分严峻,濒于灭绝,已很难见到。

《生物多样性公约》延伸至澳门,对于澳门生态环境的保护,对生物的生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按照条约的内容,澳门当实行对物种的挽救、研究和持续利用的战略,不断地建立保护区、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种子银行和定位研究工作站等,并形成有机联系的网络,管理好澳门物种与生态系统,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当前提供的用途,并维持它们的潜力以满足子孙后代的需要。

近年,澳门进行了不少大型工程,对澳门海域的生态将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兹逐项分析如下:

(一) 路氹填海工程及横琴填海工程

自1992年始,横琴镇及澳门政府相断在十字门水道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工程,使原来的十字门水道大大缩窄,变成了河道,这一水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更由于河道变窄使涨潮的水流经夹马口水道进入小十字门水道时流速减缓,使澳门市区和澳门半岛的污染物随海水稀释自净的作用减弱,加重了澳门半岛的环境污染。

自1992年起,澳门在路氹间填海320公顷,使原先生长在路氹滩涂的大片红树林濒于消亡。生活在此区内的鱼、虾、贝、蟹、螺等生物群落急剧减少。红树林生态系统对澳门环境的平衡作用,对澳门大自然的协调性已大大减弱。

(二) 南湾人工湖工程

1993年,南湾人工湖工程开始,历经2年多时间,在澳门西起妈阁咀,东至南湾填海区的范围内,筑起了海堤。西湾和南湾变成了人工湖,面积约为1KM²,缩小了澳门内海面积,对澳门海域的海潮流向有一定阻碍作用,不利于澳门污水的入海。但由于海堤筑在岸线凹入的南湾、西湾处,不会对退潮

的海流造成太大的阻拦,所以对澳门半岛的污水随潮入海影响不大。

(三) 澳门污水处理厂

1995年9月,澳门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本澳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能力为14万方/日,可以满足目前日排出污水11万方的要求。

但是,这个工程还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要把目前下水道网改造成与污水处理厂配合的完善系统,仍需要费很大的功夫和相当的时间;其次是污水处理厂采用二级生化处理,只能减少污水中的悬浮物、含碳有机物及部分油类,而对重金属盐和有机酚类,则无效果。污水处理厂的运作和下水管道的逐步连结,将使污水中的含碳、含氮污染物得到控制,使澳门海域水体溶氧量上升,透明度加大,海洋生物种类和数量上升,整个海域生态系统向良性方向发展。

(四) 澳门国际机场通航

1995年10月,澳门国际机场通航,航次逐渐增多,至今年3月底,进出旅客已逾二十万人次。随着机场客货运逐渐增加,废水排出量将呈上升趋势。如果污水经过处理后排放,对水质的影响不会太大。飞机起降的噪音和震动,对水中的海洋生物,特别是水生动物的生活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从目前的噪音和污水排放现状估计,这种负面影响会很有限。

对于未来澳门海洋生态系统的走向,笔者认为,污水处理厂运作后,排出的污染物将受到控制。海潮的涨退会使排放的污水冲稀,借海水的自净作用,使污水慢慢地分解还原。澳门海域的水污染将逐步减轻,海水的卫生素质将逐步提高,澳门海域的生态环境将慢慢改善,生物资源会缓慢上升。虽然填海工程、南湾湖工程和澳门机场对澳门海域生态系统有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总之,未来澳门海域水环境质量和海域生态系统的走向还是乐观的。

[责任编辑:肖贤彬]

香港人士的国籍与护照问题

张丽英

根据 1984 年 12 月 19 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将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全境是清政府通过《南京条约》等三个不平等条约分别割让和租借给英国的，由于这三个条约是武装侵略的产物，而且又是英政府通过使用武力和威胁强加给中国的，因此，依国际法这三个条约应是无效的。中国政府也曾多次阐明中国对香港的立场，声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南京条约》等三个不平等条约。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国对持有港英当局所发护照的香港同胞不承认具有英国国籍，而仍视其为中国籍人。

一、“英国属土公民护照” (BDTC) 和“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及其性质

英国政府向香港居民签发的并不是英国本土护照，而是英国属土公民护照，持这种护照的人不能在英国享有长期居留权，同时，在进入英国时仍需要签证，而且有可能被拒入境。英国对本土公民和属土公民的这种区别是因为从 1950 年至 1960 年的十一年间，有近一百万英联邦的公民移居英国，英国政府担心移民不断增多会引起某些社会问题，于是于 1962 年颁布了《移民条例》，对英国属土公民移居英国加以限制。持“英国属土公民护照”的人在英国允许的停留时间是一年，1988 年 1 月，英国

政府又宣布将停留时间减至半年。

鉴于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政府在 1984 年 12 月 19 日与中国政府交换的备忘录中作出如下声明：1. 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由于香港的关系为英国属土公民者，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不再是“英国属土公民”，但将有资格保留某种适当地位，使其可继续使用联合王国签发的护照，而不赋予在联合王国的居留权。2.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后，任何人不得由于同香港的关系而取得“英国属土公民”的地位。3.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其他地方的联合王国的领事官员可为第 1 点中提及的人所持的护照延长期限和予以更换。4. 根据第 1、3 点已领取联合王国政府签发的护照的人或包括该护照上的人，经请求有权在第三国获得英国的领事服务和保护。中国政府的备忘录声明如下：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所有香港中国同胞，不论其是否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都是中国公民。2. 考虑到香港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允许原被称为“英国属土公民”的香港中国同胞使用由联合王国签发的旅行证件去其他国家和地区旅行。3. 上述中国公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地区不得因其持有上述英国旅行证件而享受英国的领事保护和权利。可见，中国和英国政府在香港居民的问题上，均将国籍与护照的联系松散化了。

针对九七问题，英国政府又创设了能跨越九七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简称：BNO)。1985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香港法例》，该法例附件第 2 条第 1 款规定：

1. 在1997年7月1日后不能再依据与香港的关系保留和领取“英国属土公民护照”(BDTC)。2. 根据这种关系而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海外)护照”的人士可以在1997年7月1日以前(或1997年7月1日前出生的可以在该年年底以前)取得“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可以看出,由于“英国属土公民护照”的有效期截止日为1997年6月30日,因此,希望持有与英国有关的护照的人,就必须在1997年7月1日前换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此种护照在1997年7月1日后也不会由英方换发。对这种护照英国政府认为其有效期为十年,而中国政府则只承认其为旅行证件,与国籍无干。依1986年4月24日中英双方交换的“香港居民旅行证件问题”的备忘录,“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于1987年7月1日开始使用。凡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又同时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联合王国政府拟在这些护照上附以加注如下:“本护照执有者拥有第×××号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该身份证载明持证者在香港有居留权”。对于英方的这种安排,中国政府在备忘录中表示“不持异议”,并表明,为方便1997年6月30日后在香港有居留权的人外出旅行,必要时中国政府将向第三国政府阐明,附有英方备忘录所提加注旅行证件的持有者,1997年6月30日后可以返回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的上述声明既坚持了我国在香港同胞国籍问题上的立场,又考虑到了方便香港同胞去他国旅行的问题,有利于香港的繁荣与稳定。

护照是一国主管机关发给本国公民出国旅行或在外居留的证件,用以证明其国籍和身份。尽管护照是一个人国籍和身份的证明,但护照所包含的意思并不是与国籍完全相同的。护照虽是由一国政府签发的,但其在某一国的效力却有赖于该国的承认。比如,对于前苏联使馆向我国新疆等地少数民族居民签发的苏联护照,我国政府就不承认其效力,不承认被签发护照的人具有苏联国籍。对于英国向香港同胞签发的“英国属土公民护照”和“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我国亦不承认其与国籍的联系。

就英方本身对上述两种护照的态度而言,这两

种护照的旅行证件性质也多于表明国籍身份的性质。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国家不能拒绝具有该国国籍的人回归国土,而持上述两种护照的人却不能享有在英国长期居留的权利。上述两方面的事实表明,护照在一般情况下,是国籍的证明,但对这一点不能绝对化。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政策的影响下,某些种类的护照,其作为国籍的证明的性质淡化了,而更多的表现为旅行证件的性质。

二、中国政府对香港同胞国籍问题的处理

我国政府对香港同胞在国籍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是明确的,即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同胞不是华侨,而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此点可以从1958年2月12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中得到证实,该批复指出:“住在香港和澳门的同胞,不能以华侨看待。”198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以下简称《国籍法》)对中国国籍的取得、丧失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为正确处理香港居民的国籍问题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又将《国籍法》作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之一。依《国籍法》第9条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所谓“自动丧失”中国籍即为不需办理退籍手续,我国即承认其具有外国籍。香港有一半以上的人领取了英国签发的“英国属土公民护照”或“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这些人是否可以依第9条规定被确认为“自动丧失”中国籍呢?答案应是否定的。首先,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因此,定居香港不能说是定居国外。其次,由于上述两种护照与国籍的联系松散性,因此,不能按“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处理。既然,香港居民不属于定居外国的情况,那么,依《国籍法》第10条的规定,对于非定居国外的中国人就须经申请批准方可退出中国国籍。据此,凡具有中国国籍的香港居民没有提出申请退出中国国籍并获得

有关部门批准的,即具有中国国籍。

对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和“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同胞的出入境问题,我国一律不将其按外国人对待,不向其签发入境签证。持上述两种护照的香港同胞是凭《港澳回乡证》出入境的,上述护照只用于在查验《港澳回乡证》时,核对本人真实身份,并证明其确系居住于香港。九七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的规定,将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持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中国公民签发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

三、基本法关于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的规定

1990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并未直接涉及国籍问题,该法的第24条将香港居民分为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依第24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为:

1.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
2.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
3. 第1、2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
4.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
5.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第4项所列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满二十一周岁的子女;
6. 第1至5项所列居民以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权的人。

以上居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居留权和有权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取得载明其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香港特别行政区非永久性居民为:有资格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证,但没有居留权的人。

上述规定的前3项针对的是中国籍人,第4、5项针对的是非中国籍人,第6项所指的是无国籍人。并规定了这些人可取得载明其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依1986年4月24日中英双方交换“香港居民旅行证件问题”的备忘录,中国政府允许港英政府自1987年7月1日起向“香港本土人士”和“华籍人士”签发附有居留权加注的“新式居民身份证”,该身份证在1997年7月1日后可继续使用直至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取代为止。这里的“香港本土人士”指在香港出生的或在香港归化为英籍的人,其中既有中国籍人,也有非中国籍人。“华籍人士”指具有中国血统,在香港连续居住七年以上,并取得居留权的人。《基本法》和中英备忘录有关永久性居民及其表明居留权身份证的取得的规定与香港现行的法律是基本一致的,这有利于香港的稳定和发展。依1987年香港《人民入境(修改)条例》的规定,居留权包括入境权,指不受居留条件限制而在香港居留及免受遣送离境或递解出境的权利。该条还进一步明确,“香港本土人士”和“华籍居民”享有不被递解出境的权利,因而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并发给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非永久性居民也可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证,但没有永久居留权。现时港英当局签发的身份证,亦有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之分。依香港现行法律,“香港本土人士”有资格取得“英国属土公民护照”或“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华籍居民”有资格领取香港身份证(CI),持这种身份证明书的香港居民具有在香港长期居留的权利。非永久性居民持有签证身份证(DI),按港英当局的有关规定,凡进入香港并欲在港居留超过六个月以上的人士均应领取身份证。非永久性居民领取的身份证,在有关部门查验时,可通过号码等查明其可以逗留香港的期限,一经发现其留港已超过期限,就会将其押解出境,重者还会被判处罚款或坐监。而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即

为香港永久居留的正式居民身份证。持这种身份证的居民享有不被押解出境的权利。

第24条第3项为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和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子女。“在香港以外”，自然也应包括中国内地。目前的问题是，有许多人是单身移民香港的，而其子女尚在内地。依现行港英政府的政策，其子女不能任意移往香港，需等待配额，经济上应没有问题，且子女如有一名在港，其他子女将很难被允许移居香港。另外，还有很多人回内地结婚。依港英当局的规定，香港的永久性居民如申请妻子、父母、未成年子女来港长期居留，只要经济上没有问题，尚有获得批准的可能。但如果是香港的女居民申请在外地的丈夫移居香港，就不能获得批准了。即使前一种有可能获批准的也常常因配额和其他原因，而几年甚至几十年不能移居香港，单从每年春节数以万计的香港同胞回乡探亲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两地分居的家庭数量之多了。

这第3类人在九七年以后依《基本法》的规定都应为香港的永久性居民，并依第31条的规定有出入境的自由，不应有上述港英政府所规定的诸多限制。这样的话，在九七年以后，就可能有大量符合条件的人涌入香港。如果对其入境进行限制，就必须阐明为什么同为香港永久性居民，而这类人却不能享有同样的入境权利的理由。大批人在短期内有可能突然涌入香港，对香港和内地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影响，中央政府在九七到来之前，应对此制订一定的政策，以避免中国在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之后，使香港在人口问题上产生不必要的压力。

永久性居民的第4项为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人，这类人的认定依第4项的规定有两方面的要件，一个是客观的要件，即合法入境，而不是以偷渡或其他形式非法入境，且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另一个是主观要件，即以香港为永久性居住地。那么什么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呢？是否必须在七年之内不间断地居住在香港呢？此点要与主观要件结合起来考虑，即只要他是以香

港为其永久性的居住地，而由于某种原因，如由于工作原因被派往国外，或到外国留学而离开香港，仍应认为是“通常居住”。问题是主观要件的认定比较困难，是依其自称有这种意图呢？还是从旁的其他证据来证明其意图呢？还是当事人要通过一个法定手续来表明其意图呢？《基本法》并无明确的规定。第4类人的认定关系到“非中国籍人”的政治权利问题。国家一般只赋予本国公民政治权利，《基本法》考虑到香港未来的特殊情况，亦赋予了符合第4项的“非中国籍人”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尽管香港永久性居民均享有政治权利，但他们所享有政治权利的范围是有区别的，有些权利只有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籍人才能享有，永久性香港居民中的非中国籍人不能享有，这些权利主要有：

1. 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须由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20年的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2.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须由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3. 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须由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15年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4.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须由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20年的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5. 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须由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6.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香港委员须由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此外，只有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才能持有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同时，还有一些政治权利，只要是中国公民，不论其是否为永久性居民，均能享有，而非中国籍人，不论其是否为永久性居民均不能享有，例如，《基本法》第21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名额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这里的“中国公民”包

括了永久性的和非永久性的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可见,尽管有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的划分,而国籍作为一个人与国家的固定的法律联系的标志,在确定一个人的政治权利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双重国籍问题

我国《国籍法》第9条规定的自动丧失中国籍的情况为: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而目前香港的情况是一些人取得了外国的国籍,但未曾定居外国,而是回港发展,这些人是否丧失了其中国国籍呢?

关于“定居国外”的含意,依关于实施《国籍法》的试行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是指侨居和移居在外国的华侨及其具有中国国籍的后裔。据此,那些为了取得移民资格,而在他国居住数年的香港人,在取得当地长期居留权后,再回港发展的均不应算作定居国外,也不应因此而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这就产生了一个双重国籍的问题,众所周知,不承认双重国籍是我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我国《国籍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但问题是,国籍法是国内法的范畴,双重国籍问题,需要本国与他国的协调方能彻底解决。比如,某中国籍人通过在A国长期居留而取得了该国的国籍,但又不愿定居该国,因而并未丧失中国籍,中国当局在处理与该人有关的事宜时,只能把他看做中国人,而不承认他的A国国籍,而A国则会将其看做A国人,当他旅行到其他国家时,其他国家也有可能承认他的A国国籍。因此不承认双重国籍有时只能解决在一国范围内的国籍冲突问题,而不能消除双重国籍。

香港有一定比例的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持有他国护照,并加入了他国国籍,只是未在他国定居,因而依中国《国籍法》,他们仍具有中国籍。问题是同时具有他国国籍的香港同胞和只具有中国国籍的香

港同胞的政治地位是否一样呢?如果依《国籍法》的原则,只承认所具有的中国籍,则对这两种人不应有什么区别的对待,即他们均可以担任须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的职务,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官员职务。另一方面,如果不允许具有另一国国籍的香港人担任上述职务,那么对该人另一个国籍的考虑似乎又从反面确认了其另一个国籍的存在,这又与《国籍法》的原则相悖。

国籍是个人与国家的一种固定的法律联系,是一个人作为某国公民的资格。同时国籍也意味着效忠,担任人民公仆的重要人员出于对人民负责的考虑在国籍上的要求更应严格。尽管我国《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双重国籍的存在是一个事实(除非同时加入他国国籍的香港同胞放弃其另一个国家的国籍),依《国籍法》只能不承认其另一个国籍,而不能取消其另一个国籍。在这种情况下,其另一个国籍的存在就成了一个客观事实。如让具有双重国籍的人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要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利益与其另一个国籍所属国的利益冲突时,比如当香港与该国在贸易上出现了矛盾时,当侨居该国的香港同胞由于当地的反华浪潮而遭受迫害时,他应如何作出决定呢?应效忠于哪一方呢?因此,鉴于香港在国籍问题上的特殊情况,《基本法》第44条、第55条第2款、第61条、第71条第2款、第91条第1款和第101条规定了必须由在外国为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的要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各司司长、副司长,各局局长,廉政专员,审计署署长,警务处处长,入境事务处处长,海关关长。上述规定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双重国籍,但在某国取得国籍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具有长期居留权,因此,这一规定实际上排除了具有双重国籍的人担任上述重要职务。

[责任编辑:黄 瑛]

香港的内地非法移民与非法入境者问题

李
若
建

与大多数发达地区一样,香港也有许多非法入境者,这些人主要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从相对贫困的地方来到香港,期望获得高收入。香港的非法入境者来自许多地方,有中国内地、越南、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不过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居多。

因为港英政府对待非法入境者的政策发生重大的转变,因此在本文中把偷渡者成功进入香港后获得合法居留权的人称为非法移民,把偷渡者入境后没有得到居留权的人称为非法入境者。

一、法律上的含糊

其实中国内地人民没有得到港英政府允许到香港是否非法是一个十分含糊的问题。1898年(光绪24年)英国再次强迫中国的满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对香港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根据这个条约,英国获得了“租借”香港新界地区99年的权利。在这个条约中有如下规定:

“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展拓不足以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扩展新界为新租之地,……以99年为限期。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略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归英国管辖,至九龙通向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附近九龙城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1]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遗留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九龙城寨的主权,这一问题曾经引发数次风波,不过这些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故不加以讨论。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到九龙城或者在去九龙城的香港道路上是否违反香港法律的问题。

事实上,在旧中国领土上的外国租界,中国人一般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在香港的情况也大体上相同。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边界开始互相防范,使两地之间人民的来往受到限制。香港政府要面对一个难题是怎么对待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批准,从大陆来的移民。这些人在中国来说是非法出境者,在改革开放以前是犯罪行为,文化大革命时

期可能被视为叛国者。

这些非法入境者对港英政府来说有两种选择：第一个解释是合法，符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的中国人有权进入香港新界的规定。第二个解释是非法的，因为这些人在中国是非法出境，无权受到《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保护，所以在香港也被认为是非法入境者。在1974年11月，中国政府和港英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港英政府把在边界和新界地区被逮捕的中国非法入境者送回中国。这一协议显然是采取了第二种解释。

1990年的两个典型案例，可以说从法律上解决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所留下的后遗症。第一个案件发生在1990年9月，一名14岁的男孩子在一次反偷渡行动中被捕，涉嫌非法入境。辩方律师援引《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为这个男孩辩护，认为被告有权经宝安九龙的通道进入香港。结果香港沙田裁判司判决被告胜诉，不过由于被告没有香港居民身份证，并非香港居民，所以仍需遣返大陆。此案反响甚大，沙田律政司认为此案误判，但是放弃上诉。这可能与被告是一名未成年人，比较容易得到舆论的同情有关。

第二个案件是对7名涉嫌非法入境的人作的判决，这7人由前一案例的同一律师辩护，案件同样在香港沙田判决。结果是法官判处这7个人有罪。分别监禁4—15个月不等。法官的理由可归为以下两点：第一，满清政府与英国政府1989年签订的条约不是香港法律，无法律效力；第二，若不将此7人人判刑，则对以前被判刑的非法入境人士不公正。其实港英政府早就无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的有关规定，上述行动只不过是寻找一个法律上的借口而已。

二、1951—1980年的非法移民

1951年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边界被封锁，两地之间民众的自由往来状况结束，从此产生了非法移民与非法入境问题。1951年以后，中国内地先后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香港问题。据与香港只有一水之隔的深圳资料，该市在1951年封锁边界以来在1957、1962、1972和1979—1980年发生过

4次外逃高潮^[2]。

在这几次外逃高潮中，以1962年与1979—1980年间的两次特别突出。三年困难时期，内地的经济困难导致了大批广东居民进入香港，据称仅1961年4、5月份，至少有6万人成功进入香港^[3]。由于经济困难导致了社会不稳定，当时在广东的一些地方外逃现象严重，在广州市还触发了“东站事件”。在1962年5月底谣传6月1日香港将“大赦（入境）三天”，导致在6月1日和2日大批人想去香港，在广九直通车的起点广州东站发生骚乱^[4]。由于越来越多的非法入境者进入香港，港英政府在1962年5月宣布强迫遣返非法入境者，到1965年10月又放弃这一政策，代之以收容庇护政策。这是港英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第一次转变。

在6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进行了文化大革命，政治动荡、经济萧条，在这种背景下，非法进入香港的人口再次增加。为了对付非法移民问题，在1974年港英政府开始了边境堵截，实行了所谓的“抵垒政策”，就是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越过边境进入市区，就可以在亲友的陪同下领取合法居住证件，获得居留权。

“抵垒政策”在1978年以前似乎有效，不过到了1978年以后则完全失灵了。仅1979年与1980年的两年内，估计有20多万人成功地越过边境进入香港。港英政府不得不在1980年10月底取消“抵垒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对非法入境者无论在香港何处被捕，既被送返中国内地，也就是所谓的“随捕随解”政策。从“抵垒政策”到“随捕随解”是港英政府的第二次政策转变，这次政策转变只是遏制了非法入境的高潮，并没有真正解决非法入境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从70年代开始到香港政府停止“抵垒政策”时，非法移民香港的中国内地居民超过30万人。非法移民构成香港社会重要一部分。与此同时，大量的人口外逃也给中国内地带来深刻影响，根据深圳市收容所统计，在1974—1980年间，深圳市收容外逃香港失败被遣返人员达到16.96万人次。

三、1981年以来的非法入境问题

取消“抵垒政策”以后，虽然非法入境的人数

有所减少,不过数目仍然十分可观。在1981—1995年间,累计被捕的非法入境者达到31.7万人次之多。现在从中国内地偷渡香港的人,大多数是以到香港当黑市劳工为主。有一些偷渡者多次往返香港和内地,据称在深圳的乞丐中有的偷渡香港行乞,有一个湖南籍的乞丐,在两年内连续偷渡18次^[5]。由于取消了“抵垒政策”,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的、有较大影响的社会问题,诸如“水上新娘”、“无证妈妈”、“小人蛇”和非法劳工等等。

表1 1970—1980年来自中国内地的非法入境者(人)

年份	在边界被捕者	逃过搜捕者
1970—1974		79083 *
1975	1133	—
1976	810	—
1977	1779	6600
1978	8192	28100
1979	89900	107700
1980	82197	110000

说明:“*”非法入境后申请身份证的人数

资料来源:1. 1970—1974年资料来自《华侨日报》,1986年11月2日

2. 1975—1980年资料来自《香港皇家警察年报》、《香港年报》(有关年份)

表2 1981—1995年被捕的非法入境者(人次)

年	在边界被捕者	逃过边界后被捕者	合计
1981	7530	1690	9220
1982	8676	2484	11160
1983	4671	2933	7604
1984	9653	3090	12743
1985	12616	3394	16010
1986	16832	3707	20539
1987	22425	4282	26707
1988	13581	7227	20808
1989	5452	10389	15841
1990	9592	18234	27826
1991			25600
1992			27700
1993			37600
1994			31400
1995			26600

资料来源:1. 1981—1990年资料来自 HongKong Report, 1991, p245

2. 1991年后资料来自《香港年报》(历年)

香港从事渔业和运输业的水上居民,由于水上生活枯燥艰难,香港的女性不愿意嫁给水上居民中的男性,未婚的男性水上居民择偶困难,只好把择偶范围扩大到中国内地,造成了所谓的“水上新娘”问题。在80年代中期,大约有近千名由内地嫁给香港水上居民的内地女性在香港,她们如果离开居住的船只上岸,就属于非法入境者,故被称为“水上新娘”。水上新娘只能生活在船上,可以自由出入香港水域,但是不能上岸,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水上新娘的困境引起了有关部门和舆论界的关心与同情,最后这个问题在内地与香港双方的关注和协作下,按照水上新娘嫁来香港的时间顺序,先后给予她们居住权。

与水上新娘问题相似的另一个社会问题是“无证妈妈”。无证妈妈指的是丈夫是香港居民,而妻子则属于居住在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当妻子在香港产下子女后,子女因父亲是香港居民而自动成为香港居民。在香港的医院分娩,要出示有关证件,此时母亲的非法入境者身分就会暴露,故被称为“无证妈妈”,母亲要被强迫遣返中国内地。无证妈妈实际上是当年大规模非法移民的副产品,由于非法移民以男性青年为主,使香港人口的性别比,特别是青年的性别比偏高,择偶困难,许多男青年到中国内地择偶,而配偶又无法及时通过合法渠道移居香港,只好用偷渡的办法来达到家庭团圆目的。

比无证妈妈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小人蛇”问题,香港人把偷渡非法入境的人称为“人蛇”,把组织指挥非法入境的人称为“蛇头”,“小人蛇”顾名思义,就是未成年的偷渡者。据报道,已发现的年龄最小的“小人蛇”只有三岁。与形成无证妈妈问题的原因一样,小人蛇问题也是在短期内大量的人口涌入香港带来的一个后遗症。许多合法或非法的移民在移居香港时,出于各种原因而把未成年的子女留在原来的居住地,造成骨肉分离。当父母亲在香港立稳脚跟之后,自然要把子女接到身边,可是苦于入境名额的限制,在短期内无法与骨肉团聚。一些人只好忍痛冒险把在家乡子女的命运交给偷渡集团,用非法的方式来求得家庭团聚。从中国内地偷渡到香港的小人蛇数目相当可观,仅仅是被截获的

数目就相当大,1982年至1987年4月就有7275人^[6]。估计成功偷渡的小人蛇要超过被截获的人数,否则就不会有众多的人去冒险偷渡。在偷渡过程中,一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警方搜捕,或者燃料不足,就把小孩抛弃,也有非法入境的儿童在偷渡行动中丧生^[7]。小人蛇问题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因此在1987年4月27日香港政府突然宣布:在4月28日一天,对非法入境的14岁以下儿童可以偕父母前往入境事务处登记,核实资料后给予居留权。同时又宣布除了1987年4月28日这一天之外,逾期无效,并且下不为例。

香港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其周边地区,自然就无法避免出现黑市劳工问题。一些香港包工头和小老板出于经营成本的考虑喜欢雇用黑市劳工,这些因素导致黑市劳工一直影响着香港的劳动力市场。黑市劳工主要来自中国内地,也有一部分来自南亚地区。黑市劳工主要指的是那些在香港工作的非法入境者,一些以探亲、旅游身分合法入境,但是没有允许工作签证从事有收入的工作的人,也是一种黑市劳工。黑市劳工大多数在建筑工地工作,也有一些从事其他体力工作的黑市劳工。

在开始阶段,港英政府抓到非法入境作工的人,就按照非法入境处理,采取随捕随解的政策,这种政策根本无法阻止非法入境工作的情况。据推算,在80年代后期,一个来自内地的黑市劳工只要在香港拼命工作一个月,收支相抵之后(这个支出包括付出给蛇头的偷渡费用在内)能够净赚1400元港币^[8]。这个数字大体相当于当时中国内地一个普通工人3个月的工资,或者是一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在如此悬殊的收入差距下,势必很难杜绝黑市劳工。事实上,从80年代中期开始偷渡来香港的人,大多数都明白无法取得香港合法居民的身分,其目的是当黑市劳工赚钱,而不是以前哪种以定居为目的的偷渡。在偷渡者当中也有少数是以来香港从事犯罪活动为目的者。

1988年5月14日,香港警方首次引用非法入

境法,对67名被捕的黑市劳工判入狱15个月的惩罚,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恐吓黑市劳工。结果是事与愿违,黑市劳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使香港的监狱人满为患。到1991年10月,共有2600人因非法入境罪在香港服刑。据香港警方称,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非法入境者,在香港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挣了一笔钱就反向偷渡回到中国内地^[9]。

四、讨 论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香港非法移民和非法入境问题作出进一步分析,但是从香港的事例,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第一,一个地区如果与其周边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太大,就几乎不可避免大量的人口从落后地区流入。

第二,用行政与法律手段来控制人口的非法流动,其效果是有限的。

第三,要解决不理想的人口流动,特别是非法流动,最根本的道路是缩小地区差距。

注释:

- [1] 《国际条约大全》,商务印书馆,1925年
- [2] 《深圳市十年大事记》,海天出版社,1991年,第3页
- [3] 邵珠:《港府应坚拒越南难民居留》,《信报财经月刊》,1979年第4期
- [4] 《广州百科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91页
- [5] 康普华:《经济特区和香港社会福利服务业新崛起》,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352页
- [6] 《明报》,1987年5月6日
- [7] 《明报》,1983年6月6日、1987年5月6日
- [8] 《华侨日报》,1990年6月1日
- [9] 季达:“大陆黑市劳工背后的辛酸历程”,《当代》,1990年33期

[责任编辑:黎熙元]

从香港城市大学的教师培训课程 看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提高大學教師素質

王家瑾

香港的几间大学都设有“教学专业发展中心”一类 的专业机构，例如香港大学的“大学教育发展中心”（CAUT—Centr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University Teaching）是直属学校领导的学术机构，与本校教师或其他学校合作开展教学研究；并为教师开办旨在提高教学水平的专题讲座。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教学是基础，只有进行教学研究才能提高教学水平。尽管港大的CAUT于1994年才成立，但在学校内已具有重要的发言权。又如香港城市大学，在“教育科技统筹处（ETU）”里设有“教学专业发展部（PDU—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Unit）”，承担教学研究、教学媒体制作服务以及教学评估与教师培训等多项任务。由于多年来PDU对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95年便从教育科技统筹处中独立出来，扩展成为“教学专业发展与质量服务处（PDQ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Services）”专门从事课程与教学研究、评估和教师培训，职员队伍与机构有所扩大。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岭南学院的教学研究与教师培训则由“教育科技中心”承担。

纵观这些大学的教师培训课程及其运作情况，从教学思想、课程体系到培训模式均有其特色，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借鉴。尤其在我们深入探讨教学改革，培养跨世纪高素质人才并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更需要博采众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以下着重剖析香港城市大学的教师培训课程情况。

一、教师培训服务对象与组织方式

参加培训的教师大致有如下三类：第一，新上岗或教学年资较少的年轻教师；第二，一些从社会上聘到学校任教的有成就的技术专家，他们的技术专长与教学能力是相关而不同等的两个方面，他们要站好讲台并受到学生欢迎也是需要经过培训的；第三，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的年长教师，他们在社会不断发展中也面临着更新教学思想与教学内容、调整师生关系等新问题。比如，时代的信息性、开放性、自主性与竞争性等特征，必然影响到教师与学生个体，而大学生对时代的反应与适应需求更甚，体现在学习上，其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和就业意识等都会十分强烈地影响到对教师教学的要求。因此这些教师的继续教育除了学科知识与科研的充实与更新外，教学问题的再学习、再培训也是一个重要内容。

他们认为，必须通过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来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教师必须不断地思考和解决“我如何使学生学得好”的问题。因此，不断帮助教师完善教育者的人格形象和提高教学能力，既是学生的需要，学校的需要，也是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

鉴于以上的指导思想，香港城市大学的教学专业发展与质素服务处（PDQS），会根据学生评估教师的几种表格汇总分析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根据教师登门求教和与教师交谈中发现的问题，根据

PDQS的高级研究人员自己的经验“估计”教师们在教学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来设计培训课程。这些课程多为短课程,其课名、内容、宗旨和论题都列在一本“培训指南”内。平时则按时发出各课程上课日程表,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登记。PDQS一般不会主动去找教师来参加培训的,但是教师必须修满若干课程才能获得一份证书,这是教师等级升职的依据之一。

“培训指南”内的课程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充实的,一般每一至两年便会有一本新的版本提供给教师。其中,一些侧重“基础性”的课程无大变化;一些与科学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例如计算机运用等)课程,则更新较快。

笔者曾聆听过其中的三个短课程,并对1991年“培训指南”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又对1992年的版本与1994年的版本作了粗略的比较,可以看出其教师培训课程体系的特点。以下摘要列出,以便于分析和说明问题。

二、教师培训课程内容概要

这些短课程共有6类40多个课目,现概略列举如下:

1. 课程设计、教学发展与评价。含10个短课程,例如:1)研究学生的个性特征;2)教学方法与课程目标相适应;3)行为目标:教与学的效果评价;4)教学过程评估的实用策略;5)学生评估教师;6)关于改进教学质量的最新研究和发展;等等。

2. 课堂教学技巧。含12个短课程,例如,1)备课;2)在授课中“陈述”与“讲授”是不同的;3)课堂中教师与学生的沟通;4)丰富你的教学方法;5)“角色扮演”的有效运用;6)改进辅导策略;7)对学生的监督;等等。

3. 对学生学习的评价与评估,含5个课目,涉及试题种类的选择、设计、评价与改善,和对学生考试结果的可靠性分析等。

4. 教学媒体的运用,含6个课目(略)。

5. 计算机教学,含7个课目(略)。

6. 研究与刊物。含3个课目(略)。

以上列出的那些课程分别由几位专门从事教学研究的教授和高级讲师承担,课时2—6小时不等。

此外,在“培训指南”中,对每一门课都简要注明“课程的宗旨”、“论题”与预期“目标与效益”。以下侧重介绍关于“课程设计”与“教学技巧”方面的几个课目,从中可以看出该校教师培训的指导思想及课程特点。

例1. 课名:研究学生个性特征——与课程改革密切相关的步骤。

宗旨:这个专题的目的在于展示研究学生个性特征对课程改革过程的影响。每门课程对于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学习障碍,我们将讨论怎样使同一门课程为不同的学生提供不同的学习方法,提出克服学习障碍的相应方法。

论题:▲学习过程剖析;

▲各种学习途径的区别;

▲学习方法、课程目标以及教学方法之间的联系。

效果:教员们将认识到,对学生的学习方法进行经常性研究,将产生新的教学方法,这是与教员个人作教学研究密切相关的。

例2. 课名:授课过程中“陈述”与“讲授”之不同。

宗旨:这一专题的目的在于展示怎样更多地运用“讲授”而非照本宣科,鼓励学生提出各种意见、假想,引导他们独立解决问题。

论题:▲提问的技巧;

▲生动的讲授情境;

▲在讲授过程中运用演示。

效果:教员们将懂得如何避免使自己的讲授陷入仅仅是对实际情况的陈述,使讲授成为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宗旨的传媒工具。

例3. 课名:讲授与沟通

宗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有效的沟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专题着重介绍沟通的方式,分析沟通的过程,有益于教师分析和提高师生之间沟通的技巧,活跃课堂教与学的气氛。

论题: ▲沟通的方式;

▲对与教学情境相关的交流过程分析;

▲避免师生交流过程中出现冷场的可行方法。

效果:将加深教员们对课堂沟通过程的理解,以及对在教与学过程中影响沟通的各种因素的认识。

三、教师培训课程的特点分析

从以上6类40多门课程及其部分课程的明细简介,加之笔者聆听其中三个课目时的体验,试将香港城市大学的教师培训课程特点归纳为四个“十分注重”。

第一,十分注重向教师传授“以学生的主体地位为中心”的教学观念和思想。

在讲课中,他们曾展示了两个简单的图形说明教学活动必须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不应该满足于自己是用心地、努力地把教材内容讲清楚”,而是“更要关注学生是怎样用心来学习的”。要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向学生了解,“你听到我讲了些什么?”,必须努力“拉近”教与学这两个环节的距离,并使其产生交融的效应。

显然,在教学活动中不是简单地要求学生配合教师教学,而是强调教师为学生学到知识和学会学习而服务,激发学生产生学习欲望和兴趣,引导他们主动地、积极地、科学地进行学习,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体现在教学行为上,又是以“研究学生”为开端、为基础的。并且通过课堂讲授、课堂中的师生之间的沟通,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

第二,十分注重用各种教学理论直接指导教学行为,提高教学操作能力。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要切实贯彻到教学过程中,必须有与这种教学思想相适应的教学行为与技巧,使教师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方法与课程目标紧密关联在一起,实现教学的优化。

从前面介绍的课目及课程内容可以看出,对在岗教师的培训,完全着眼于提高教学能力与水平。因

此这里没有设置几十学时“大学教学论”一类的大课程,而是针对教学操作中的若干主要问题,运用相关的基本理论,有如做“分解动作”一样,设置若干短课程,而这些课目的宗旨都是围绕学生的。

例如,在“讲授技巧”这个课目的“宗旨”中就包含“怎样开头才能吸引学生”、“怎样讲得动听,能够打动学生”等。在“丰富你的教学方法”、“授课中‘陈述’与‘讲授’之不同”等课程中,都是指导教师怎样避免“满堂灌”、“照本宣科”和产生压抑学生思维的沉闷课堂气氛。同时,又要避免将“满堂灌”变为“满堂问”不善引导学生积极思维的情况,在上述课程中还要讨论“提问的技巧”一类十分具体的做法。

显然,他们将在岗教师培训作这样的定位是恰当的。因为对于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来说,首先是教学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从事单纯的各种教育理论研究;其次,为提高教学水平也必须进行研究,而这个研究是立足于教学实践的,正如以上有关课目明细中所提到的,“对学生的学习方法进行经常性研究,将产生新的教学方法,这是与教员个人作教学研究密切相关的”。这里不仅不排除教师作专业进修时对教学论等系统理论课程的学习与研究,反而为专业进修打下良好的基础和确立明确的方向。

第三,十分注重短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用“工作坊(Workshop)”与“研讨会(Seminar)”的形式,创造学员(教师)之间的研讨切磋、现场表演练习的环境与条件,包括强化训练的“微型教学”。

在“课目明细”中,大多提到“有相应的实践机会”,“在讨论中练习这些技巧”等等。关于“微型教学”,在“课目明细”中这样写道:“有几种帮助教师对自己的表达技巧和沟通技能进行自我评价的方法,微型教学即是其中较精确的方法”,“有利于作出及时的改进,增强课堂教学的信心”。

在教师培训课程的教学中,十分注重教师与学员、学员与学员之间的双边与多边活动,不仅有利于教学思想与教学内容的内化,它本身就具有很强烈的示范性。这也是笔者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

一个特点。

第四,十分注重授课教师的教学理论研究水平,也十分注重他们的课堂教学水平,对于教师培训的授课者来说,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以香港城市大学 PDQS 副主任 Mr. Ken Stafford 为例,他历任澳洲教育研究协会与教师教育协会的重要会员;兼任美国和香港的课程发展与教育研究协会会员。他十分注重将自己对课程发展、教学设计与教师教育的研究成果用于教学实践。1990年12月应邀来中山大学讲学时,就课堂中的师生沟通这个主题作了生动的讲解与有趣的示范,例如怎样在上课开始的一分钟内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教师身上;教师怎样运用丰富的面部表情,尤其是师生目光交流的丰富内涵。这样的理论阐述与示范相交融的授课,对于在岗教师的培训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其中蕴含的对教师职业的敬业精神、对学生学习与成长的高度责任感等,都构成了一种潜台词十分丰富的感染力,促进培训目标的实现。

四、思考:借鉴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以上提及的香港城市大学 PDQS 的教师培训课程概况及特点分析,固然是与香港的经济、文化背景、大学教育特点,以及相应的教师聘任、考核与升迁机制密切相关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其中透射出来的现代教育观念及其对教育行为的指导性,是这种机制的基础与依据。

教育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大课题,其中涉及到由教师、学生、教学内容与媒体以及教学环境等多要素构成的教学系统,处于核心地位。现代教学要加强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在教学过程中的互动,实现教学的优化。而教师的教学观念与思想以及相应的教学方法与技巧,是否符合教学系统优化的要求,直接关系到教育水平与质量,关系到培养高质量人才目标的实现,可以认为是教育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之一。那么,旨在提高教师综合素质的培训,更具有紧迫性与前瞻性。国家教委是重视高校教师培训工作的,成立了华东、华中等

七个高等师资培训中心,还有分属这些中心管辖的多层次培训网,形成了组织机构上的条件与保证。

但是,我国大学教师的培训问题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可以从中看到大学教师培训工作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艰巨性;也可以看到借鉴他人之长加以改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在认识上一般都认为只要有学问的人就可以当大学教师;只要能够把本学科的理论和专业讲清楚就是一名好教师。长期以来,大学教师不研究教学理论与教学方法,大学教学研究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往往体现在教师的个人经验里。同时,传统文化中“大道无形”、“重神轻形”、不屑于教书形式和手段等影响,不仅仍然牢固地控制着大学课堂,也控制着大学教师培训课程的课堂,“讲授教学论的教师,其本身的讲授方法就不符合教学论原则”,这样的反映十分透彻地说明了当今大学教学改革和教师培训中的“观念瓶颈”。

第二,教学观念的滞后和教学培训与时代发展的不适应,正影响到大学青年教师的现状与发展。以事实为例,据报载(《北京日报》95年12月12日)北京市有关部门举办了一次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由48所高校经初赛选拔出来的3000多名文理教师参加,其中反映出的普遍问题一是照本宣科、音调平平、“连珠炮”似地不停地讲,学生没有思考余地;二是缺乏教师的主体姿态,讲话不对着学生;三是教案中错别字、板书凌乱与潦草等等。因此,主办部门深刻地指出,“如果今天我们还不重视青年教师的教學基本功训练与考核,明天则难免误人子弟”。

此外,关于青年知识分子(包括青年教师)的敬业精神需要补课的报导与评论也屡见不鲜,在我们对“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素质的竞争”取得共识的时候,也必须进一步思考这“素质竞争”的“本与源”这个深层次的问题。显然,以上提到的“误人子弟”,就应该扩大理解为“误”国家的人才,“误”民族的竞争力。

[责任编辑:陈丽君]

“港式中文”初探

张振江

一、引言

香港是个多元的社会，其语文及语文运用也呈多元状态，仅从语与文的关系来看，主要的即有以下三组：

1. 英语及以英语为基础语言的英文；
2. 国语及以国语为基础语言的语体文；
3. 香港话及以香港话为基础语言的方言书面形式。

在一个相对来说语言空间 (linguistic space) 较为狭小的语言社区 (language community) 中存在着的这些语、文，不可避免地会处于经常性的语言接触 (language contact) 中，从而对语文运用者造成严重的干扰 (linguistic interference)；另一方面，香港的语文运用者绝大多数以香港话为母语、日常交际语，英语以及国语只是后来的习得，这种语言机制必定会把上述干扰所形成的“噪音”加以放大，其直接后果，就是在运用一种语、文时，不适当地混用其他语、文的成分。香港人把这种三者糅杂的形式称为“三及第”等，学术界通称为“港式中文”。

“港式中文”造成了严重的语文问题，因而近年来日益为学者们所注目，本文中，我们试从描写语言学的立场出发，对“港式中文”的语文特征加以初步的探讨。

二、“港式中文”的基础语言

对于“港式”中文，人们常讥之为“中西混合语”，目之为“华洋夹杂”，“中英交融”等。那么，它是怎样混合而成的？即，其基础语言是什么？

刘殿爵指出，“港式中文”以粤方言为语法架构，是在粤方言的基础上掺杂英文语词而成的^①；田小琳认为是中文与英文夹杂的混合文，是口头上粤语夹杂英语的混合语的反映^②。这两种代表性说法都

认为香港话是基础语言，这与港人众口一致的“中英糅杂”的看法一致，相当多的“港式中文”用例的确是这样形成的，试举例如下：

- (1) 费事同你拗，打IDD问吓佢。

——陈《那》

- (2) No way! Sam 喇时都未曾会开始 Date Carroll!

——陈《那》

- (3) Form fee 渣！也把声咁老嘅！连个名都咁老土！

——周《周》

- (4) 一句讲晒：anything goes。

——周《周》

- (5) 固意经常去 Dino 饮茶、Rick's Cafe 买醉、兰桂坊泡头、到 J.J. 扮 high、穿 Timberland、玩 Wind-Surf。

——周《周》

但是，刘、田的说法不能解释如下的用例：

- (6) 大家只说：“到现在还看龙虎豹和中华英雄，认真 bad taste。”

——周《周》

- (7) 当你懂几只英文字时，你必须在你的说话中掺杂英文单字，甚至作状不记得某些物件的中文名称，因为你怕如果你不是那样的话，人家以为你是大乡里^③。

——于《港》

- (8) 如今，越轨怪鸡行径通通自由放任。一旦备受制约，越轨者无须理睬，反而制约者却须解释点解多管闲事。

——周《周》

这些用例显然是以国语、语体文为基础语、文，是在国语、语体文中混杂了英语、香港话的语词。

由此可知，“港式中文”共有两种基础语言，一以香港话为语法架构，杂用英文语词，一以国语为

语法架构,杂用英文或/和香港话语词。所谓“中英糅杂”,只是个大致说法,“中”既指香港话,亦指国语、语体文,被“糅杂”了的也不只是“英”,还有香港话。

三、“港式中文”的形式特征

如上所说,“港式中文”其实有两种基础语言;被夹杂进来的既有英语成分,又有香港话成分。但在实际上,人们普遍误以为只是“华洋夹杂”、“中英混合”,误认为被夹杂进来的只是英语成份,这种意识的形成,主要与“港式中文”的形式特征有关。

表现在口头方面,由于香港事实上极少人以国语为母语、日常交际语言,而以香港话为母语、日常交际语的人却占总人口的98%以上,因而口语形式的“港式中文”,主要是香港话中夹杂英语语词这种“中英混合话”,这个特征颇为令人侧目。田小琳认为“港式中文”是口头上粤语夹杂英语的混合语的反映,这既说明了“港式中文”的口语形式特征,也大致说明了为什么人们会有如上误解。

表现在书面上,“港式中文”形式特征较为复杂。

语体文与香港话夹杂时,通常的情况是在语体文中杂用香港方言字、方言语词,例(6)至例(8)即是杂用香港语词的用例。通常,人们只是认为这属于用词不同,至多认为不当用方言词语而用了方言词语,而并不认为有何形式上的不妥。

比较特殊的一种是在说明背景、叙事等时用语体文,而在对话等时用香港话,《那树》、《探亲奇遇》可算这种形式的代表,谢常青更指后者为香港话、白话文体、英文混用而成的“三及第”的典型代表。

语体文、香港话杂用英文时,则充分表现了“港式中文”的形式特征,试如下几例:

(9) 因此,我们均钟情卡拉OK。

(10) 我们渴望做 avant-garde、做 free-lance writer、做 bohemian、做 yuppie。

(11) 八十年代优皮集体高唱, We don't want freedom, we don't want justice, we just want someone to love。

(12) 健康干净但又“夹 Band 唱 Rock”。

(13) 一句讲晒: anything goes。

——均见周《周》

(14) 今日睇真 D。

——亚视节目名

(15) 噓! Shut up! 咪嘈呀!

(16) Sorry! 对唔住! 因为 B 仔啱啱瞓落!

——均见朱《探》

不仅把完全异质的语言成分混用进来,而且从字母到单词、短语以至语句都可杂用,成为“港式中文”引人注目的标记性形式。

由此可知,“港式中文”的形式特征主要体现为杂用英语语词以至字母,而杂用香港话时并无明显的形式特征,这个事实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港式中文”最突出的印象是“华洋夹杂、中西交融”。

四、“港式中文”的语词特征

“港式中文”既然是由糅杂进了香港话、英语的语词而形成的,那么,被糅杂进来了的,是哪些语词?亦即语词特征如何?

香港话语词。“港式中文”所夹杂的香港话语词,有些是从字到语词都是不见于国语的,是香港独有的方言字、词,如:

嘞 嘅 嚟 閒 𨳊 𨳊 𨳊

𨳊 𨳊 𨳊 𨳊 𨳊 𨳊 𨳊

很难确切统计香港话中究竟有多少个自造字,但专为香港人设计的 Window 95 软件系统的一种版本,即收录有七百多个。这些字多数只见于以香港话为基础语言的方言书面形式中,但有相当部分并见于“港式中文”^④。

更为常见的还是通常意义上的方言词语,即利用汉语原有的构词成分创造出来的表达方言含义的语词。这些语词因无对应的国语形式,因而得以进入“港式中文”,如:

无厘头 煞食 核突 怪鸡 乌龙

高买 阻街 架步 杀鸡警司 仆街

通天巴士 拍散拖 木瓜鲜奶 过骨

大只讲 订煲 秘捞 蜜斟 藕线

因无对应形式而采用香港话语词,可以说是“港式中文”夹用方言词语的主要原因,也是“港式中文”在语词方面的主要特征。

“港式中文”另一词语特征,表现在有对应的国

语形式却使用或并用香港话形式,试如:

电子计算机——电脑 公共汽车——巴士

激光——镭射 偷渡者——人蛇

调戏妇女——非礼 拍马屁——擦鞋

自行车——单车 马上——即时

侦探——探员 办公楼——写字楼

从而构成相互竞争的形式,这涉及到文化容忍度(culture compatibility)等复杂因素,与下二例单纯是母语干扰的结果并不相同^①:

(17) 你怎么发达起来的?

——阮《麦》

(18) 圆滑本应是成年人的美德。

——亦《麦》

英语语词。在语体文、香港话书面方言形式中杂用英语语词,这一点最为人诟病。但这种形式的“三及第”杂用的英文语词,在特征上与语体文杂用香港话语词有根本的不同。

被杂用进来的英语语词,有一部分是由于汉语(国语、香港话)缺乏相应的表达形式而致,是纯语言因素作用的结果,除去直接用英文形式之外,与汉语中的其他英语借词并无性质上的不同。试如:

(19) 卡拉OK才兴旺几个月,如何已冒起夹杂卡拉OK、Disco、酒廊、MTV、自组乐队表演的综合酒廊。

(20) 这群大学同学会是舞会、名牌社团宴会的party-goers,……

(21) 优皮经已异常health-conscious,不是Keep fit保持健美身裁,而是……

——均见周《周》

但是,多数情况下却是弃相应的汉语说法不用,而夹杂英文形式,试如:

(22) 她会立刻装得很凶的样子说:“O.K. I'll tell your mum”。

——梁《我》

(23) 嗰车塞死晒,司机一齐揸horn。

(24) 我唔like it。

(25) 妳hap唔happy?

——语

(26) 太hard sell的情怀不但cheap,还令人毛骨悚然。

(27) 夹Band唱Rock。

(28) Friend过打Band。

——语

至于Cap水、where银、face、去social、in、cool、做show、percent、case、tips等更是口语、书面均屡见。流风所及,甚至出现了乌ly ly、luck luck声、pat pat、V wet这些假冒英文形式,而把原有的形式废弃了^②。以常用的英语语词(包括短语、句子)替代相应的汉语形式,是“港式中文”在杂用英文时的主要语词特征,它是传统、文化交融、语言心理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由此可知,“港式中文”的语词特征,夹用香港话时主要体现为以香港方言语词补足国语所无,夹用英文时主要体现为以简易、常用的英文语词顶替相应的汉语、中文形式,也是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五、“港式中文”的语法特征

“港式中文”既是“三及第”之作,其语法也颇有特色,这主要表现在词法方面,句法方面相对较为稳定。

词法。词法方面最大的特色是词类乱用,在夹用香港话形式时依源语(Source language)用法而有违目标语(Target language)用法,在夹用英文形式时依目标语用法而不顾源语用法。如下列例子:

(29) 事事让你、迁就你、宝贝你。

——阮《香》

(30) 约会小姐,没耐心和勇气是不行的。

——张《模》

(31) 她打开门,苍白着面孔。

——亦《香》

宝贝是名词作动词用、约会是不及物动词作及物动词用、苍白是形容词作动词用,都不是国语的用法,又如:

(32) 我不可单独留下来。

——岑《初》

(33) 我不要认识这种人。

——董《董》

(34) 他付出多多,收入少少。

——岑《初》

国语中,“可以”的否定形式当为“不能”、

“要”的否定形式当为“不愿意”、“不想”，“多”与“少”，则并无此一类重叠式^⑦。又如：

(35) 推销母爱，孝心商品化，实属 sure win。

(36) 优皮讨厌 loud。

(37) 成为八十年代香港最“in”的话题。

(38) 不是八十年代王晶斗贱斗 cheap 的不文笑片，没有堆砌性感美女的卖肉场面。

(39) 闲来 shopping 考究衣装配搭跟时尚趋势。

(40) 寂寞热线快趣 call。

——均见周《周》

这就根本不顾原来的词类特征。“in”居然可以被“最”来修饰，显然是依香港话而非英语的结果。

句法。“港式中文”在句法方面较少特色，突出的有结构省略、语序等。如下列例子：

(41) 你当我水鱼？

——语

(42) 搅得 D 人有晒气氛。

——语

(43) Friend 过打 Band。

——语

(44) 噤！Shut up！咪嘈呀！

——朱《探》

(45) 阿航俾还书你。

——语

(46) 但必须有独特 selling point。

——周《周》

例(41)、(42)、(46)各省略了一定的成分，例(43)、(45)是特殊语序。例(44)则是反复，“港式中文”中常可见到这类同义反复的词语。

此外，构词上也有一定的不同，如 ABB 式构词，搭配习惯多与国语有异：青 BB、黑麻麻、凶巴巴等。但这与省略、语序等一样，与香港话的用法相同。

因此可以说，以香港话为基本语法架构，但词类乱用现象严重，这是“港式中文”的语法特征。

六、结 语

本文中，我们从静态描写的立场分析了“港式中文”的若干特征，讨论了其现实的混合形态。那么，这种混合态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其具体的形成

过程如何？将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路向？这些问题本文未能涉及，值得我们去再做探讨。

注释：

①刘殿爵：《语文运用与思考能力》，《语言与思想之间》，香港中国语言研究中心版。

②田小琳：《再论香港地区的语言文字规范问题》，《语文建设》96.3期。

③这个例子被侯精一认为是典型的例子。见所著《试论'97后普通话在香港的地位》，《中国语文》96.2期。

④也可将此看成形式上的表现之一。

⑤普通话语词与香港话语词的关系，参考：

a. 姚德怀：《“英文为准”与“中文为准”》，《中国语文》96.2期。

b. 田小琳：《香港流通的词语和社会生活，“双语又方言”，中山大学版，1989。

c. 谢常青：《当代香港语言初探》，见《第二届国际粤方言论文集》，暨南大学版，1990。

d. 陈健民：《普通话对香港词语的取舍问题》，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4.3期。

⑥彭志铭著《次文化语言》（香港次文化堂1994年版）举例甚多，足资参考。

⑦这方面的讨论，必须与香港普通话区分开。香港普通话不是“国语”，不是“港式中文”。本文称为国语而不称为普通话，既是出于对港人习惯称呼的考虑，也照顾到国语与普通话、香港普通话的区别。

本文语料来源：

1. 陈《那》：陈宝珍《那树》，《香港文学》，第50期。
2. 周《周》：周华山《周润发现象》，香港青文书屋，1990。
3. 于《港》：于君明《“港式中文”的一斑》，见《语文建设通讯》，95年第3期。
4. 朱《探》：朱克等《探亲奇遇》，《香港文学》第51、52、53期。
5. 阮《香》：阮朗《香港大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6. 亦《香》：亦舒《雪雪海》，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7. 梁《我》：梁锡华《我今年八岁》，《香港文学》第54期。
8. 张《模》：张君默《模特儿之恋》，《花城》，1986年第1期。
9. 岑《初》：岑海伦《初恋的吻》，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10. 语：作者平时收集的语料。

[责任编辑：肖贤彬]

后殖民处境 与 香港身分辨析

——香港文化研究书刊述评之二

艾晓明

二、香港文化的多层面透视

《今天》1995年第1期(总28期,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由梁秉钧先生组稿,共有二十位作者撰文,讨论香港文化,合为一个“香港文化专辑”,以其专题讨论性质引人注目。作者有香港和北美的华人学者,还有香港的小说作者、时装设计师、电影工作者。他们文章涉及的范围和思考的焦点,是有关香港文化的特质。文章呈现的视野对于我们内地的研究者来说,是独特而值得了解的。

辑中李欧梵和周蕾的文章是两篇总体性的探讨,突出了对香港文化特殊性的认识。李欧梵从香港地理位置的边缘性说起,谈到香港在政治上的边缘性。他说,香港人在六十年代以来大多选择自我认同,香港的本土文化也奠基在这个自我认同的过程中。“香港文化的动力并不完全出自精英人士的提倡,而是像自由市场一样,自有其生产和消费的活动规律。表面上它是西化的、商业性的,然而在表层包装之内仍然潜藏着中国文化的因素,这些因素的表现方式往往也不是严肃的,而是反讽、揶揄,甚至插科打诨。这就是一种‘边缘文化’的特色。”他还谈到,文化边缘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和民间文化的联系颇为密切,但并不抄袭“大传统”,而是将“小传统”作商业性的“转化”,变成了几种通俗“文体”,譬如香港电影中的武侠片和神怪片。

与李欧梵比较,周蕾论述《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九十年代香港的后殖民自创》,话题更具尖锐性和某种时间的紧迫感。作者熟知关于后殖民政治的新近讨论,她认为,香港面对的问题,即使在目

前不受外间注意,却与当前的后殖民论争有密切的关系。尽管香港作为殖民地的困境,与其它前殖民地相似,但香港没有独立地位的展望。她说的是,香港的问题在殖民的历史中具有特殊性。她还说道:近年来,香港的文化工作者对描绘他们独特经验的历史,愈来愈感兴趣。然而,香港最独特的,正是一种处于夹缝的特性,以及对不纯粹的根源或对根源本身不纯粹性质的一种自觉。这种特性,彰显了香港的“中国人”自我意识,也突出了它与其它城市的不同。香港不会以延续的纯民族文化为自傲;它的文化生产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协商。在这个协商之中,它要努力寻找自我的空间。周蕾的文章可以诠释李欧梵文中所讲的“自我认同”。她强调,香港要自我建构身分,书写本身的历史,但这又不等于天真地赞同她称之为“后现代混杂派”的观点。后者轻视了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的后遗恶果。她说,以香港作为讨论后殖民城市的目的,是要说明在殖民者与主导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第三空间。这意味着香港必须建立自主性与独立社会的观念,来维持本身的繁荣发展。周蕾接下来以罗大佑歌曲作品为分析对象,评述了罗大佑歌曲的题材、歌词文字形式与语言特色,还有罗大佑歌曲与崔健歌曲的差异。她将罗大佑歌曲的特性界定为“中介符号性”,她说,这表现了二十世纪末香港城市生活的中介符号性,而且为另一种批判活动创造了空间。罗大佑建构了另一类社会呈现的可能性,这种社会建基在文化工作与社会责任感之上,而不是一味依靠血脉、种族、土地这些东西。

专辑中对文化现象的讨论相对集中在文学、电影、广告三个类别上,大体突出了这三种媒介影响

社会及大众文化心理的广泛性。香港著名文学家刘以鬯在《香港文学的起点》这篇文章中说：香港文学的起点应该定在1874年，以王韬与友人合办《循环日报》为标志。他在文中介绍了王韬的文学成就，尤其强调王韬以新闻业创始人的身分传布中西文化、推动本地创作的“开拓精神”。这正如编者引言所说：“是一极有见地的看法，本身代表了一种历史观。”杨美仪检视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香港、中国内地、台湾出版的香港小说选本，还评议了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外文版的关于香港小说的选译，由此讨论了各位编者选辑标准与得失。董启章的文章《问世间情是何物——香港爱情书写生产》分析了流行文化中爱情小说的生产过程、作家的想象方式和性别意识，最后他指出：“如果我们把书写视作一项文化行为加以审视，那么是否‘媚俗’便会是比‘通俗’更为恰当的批评角度，因为‘媚俗’和文字的精致与粗陋无关，和题材的高尚与琐细无关，和作品属于‘严肃’还是‘通俗’也没有直接关系。媚俗代表一种依附权力论述、缺乏自觉和反思的态度，它并不限于流行文化，在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文化领域里，媚俗也是一只无形之手，操控着作品的意识倾向。就爱情这一题材来说，在我们这个爱情泛滥乃至人人没顶的社会，唯有抛开男性主导意识的成见，尝试从女性的角度透视爱情烟幕后的性别关系，才能令作品免于媚俗。媚俗与否，关乎的，是写作的视野。”潘少梅将香港的女性写作与后殖民主义的讨论挂钩，从而分析了香港女性写作的位置；罗贵祥讨论了女作家吴煦斌作品中处理自然的“变向”关系；何漪涟探讨了英文作家毛翔青几部被看作描绘“中国民族文化性”的小说。上述这些文章，或者是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流行文化的运作机制及其内在矛盾，或者是排除某种惯常的定论，提出文本中蕴含的特殊内容，意识特色，对于关注香港文学艺术研究的人，这些文章提供了新的信息、见解和研究角度。关于电影的三篇文章，通过分析香港电影中的大陆显影、香港怀旧电影的内容与形式、以及《东方不败》与《金枝玉叶》两部电影中的性别政治，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八十年代以来香港电影中的矛盾情

结，揭示了其中透露的电影与香港社会、电影与性别、电影与香港人的心理状态的关系。

高志强《深水埗》、马国明的《荃湾的童年》、邓达智的《祠堂灯笼幽幽挂》等文章，生动记录了个人的生活经验，从中可以看到香港这个大都市崛起的历史在个人记忆中的侧影。这些作品中表达的感情，其中的失落、追怀和对田园、亲情的纪念，此外，再加上何庆基绘画中的怪异香港（《坊间故事》）、王禾壁为《老殖民地建筑》留下的摄影、以及心猿的一部典故与幻象交织的小说（《都市·影像迷宫》）片段，所有这些真实和虚构、文字和图像作品，拼贴出一个形象混杂、难于定义的香港，再次提醒人们香港作为一个意义空间其多元复杂的特性。

阅读这些文章，可以感受到作者们对香港文化方方面面的思考，从中也表达出一种呼吁，一种要求，要求维护香港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空间，使之不受侵扰。无论如何，它总是一种表征，它反映了“九七”迫近的历史时刻香港文化人与文化研究面临的艰巨课题：认识香港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争取香港文化未来获得健全发展的空间。在这方面，避免情绪化、印象式的论断或许更有利于理智的思索。李欧梵批评内地知识分子的中心心态和这种心态的问题，见解甚好，但扯到“几乎没有任何人对香港文化和历史有真正的兴趣”，这个“真正的”就不知他如何界定了。作者后来还说到“目前香港文化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显然超过了美国”，泛泛言之，似乎不错，但这里没有对产生影响的是哪一部分内容，接受影响的又是哪一个社会层面作出辨析，我认为此论断有失粗疏。周蕾文章批评中国的民族主义，其中说，“大部分中国大陆人不屑地把香港视为颓废腐败、矫揉造作、充满污染的象征”，这个批评太笼统了。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倒是感觉，在内地有一些研究者或年轻人，却是把香港看作经济富足、思想自由、创作丰收的地方，问题是在出于无知或者是单纯的想象，他们把香港理想化了。“香港社会除了照旧跑马跳舞外，社会越来越荒诞怪异……尽是末世的怪异邪淫，就如大清帝国行将崩溃

前般的光怪陆离”。这样说的不是内地人，反而是这本专辑中的一位香港作者。其实周蕾自己亦自辩：“因为作为一个殖民地，香港的日常生活与发展一早被看成是‘腐朽’的，所以香港对文化纯洁性没有幻想，也不会对可能被‘平反’而感到兴奋”。我想，“没有幻想”，该是包括了本地的文化工作者对此地文化复杂矛盾的正视和承担吧。只不过，“被看成”是被“谁”、如何看，这也不可一概而论。一些文章中对“中国大陆人”、“大陆知识分子”看法，是否又说明，中国内地和香港、海外的知识分子，都很需要摆脱自身地域、文化身分的局限，彼此增进了解，沟通思想？作为一名内地学人，我相信，香港的文化讨论与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有重要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周蕾所说的，香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范例”意义。范例的意思不是完美，而是充分体现出现代化商业都市发展的前景和矛盾。罗大佑的歌曲同样在中国的城市、校园流行，香港文化讨论在《今天》这样一份杂志上发表，我想，这些正好表明了时下在内地和香港的城市文化中同样在发生着的现象，表明了香港的文化问题对所有中国人的重要。

三、写在家国之外

前面谈到周蕾的文章《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这篇文章和其它四篇原来用英文发表的文章，由其他译者翻译成中文，合编成书：《写在家国之外》，1995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周蕾，出生及成长于香港，在香港完成小学及大学教育，后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英文及比较文学系。

作者是身在北美的香港人，家国之外，是她的发言位置。作者在第一篇文章中谈到她所面临的学术圈中存在的问题、东方主义以及向中国的乌托邦实践欢呼的左派批评家们论述中的权力运作。在讨论“漂泊离散意识”“智识化”问题的同时，作者谈到香港给她的记忆和香港的处境。她认为，香港的历史使人倾向于一种“边境性”（border）或“超

场”寄生性（parasite）的实践——一种既对“中国文化”认同但又与中国现行政治文化疏离；对殖民主义反抗但又不愿看到全社会的繁荣遇到破坏的实践。当英国殖民化的权限在一九九七年寿终正寝时，香港将以一种在西方帝国主义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移交给中国，香港市民在此过程中，在其“漂泊离散意识”中流露着极其矛盾复杂的情绪。

由此，她谈到她这本书的目的：“我的目的，是用香港文化近年的一些问题，去反思时下占主导性的种种观念——像怀旧、革命、后殖民、群体等等。从思考关于香港的电影、流行音乐科技、流行音乐歌词、诗歌，我希望能够引出意识形态上的各类矛盾冲突，也同时引出香港文化的世界性。”

《爱情信物》一文从香港近年来的怀旧潮流谈起，她说到，假如殖民主义及东方主义的其中一种侵略手段是土著化，“那么香港近年的怀旧潮，就等于一个‘自我土著化’过程了。对于从事殖民主义及东方主义批判研究的人来说，这个特殊的文化政治显得复杂和值得注意”。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电影《胭脂扣》，她分析到，对香港来说，怀旧之情再不是对空间缺失的投射，而是对纯然时间的操控。要搜寻或追忆过往，现在只可以用时间作为幻想对象，在不同的压缩形式中进行。“李碧华的怀旧感与其他当代中国作家不同之处是，她显然认为，现世不过是一连串的偶遇，而偶遇的，往往是深藏在远古记忆里的事物。与众多以‘乡土’为寻根的当代作家不同，李碧华作品的特征，是对旧‘文学’材料的痴迷——这些材料包括文字、语句、方言、传奇及历史书。在李碧华作品中，被视为失去的，永不是那些乡土、‘纯真’或甚至是‘原始’的事物。她的故事都是关于城市的文明文化（很多时是香港文化），她把所谓缺失，看作是在过往与今日的文本互涉关系之间，一种无法说明但却又有迹可寻的事物。在文章的末尾，周蕾说到对这股潮流的看法，“这种怀旧倾向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们无法确定它所怀恋的客体。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只是这种感情所投射的缺失感。”在众多的港产片中集体地呈现的一种怀旧倾向都是企图把过去幻想化，而这个过去又

往往呈现在某些角色身上。这些角色独有的观看世界的方法——即所谓他们的“目光”——正是这些电影所表现的最为重要的迷人物体。“在怀旧电影的形象中，整个世界变成一件惨淡美丽的纪念信物。但假设如怀旧的浓缩形象传递着一种失落与伤感的感觉，这些形象同时也隐藏了及排斥了社会苦难的种种恶劣及令人不愉快的元素。”

《另类聆听·迷你音乐——关于革命的另一问题》讨论了中文流行音乐，崔健和罗大佑是被分析的例子。文中谈到，当今中文流行音乐提出了许多类似摇滚音乐在西方所提出的问题。其中首要的问题就是这种音乐对主导文化的批判功能。她说，在崔健的音乐中，歌词与音乐脱节，显示了部分的重要性。歌词因为语义模糊，变为一种声音，因此参与到音乐之中，在创造一种可以称之为“超越文字”的情绪。在这一部分，她还说到需要对“效用”问题重新思考。她的意思是，强调“集体模式”（对集体有用），生产出关于“第三世界”文化成员的定型的观点，认为他们唯一的动力就是为他们自己的文化辩护。“就中国而言，我把集体模式视为帝国主义强加于一个‘落后’民族的遗产的一部分。”而崔健的许多歌曲，“以不在乎的、讥讽的、身体感官的、甚至粗暴以及语义含混等方法，有意地摆脱集体主旋律的种种重负。”在这篇文章的其它部分，周蕾分析了流行音乐那种边缘性的存在和聆听这种行为的性质。另类聆听“将音乐从传统意义里解放出来：音乐并非一种完满而又无穷无尽的领域，而是领地总是在别处的部分客体。”此外，由随身听开始，聆听形式真正与过去截然不同了。这种音乐的微缩、便携性对聆听者说来，有不同的含义，它的作用，并非如某些批评家所说的，只是“被动”的，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主动的逃离和“无声”的破坏。

书中的最后一篇文章《香港及香港作家梁秉钧》旨在“提出一个另类的阅读殖民性和殖民地文学的方法。”文中首先谈到香港空间的特点和它在传统论述中的被想象的方式。她说，“如果土地和空间正是引发宏伟景观和英雄式历史感的元素，那对香港来说，土地和空间的意义是殊异的。”“土地并不

是一种至爱的‘乡土’，而是彻头彻尾的商品。”而另一方面，香港又在空间和土地的普遍缺乏的条件下，取得骄人的经济成就。然而，这成就通常或多或少被理解为是另一种缺乏——缺乏政治自治和自决权——的补偿。在一些中国作家的诗中，香港又被描写成等待拯救、急需母爱的弱女。周蕾要反驳的是把香港所拥有的东西看作某种匮乏的补偿，这需要正视香港的根源，“与它的殖民性一直共存的经济商业，因而就是香港的‘根源’：它从来不曾有过另外的社会架构。”“问题并非香港如何去补偿它的缺憾；而是香港究竟从这缺憾，这根源性的剥削——这殖民地的唯一可能性条件——创造了什么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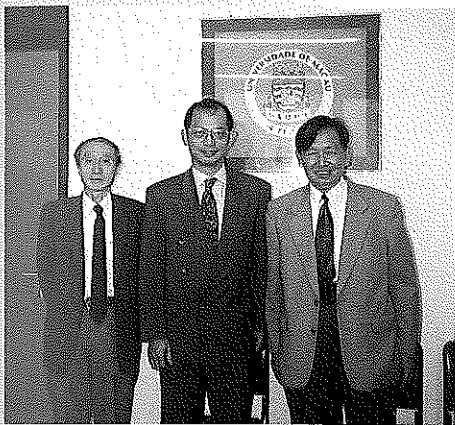
周蕾分析了梁秉钧诗的语言特色、对物件世界的描写方式，对殖民性的处理和重新思考。她认为，认识这种写作特点有待扭转某种传统的殖民主义叙述：“我们可以说，殖民性的状况亦是被殖民者与殖民主义暴力抗争的手段。换句话说，殖民性这个载负着所有被边缘化的人和事的悲剧，而又超越个人的历史状况，到头来也能变成一种机会。在这机会中，被压迫的种种日常经验，与自觉性地追求另类形式的自由，是踏着同一步伐的。”梁并不尝试把边缘的位置理想化，他强调的是自觉地利用其它文化去反省自身文化，周蕾说，在梁的诗句“永远在边缘永远在过渡”中，可以看到一种特别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不是一个结束殖民性的呼唤，而一种开放性的坚持”……

周蕾对香港后殖民处境的看法在香港的知识分子中间，我相信有相当的代表性，这一点从她引述的香港其他学者的文字中可以得到证明。不少人对香港前途的思虑，这是无庸讳言的。我认为，消除忧虑和建立信任，不纯是理论问题，更有说服力的是“九七”之后香港的命运。就此而言，了解这种忧虑，倾听书中的批评，是有必要的。书中对流行文化现象和作品的研究角度、方法，对我们了解香港的文化和文学，提供了新的视野，引出了新的课题，很值得进一步思索。（待续）

[责任编辑：许锡挥 肖贤彬]



张浚生先生接受中山大学兼职教授聘书。



1996年5月7日，澳门大学行政总监卢文辉先生(中)在该校会见中山大学许锡挥、雷强(右)二位教授。



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东莞市长安镇。香港浸会学院经济系主任邓树雄教授(左三)和南洋商业银行刘伟业先生(左四)，广东省国际暨港澳交流基金会副理事长邓持韬先生(左二)与当地官员交谈。



越南社会与人文科学国家中心——中国研究所所长阮辉贵教授(左二)于1996年10月25日到港澳研究所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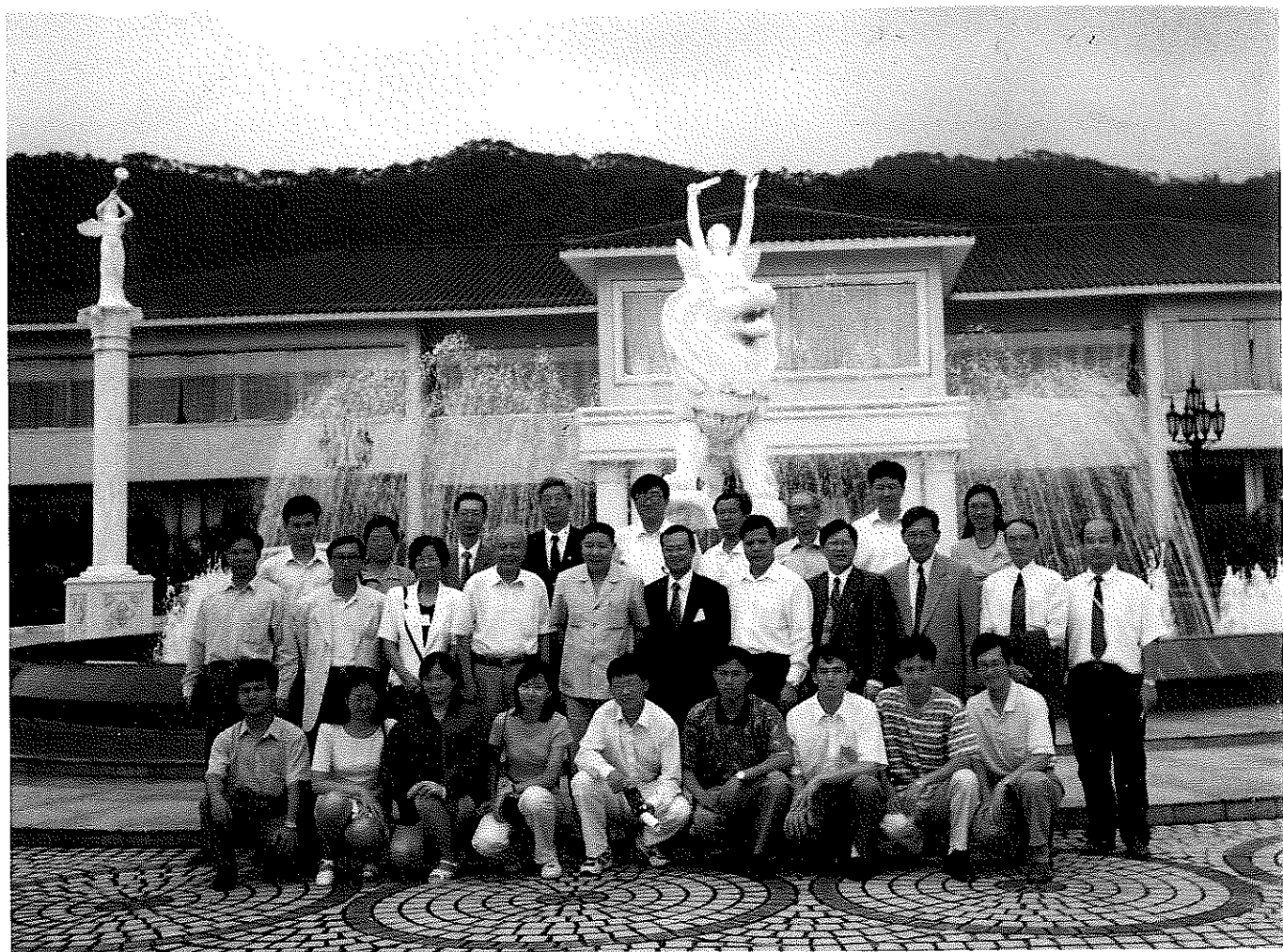
中山大学前校长黄焕秋教授(左二)在小组讨论时听取发言。



分组讨论时，来自各地的代表展开热烈坦诚的交流。



港澳研究所所长郑佩玉教授(右一)、张仲深教授(右二)、雷强教授(右三)与长安镇官员探讨经济问题。



上图部分代表在东莞市长安镇合影留念。

封面：1996年9月23日，“九七”前后香港经济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在番禺举行，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许锡挥教授（左）主持了开幕式，广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省外事办公室主任巢振威先生到会致词。